

年當話省回

雁 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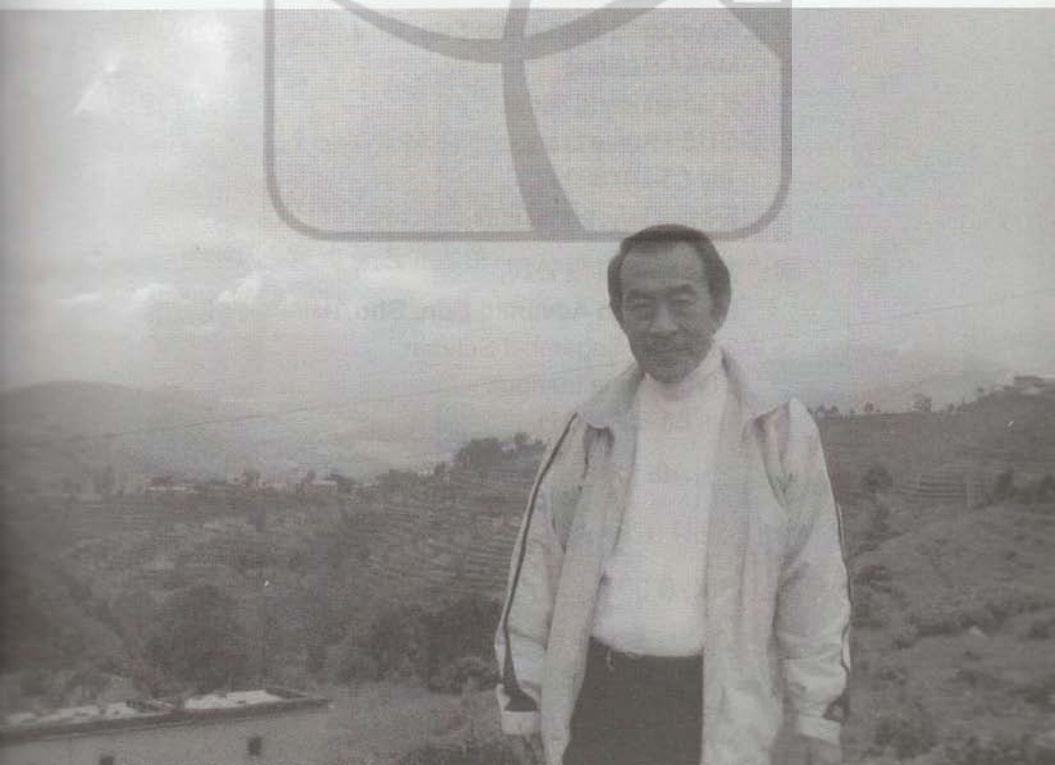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征雁，原名陈达人，1937年10月21日生于雪兰莪州巴生，2006年1月6日逝世。曾在檳城钟灵中学、新加坡育英中学和莱佛士书院受教育。历任新加坡邵氏机构职员、《电视与广播》主编、马来西亚教育服务委员会委员、马华公会中委、李三春顾问团成员以及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和巴生福建会馆署理会长等职。

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事文学的创作和文艺的活动，并出版了戏剧集、小说集和散文集，共计7种。

目录

回首话当年



书 名：《回首话当年》

作 者：征雁

统 筹：冯爱瑛、冯万顺

文章编辑：李锦宗

照片编辑：冯爱瑛

封 面：陈源松

校 对：李少良、李锦宗、陈羚玲

出 版：首运促进有限公司

Keysports Marketing Sdn. Bhd.,

MABA Building,

6, Jalan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0783997

E-mail: keysports@nbl.com.my

印 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9211

日 期：2010年1月6日

书 号：ISBN 978-983-43625-1-5

价 格：RM20.00

代序：一生精彩（陈达真）	v
先敬罗衣后敬人	1
曾被厌恶的城市	5
槟威渡轮趣事多	9
原告岂可当法官？	15
办法总比困难多	19
他抽烟，我们赚钱	23
请到旧关仔角面叙	27
物极必反 事出有因	31
忙中有错 错中有对	37
司仪·诗人·演员	41
忆良师·念师母	45
大地无声除旧岁	51
他走了，在浓浓的夜色中	57
我终于走进大芭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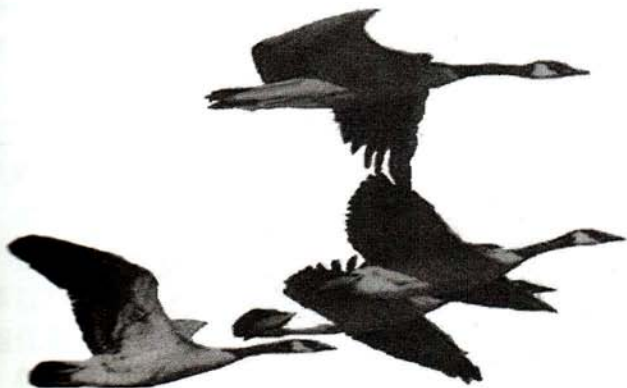


风月场中的无妄之灾.....	65
生平良友岂能相忘.....	71
千山我独行.....	77
喜宴应酬何时了.....	81
向拿破李文敬致敬.....	87
日本投降 我们逃亡.....	93
袖里乾坤远 心中日月长.....	99
俱往矣！那偏激与歉疚.....	103
提着那灯笼来.....	107
滨海夜放花千树.....	111
我们来到了汨罗江.....	117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23
跟老作家做朋友.....	129
不问苍生问鬼神.....	133
节令鼓播进两大洲.....	139
龙舟航为华小筹款.....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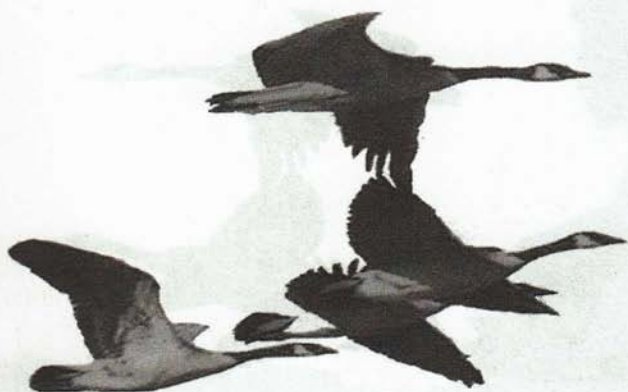
雁过留声

征途·雁过留声（巴依）	153
文学道路上的足迹（黄梅雨）	157
把生活搬上舞台（李锦宗）	163
雁过长空（王兴文）	171
敬悼陈征雁先生（马汉）	173
哀悼征雁（陈雪风）	177
看对联，忆征雁（拿督林荔清）	183
悼雁周年祭（李荣春）	187
我与征雁二三事（颀洋）	189
当年情（陈源松）	193
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少良）	197
悼念江湖长辈征雁（叶宁）	203
点滴（秃橡）	205



iv 雁道留聲

怀念征雁（张美增）	207
我与《电视与广播》（江上舟）	209
雁落二沙（马阳）	211
剧作家又弱一员（刘笔农）	217
深更忆征雁（刘笔农）	219
征雁二三事（田流）	225
祭征雁（杜红）	229
征雁走了（黄叔麟）	231
忆和征雁一起的日子（郑文辉）	233
后记	237



回首往事

一生精彩

——怀念弟弟达人

(代序)

· 陈达真

达人的子女要为他出书，邀我写序。这本书，是他逝世前几年在报章撰写的专栏，或多或少，有他的回忆，也有他的心路与对人事物的看法。重读他的文字，仿佛他还活着，因为行文笔调，尽是他的语气。他从不虚假，有话直说。动笔略加润饰，仍是文如其人。这是我的弟弟，他始终是性情中人。

他活出精彩人生，仿佛从年轻开始，他就不肯与现实妥协。他念书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然而不能算是师长眼中的“好学生”。也许因为他很有才气，变得愤世嫉俗。中学就懂得批判学校，甚至参与学潮。年龄稍长，他火气渐消。但我知道，他仍然想充尽一己之力，为社会族群带来改变。

从政是他想改变现实的具体动作。他风光过，但最后因党争退出政坛。服务社团也是他想改变现实的具体动作。他担任巴生福建会馆署理会长期间，开创和主办了很多文化活动。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都已往事如烟，于我，却是心中长记。这是我弟弟，他没空谈，没埋怨，而是踏踏实实为社会人群做过一些事。

然而，他表达生命的方式，始终是文学。

他写散文和小说，最钟爱是戏剧。他出过几部剧本，从事过广播行业，更会粉墨登场，成为戏中人物。2004年，他担任第八届马华文学节工委主席，开幕典礼他搬上舞台的，仍是戏剧。生活中他以真面目示人，戏里他变换角色，

似乎想尝试不同的人生。也许，这正是他的生活哲学：戏里戏外，都想活出精彩！

他骨子里总有一些不安于命的想法，正是这样，成就了他的不凡。他的生命仿佛有一种姿态，逆风而行，却又稳定潇洒。甚至临终前，他仍能笃定笑谈。当一个人活出自己，觉得充实而无憾，应该就是这样的姿态吧！喜欢文学的人更知道：生命不在长短，而在意义。有这样的弟弟，我是深以为荣的。

只是，他为我带来的这些荣耀，并无法弥补他离去后为我带来的憾恨。他的生命越是独特，对我而言就越是珍贵。这些点点滴滴，都成了回忆。

我真心感激他的友好在他遽然逝世之后，纷纷在新马报刊撰写悼念文章。达人有知，他也能感动的。

再次触及的伤痛，已非我所能表达。

苏东坡有“与君世世为兄弟”一语。

这是我唯一想说的。



2001年10月13日，征雁（左）和姐姐陈达真（右）在丝绸之路途中的一片沙漠上合影。

回

省

話
當

吳昌碩

昌碩

金

年

回首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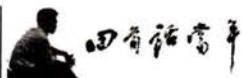
先敬罗衣后敬人

我向来衣着随便，但求舒服不讲派头，尤其喜欢穿旧衣，觉得凉快写意。直到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老友林廷甲给我劝告说，人在江湖，还是要讲究衣着的，因为这个社会先敬罗衣后敬人。

70年代初期，我出任教育服务委员会的委员，统管全国各源流教育官员的录取、晋级，核准他们进入永久公务员制，以及在必要时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等职务。有一天，我的小儿子其贤需要紧急送院，因为他的发烧屡治不退，退了又再来，最后发现齿龈出血，家人误以为他患上骨痛热症。于是在林廷甲的护送下，进入中央医院求医。

紧急室的几位名医包括院长也在场，看到是卫生部长政治秘书亲自送来的病人，也就十分慎重，马上进行会诊。最后证明不是骨痛热症，我也放下了心头大石。但在归途上，却给廷甲老哥指责了一番。他说：“我每次叫你人在官场要注重衣着，你就是不听。你知道吗，刚才我告诉那些名医说这是教育服务委员会委员的孩子，他们看到你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夏威夷装，形同炒粿条的小贩，还以为我跟他们吹牛呢！”我为自己的衣着使得老朋友碰钉，真的深感歉仄。

其实我们出任这项公职，主席是要我们开会和出外公干时，都要绑领带穿大衣。但在热带地方穿大衣的确要命，所以有几个委员就避重就轻，穿起部长装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往后的例子中，证明把自己穿得像样点，在某些场合



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那一次，吉兰丹州有300多名从大学和师训毕业的成员要进入教育部各源流中小学服务，正等着我们去面试。于是委员会兵分三组北上主持。清晨时分我搭马航班机抵达哥打峇鲁机场，包德士赶赴州政府大厦。车行近市区时，觉得气氛与往日不一样，这里围聚一堆人在交头接耳，那里三三五五，行色匆忙，有大件事发生似的。进入市区一看，街上有人堆积着胶轮胎在焚烧，“多多”的售票站也被推到马路中捣毁，看情形是有群众抗议示威过。

我先到靠近政府大厦我经常住的那家旅店，放下行装。而后我应该做的是不管外面多么混乱，我必须先到政府大厦去报到。但这个时候，大厦的前前后后已经被军警包围，气氛森严。我只好鼓起匹夫之勇，穿着笔直的部长装，在胸前挂上名牌，故作镇定地向大厦走去。路的两旁是五步一岗的青兵，都托着枪枝在驻守。大概是看到我那副神色还有点像样，没有人截阻我，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进入政府大厦。我迳自往前走，来到大门，门经已锁上，旁边有个小门，我就走了进去。这时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可以想像这里曾经过一场暴乱，结果群众被驱散了。我进入办事处签到，才知道其他委员曾经来过，看到面试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就各自离去了。

试想，如果我的穿着像炒裸条的小贩，能够这样出入自如吗？

正午时分，在咖啡店用午餐，看了几场暴民与警方的追逐战之后，我回到酒店。整个下午街上纷纷攘攘，暴乱频传，到了傍晚局势急转直下，新闻部的宣传车沿街宣布哥打峇鲁即刻戒严，全吉兰丹州进入紧急状态。

天暗下来了，我感觉到肚饿，才想起还没有用晚餐。但市区已经戒严，所有商店都关闭了，怎么办呢？

问一问平时跟我们这长期住客称兄道弟的马来书记，有没有紧急准备一些食品招待住户，他抱歉地摇摇头。可见大

难临头，他也顾不了什么阿邦阿烈了。

想到戒严令不知要持续多久，身边不但没有食物，连喝的水也没有，这可就难了。也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等着看有什么奇迹出现？

9点钟，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驻守在旅店为顾客服务的按摩女郎。这位李小姐30开外，人长得标致，也很和善，我虽然跟她不熟悉，但也常有打招呼。她问我：“你还没吃吧？过来，过来我房间！”

有人雪中送炭，我的感受是失礼事小，充饥事大，就跟她过去。到了她的闺房，看到几位经常来住宿的推销员正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加入阵容，跟他们有说有笑地享用一餐难得的晚膳。

连声谢谢之后，回到房间夜已深沉，又有人敲门。一看，又是李小姐，这次她面有难色地对我诉苦说，戒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解除，房里的伙食已经用罄。她要我明早带她到隔邻街杂货店去添购一些食粮。她还说我是政府人员，万一碰上军警巡逻，比较容易开脱。

我们几年前在西海岸碰上的五一三事件梦魇尚存，对那格杀勿论的戒严令印象犹新。虽然心有恐惧，但吃了人家一顿善意的晚餐，如何推却呢？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笔直的部长装，挂上名牌，带她到隔邻街去。杂货店的老头半掩着门，让她进去采购，我则站在五脚基等着。天底下就有这么凑巧的事，你越怕见到鬼，鬼就在你左右。我向左边街道望去，不知从哪里闪出了七、八个托着机关枪的青兵，正一步步地朝向我逼过来。我脚跟虽然有点酸软，但还是强装镇定地站立着。其中一个军人还如临大敌似的拉响了进子弹的机门。我半求情地向队长解释，因为旅店困了很多人没有东西吃，虽然违反了戒严令，希望他高抬贵手，队长训诲了一番，要我们赶快回旅店去。当我们回到旅店时，李小姐好像刚从鬼门关归来，吓得脸青青。

这好像又是像样的服装帮了我一次大忙。

我们在哥打峇鲁耽搁了两天，我坚持第三天赶往瓜拉丁加奴，因为那边也有300多人等着面试。要是再拖下去，东海岸的排期就会大乱。我时时刻刻都通过电话跟住在政府宾馆的其他委员联络，他们对于公然违抗戒严令有些犹豫。跟警方联络，警方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派警车护送我们出境，只是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因为看我们的扮像不像暴民，料想军警不致于对着我们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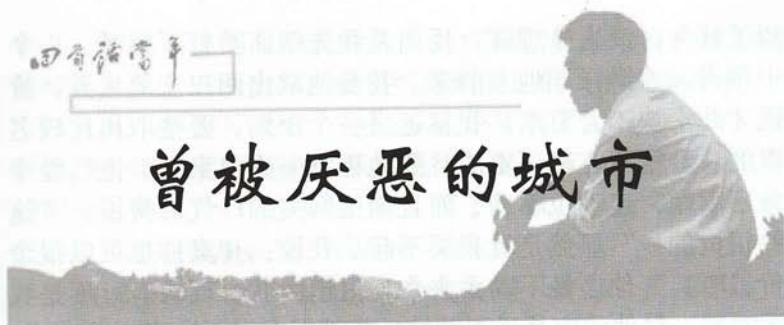
第三天清早，我们把心一横，决定冲破封锁线。副主席因仄哈里米赶到旅店载我，一行三辆车向丁加奴出发，留下了我那几个旅店的朋友在一片水深火热中！

虽然是一路平安，畅行无阻，但也够心惊胆跳的。也正因为有这场经历，我们往后在开会时，要求每个委员能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2004年11月29日和30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左）、夫人冯爱琪（右）和幼子其贤（中）合影。



写完了《先敬罗衣后敬人》，意犹未尽，觉得还有一个地方，这种不良的现象更为显著，于是想多写几笔来消解多年憋在心中的闷气。

在60年代，一般人都认为香港是个很注重外表，非常势利眼的城市。常听朋友说，你走进香港的商店，店员会先看看你穿什么皮鞋，戴什么手表，身上衣着布质的优劣，然后才决定用什么态度来招呼你。

在电影上也常看到一些贫苦的小职员，上衣的臂肘破了一个大洞，背部也有裂痕，但只要袖子是完美的，穿上大衣就可似模似样地走在街上，没有人看得出你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见这个城市对“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具有很深的观念。

60年代初期，我在新加坡一家电影机构服务了两年后要去日本深造，途中准备在越南、香港及台湾稍作盘桓，以便增广见闻。我的中文部主任也即著名作家柳北岸寄托两百块钱，要我在香港买一枝好一点的钢笔，带到东京给他的儿子，即今天在香港大名鼎鼎的才子兼名嘴蔡澜。

6月间是大暑天，又碰上香港制水，4天才来一次水，这种情况搞到人人身心都很火滚，哪里还有闲情去打领带注重外表。我穿了一件轻便的夏威夷装，走进九龙弥敦道一家商店，要买一枝新币200元等于港币400元的钢笔。在柜橱旁张

望了好久，没人来理睬，反而是我先跟店员打了招呼，一个中年男人才懒洋洋地上前来。我要他取出两三支笔来看，价钱才几十块不合要求。我移近另一个柜橱，要他取出比较名贵的。看了两支都买不成，要他再拿一支出来看，他已经十分不耐烦，连动也不动，而且用很鄙夷的口气对我说：“这些很贵的！”显然是看我买不起。我说：“贵你也可以报个价钱嘛！”他还是不动手去拿，只说：“百五块。”不是我买不起，是他的商品还不够格！我就回头退了出来。

这种现象相信在香港是很普遍的。难怪我有个在江湖闯荡惯了的新加坡朋友，有一天在香港百货商店购物时，给女职员奚落得满肚子火，他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叫你们的老板出来！”女职员吓了一跳，说：“我们的老板不在，你找他干吗？”“他出来了，你就知道！”场面弄僵了，经理跑出来问：“你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我的朋友说：“我要问他这座百货商店要卖多少钱？我现在马上要跟他买下来！”当然经理也知道这是意气话，为了息事宁人，也就连声道歉，打了圆场。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恶人自有恶人磨，给他们一次教训，也是好的！

如此注重外表与势利眼的社会，我相信我听说的这则故事可信度相当高。

话说新加坡有位企业家与大慈善家，声望很高，由于节俭成家，向来不注重衣着，不讲派头。有一天他到香港主持他创办的银行的董事会议，时值夏天，暑气迫人，他穿着在南洋穿惯了的夏威夷装去赴会。谈至半途，他想如厕。老人家不想打扰别人，就自己摸出来去坐电梯，要到另外一楼的厕所去。而这家银行在几天前才发生过打劫事件，大家对陌生人都提高警惕。不巧老人家可能老眼昏花，要按另一楼的号码而按错了警钟，于是警铃大响，等到电梯的门一开，围聚的职员看到此老的装束，绝对不像高级人员，宁可抓错，不可放过，就合力把他擒住了。正在开会的董事听到楼下人声沸腾，赶下来看个究竟，竟见董事长给职员抓起来当盗贼

来办。于是马上喝令职员放人，并宣布这位是来自新加坡的董事长。此老也不生气，笑容可掬地要他们安心回去办事。

大凡一些普罗大众，他们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都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装束，不要说往上爬，至少才能保住现有的职位。但越是有钱的人，事业到了高峰，他们多放松了自己，尤其是在家里，更不拘泥于衣着。

话说南洋有个小财团的几个代表到了香港，要跟运输业的钜子谈商一笔生意。由于没有事先联络造访的时间，就冒冒失失地直闯豪宅。来到大门口，是盛夏天气，看到一个穿着短裤与背心的老头摇着一把扇子在纳凉。他们道明来意，要见大老板包某某人。老人家听了说：“请你们等一会！”说后就走进大厦去，过了不久，这位老头穿上比较像样的衣着出来开门，对各位说：“请到客厅坐坐！”在客厅坐下后，一阵子的冷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其中一个代表耐不住就说：“我们想要见包XX先生！”老头回答说：“失礼！失礼！我就是包XX！”

这一回不是香港人看不起外来的人，而是外来的客人把香港的大富豪看扁了。

过去香港凭着它的海港、金融、行政效率、人民的苦干精神和优良的地理环境，成功挤上亚洲四小龙之一，使它成为享誉全球的东方之珠。但这地方空间太小，人口拥挤，竞争力强，人们生存的条件比其他地区来得艰难。生活在不同的阶层里，贫富悬殊，得意一条龙变得趾高气扬，失意一条虫变得尖酸刻薄。在那个年代有人嘲笑香港是个没有明天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地，人们没有归属感，也没有效忠的对象。他们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并不是要尽忠报国，而是要报自己的荷包。

97回归后整个局势在改变。国有国格，民有民风，香港人民的精神面貌应该整顿一番，把过去的劣行恶习扫进港九的海港去，因为搭上中国前进的列车后，珠江三角与长江三角的海港在迅速发展，香港想要独霸海运的龙头，恐怕机

会也不多了。加上近期的 SARS 病毒，搞到香港的经济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必须北望中原，祈求中央的援手。这也多少挫一挫香港人那骄横的锐气。

前几年因小女子洁在广州任职，我与内人常于年底过去度假，也偶尔到香港小住三两天，觉得商店与餐馆，侍应生的态度比60年代改善了很多。不过香港既已回归，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但香港人动不动就发动几十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他们关注的是两制，而似乎忘记了还有“一国”的存在。套句革命人士喜欢用的俗语，那应该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04年12月6日和7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左一）和夫人冯爱瑛（左二）以及幼女子洁（右二）和女婿（右一）夜游香港。

回首往事

槟威渡轮趣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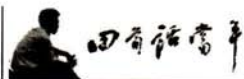
在吉兰丹公干遇上戒严，耽误了行程，我们回来后即在会议上要求有关部门发一张在紧急事故发生时，可以通行的特别通行证。

国内公务员那么多，想来要拥有这张通行证是很不容易的。但由于我们这个教育服务委员会的组织比较超然与独立，虽名为教育，却不受教育部管辖，而是由最高元首委任，首相署直辖。

这是承袭英国的制度，部长负责政策与行政，委员会则负责正副部长以外，所有部门公务员的人事，包括招聘、升级、审核他们进入永久公务员职位，在有必要时，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如停薪、降级甚至开除。换句话说，部长没有权力批准任何职位的人员进入他的部门，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教育官员。遇上这些难题时，教育部必须具备事实，交由委员会去定夺。

有些国家其实只有一个“公共服务委员会”统辖国内全部的公务人员。我国因为公务人员众多，所以分设教育、警察与武装部队及铁道局的委员会，来分担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重任，而其职权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项职位是最高元首委任，首相署直辖，如果是古代人的说法，这些人出外公干是有点“钦差”的涵义，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在贴上每个委员的照片后，很快就发给我们。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持证人在执行公务，希望有关方



面给予方便。

我不是一个很爱自我炫耀的人，有了这张通行证，我放在袋子里深藏不露。不像一些搞政治的人，有了一支枪就插在腰间露出枪柄给人家看。根据内行的人说，这种喜欢露枪的人很危险，因为对方一出手，知道你有枪，一定要置你于死地。

我第一次用到它，是在持有这张卡一两年以后的事了。那天清晨，我搭马航到士乃机场，包了德士要赶往新山州政府大厦去面试。到了淡杯附近时，事情不妙，车队正在排长龙。这一带豪雨过后经常浸水，这一趟是那座桥给水冲毁了，工程局在桥旁搭了一座临时的窄桥，采单行交通，要等对方的车过得差不多了，这边的车才能通往新山。我看这么长的车阵，就问司机要等多久才能过桥。他苦叹一声说：“讨吃艰难，我每天都要这样等，要想过桥，至少要花两个钟头。”我想这么一来就糟了。我叫他靠旁边的黄土路前行，他说：“什么？前面有警察，我会中三万的！”我说：“不要紧，我有特别通行证！”他带着疑惧的眼色望着我：“先生，你不要害我。”我给他打气，劝他开车。他虽然有点犹豫，总算一鼓作气，沿着黄土路越过百多辆汽车，来到了桥头。警察看到了一定以为这辆德士是要来起哄，竟敢直捣禁区。于是冲上前来，我出示通行证后，他的态度马上改为和颜悦色，要我们稍等，马上就可过桥。等到对方来车已停止，我们的确是第一辆车子过桥。这时候司机高兴地对我说：“我今天是碰到贵人，要是我每天都能碰上你这样的搭客就好了！”停顿了一阵话犹未尽，于是再加上一句：“先生，你是做政府工的？我想你一定是很大粒的！”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趣事是发生在槟城。我在槟城有位挚友陈炳光。我俩是50年代槟城学生反对华校改制而掀起学潮时期的领导人物，结果被开除了。浪迹在新加坡的一段日子，他住在邻近地区，因而常混在一起。后来他去了南大，我进了莱佛士书院的高级剑桥班。有一天，他带了一大堆资

料来找我，我才知道他已担任南大政治学会的主席。他要我为南大大学周编写一篇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背景的剧作《十国裁军大辩论》，盛情难却。我也常到云南园去指导他们演出，结果成功上演，被誉为大学周中最精彩的节目之一。

炳光兄是槟城闻名的文化界人士。他在报馆服务过，也办过报纸。我最近重修准备再版中篇小说《升旗山下》。他也为我写了一篇序文。此君生性幽默，喜欢戏谑，如果加上亚罗士打的老友冯志由也凑在一起，定有哄堂的局面。我每到槟城，都由他送往迎来，招待周到，我称他是莫逆之交并不为过。

有一次，我到槟城，他带着女儿来接机。上了他的车后，我独坐后座，由于心情爽朗，哼了几句小调。他转头对他的女儿说：“好像很冷哦！”他的女儿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很冷！”我看车外天气晴朗，就说：“可能是冷气开得太大吧！”他们父女俩在前座爆出了一阵笑声，我才知道他们是在说我的歌声使他们发冷。炳光兄鬼马，他女儿也诙谐，颇有乃父之风。

话说在70年代，马化控股集团在大山脚兴建民房，由于我是董事，公司方面好意留了一间边屋给我，有一块大空地，才12万。我签下之后，发觉银行方面借不到钱，因为我住的屋子也正在向银行供期。这样一来我就很急着要卖出去。这期间多是劳驾炳光兄载我到他的老家大山脚去寻找买主。后来是巴生的老友林明业调派到大山脚银行当经理，替我介绍了一位客户买下。

多少次了我们在码头渡轮遇上了长龙阵，我都是能等就等，不露出通行证。有一次是星期四傍晚，从大山脚要赶回槟城，由于吉打州星期五是假期，民众多在这个时候涌进槟城度假或购物，车龙阵实在是排得太长了。炳光兄很急躁，开始有了怨言。我也于心不忍，害得他上班要迟到了。当时他是在报馆当电讯翻译。看着他那副急相在望洋兴叹，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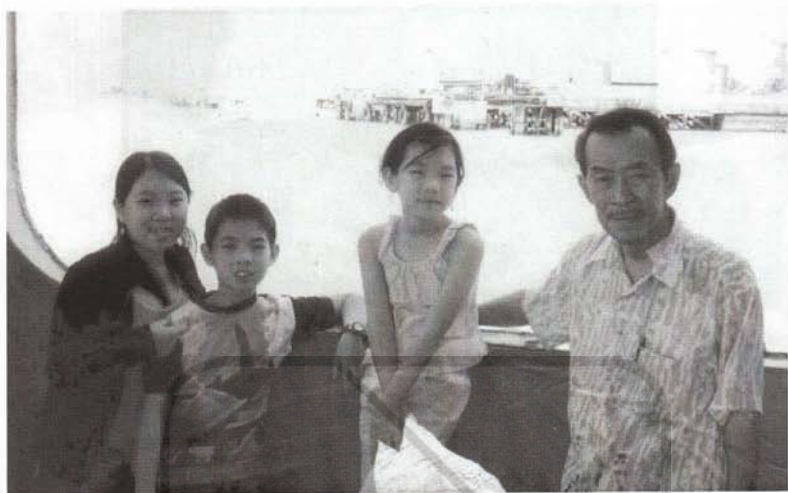
就问：“谁的车可以进入特别通道？”他说：“林苍佑、林良实还有谁？”林苍佑是首席部长，不在话下，林良实是槟城港务局的主席，名正言顺。我说：“还有别的人可进吗？”他很不耐烦地说：“总之要很大粒的啦。”我回过头来对他说：“好像我也可以！”他把身子斜向车窗，望了我好久不发言。彷彿这位朋友今天是吃错了药在胡言乱语。我也故意不肯定地说：“你试试看，好像可以。”他觉得我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你要知道这条特别通道像侯门一入深似海，进去容易出来难。驶进去固然光彩，退回来我的颜面就要丢进槟威海峡！”

他驾的是一辆陈旧的甲虫车，烟筒还不时噗噗作响，要用这辆车闯关，难怪他会自惭行秽。我只好坦白告诉他，我有特别通行证。他把车驶入特别通道时，还叮咛了两句：“你是巴生人，你出了丑拍拍屁股回去无伤大雅。我是槟城人，这周围有多少人都认识我，要是我给他们命令退回去，我的脸要放到哪里去？”

他战战兢兢地把车驾到通道的前头，官员立刻冲前来，大概是以为这辆甲虫车内的人是贴错门神，误闯禁区。我镇定地出示了通行证，他马上转为和气地说：“渡轮就快靠岸，请稍等一会。”

这个时候的炳光兄好像脱胎换骨，整个人变得生龙活虎了。他开了车门，站到车外，像是舒展一下身心，其实他是为给更多人看到他。然后他只见牙齿不见嘴唇地对我说：“我现在多么希望全槟城的人都看到，我这辆老爷车是可以通过特别通道过关的！我交你这个朋友没有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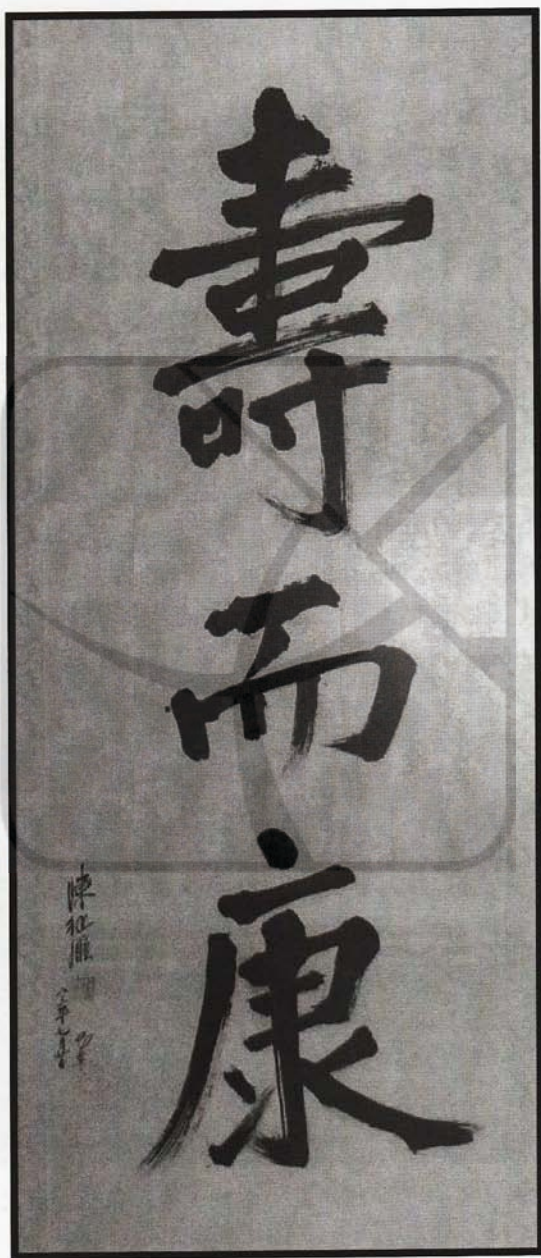
〔2004年12月13日和14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2005年12月10日，征雁（右）与3个外孙在槟城渡轮上。



1961年，征雁（左一）和陈炳光（右一）等人在新加坡火车站。



征雁的书法

回首往事

原告岂可当法官？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国家，虽然人民信仰不同，但各族互相尊重，对各自的衣着起居，悉听尊便，从来不受干预。

当年我们教育服务委员会对教师的服饰也没有苛刻的要求，只要穿得符合自己的身份，保持职业的尊严，就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当然我们不会欢迎女教师穿迷你裙来上课，因为她们在讲解课题时，我们希望学生们都能集中精神，望着老师握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写些什么？而不是要他们把目光注视着她们的大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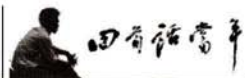
一般上，只要不暴露，穿着密实装是没有问题的。

但太过密实了，却也会出乱子。

70年代从中东吹来了一股风，有部份的友族妇女在穿了密实装之后，再戴上一个黑色面罩，只在双眼部位开了两个洞。这样的服饰走在街上，也无伤大雅，因为衣着习惯自由，没人有异议。

但当她们来到教委会的面试场所，就有了问题！

她们填具申请各项教职的表格，贴上近照时，我们能认清她们的面容与五官。现在她们来到面试场地，坐在考官面前是套着面罩，只能见到她们一对乌黑深邃的眼睛。考官不能断定这是真人，或是请别人来代替面试，因为有时有很多时事问题需要申请者回答，有人怕应付不来，请人套着面罩来冒充也说不定。



这个问题在教委会提出时，委员们达致一致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必须脱去面罩，露出真相，否则可以拒绝她们面试。

不久后，有位巫籍委员与州教育局官员一起在森美兰主持面试时，却碰上了大钉子。

那天有一对夫妻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申请要出任中学教师。男的已面试完毕，在外边等，女的进来时头套黑色面罩，只可见到一对灵魂之窗。我们的委员费了很多口舌跟她解释，要她除去面罩，她却基于宗教理由，坚持不肯，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好像深受屈辱。由于外头有很多人等着面试，既然她不接受指示，教委只好请她出去。她哭着走到门外向他的丈夫投诉。而此君也是鲁莽之辈，看到爱妻梨花带雨，好像受了别人的欺负，一时恶向胆边生，冲进来，更兴师问罪，还想大动干戈。经过了一番折腾，在州教育局官员的镇压与调解下，我们的教委总算全身而返。

碰到了一鼻子灰，我们的委员怨气难消，就在教委会会议提出报告，我主张严办，以维护教委会的尊严，要不然日后类似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他委员都赞成杀一儆百。他们还没有踏进教育圈，当然谈不上开除，只是拒绝他们申请，同时有权限定他们在几年内重新申请也不受考虑。

这对夫妻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心有不甘，告到上头去。当然他们不是告到教育部，因为我们的组织不受教育部管辖。原来他们神通广大，一告就告到律政司署。

律政司署在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后，给我们的指示是，教委会这样的判决是有违规格，所以是无效的。

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愣住了。为维护这个组织的尊严而采取纪律行动会有错吗？

在了解真相后，才知道我们的错误是让原告同时做法官。

根据法律条规，那位投诉的委员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

向教委会提出完整的报告，详述其中的情节，但在表决时，他必须离开，以免影响其他委员的决定。我们却疏忽了这一点，让他坐在一起通过了这项判决。

虽有律政司的干预，但那对夫妻也没得高兴。我们知错能改，在另一次会议上将整个判决的程序在投诉委员的缺席下，再次通过，这样就合法了。

当我担任马华中委时，同样的事例也曾发生过。

话说当年某州的一位马华高级行政议员，在一项讨论发展项目的会议上，由于其中有的项目是跟他有关的，他也不避嫌地坐在那儿，看着他的项目通过，结果有人告到上头去。

三春老总作为一会之长，对此事相当忧虑，曾几次提出在中委会上讨论。大家认为既已犯错，最好他能引咎辞职，希望上头不是从轻发落，而是他要引退，最好可以息事宁人。当事人也不恋栈，事态已落得这个地步，他也就“功名事，不思量”，抱着“封官加爵纸一张”的心态，辞官归故里了。只可惜叫这些中委耿耿于怀的是，后来当局又对他采取制裁行动。足见法律落在一些铁面无私的人手里是无情的。

另一个事例是发生在会馆。我当时是会馆的教育主任。我的老友刘迪是董事，也是教育组的成员。有一天我主持会议要挑选出成绩最优秀的杰出中学生，奖金是1000令吉。刚好刘迪的儿子成绩最突出，呼声最高。我有了前车可鉴，不要给别人说闲话，在表决之前，就请刘迪离开会议室。

有一位老土的董事，大概是要讨刘迪的欢心，就说：“不必了，都是老朋友，何必要离场？再说他的投资都是千万令吉的大项目，他哪里在乎这1000令吉！”

这1000令吉是一种荣誉，并不是刘迪很垂涎这笔钱。我知道替他打抱不平者是个思想与知识见地有限的人，也就不跟他多争论。反而刘迪深明事理，很高兴地走开。最后他的儿子荣获这项荣誉，他并没有参与表决，岂不快哉！

我记得英迪学院院长陈友信曾经对我说，英迪学院在草创初期，十分辛苦，很多老朋友都拒绝投资。刘迪却拿出一笔巨资，并不想回报，只希望民族的教育事业办得成，办得好。只可惜上苍不怜赤胆忠心，刘迪因患病，英年早逝，使戚友亲朋不胜悲戚。

〔2004年12月20日和21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右四）参与马来西亚教育服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

回首往事



办法总比困难多

马化控股成立时，我是马华中委。承三春老总的提拔，有几位中委被委进去当董事，我也是其中之一。老实说，我是寒士一个，清风两袖，经济的理论倒读过一些，投资的经验却成绩空白。但我知道他用心良苦。诚如我在40大寿时，他来参加餐会，不声不响地送我一个钱包。我想他的意思是要我日后可以担当一些比摇笔杆更实际的工作。

马化控股当年是标榜汇聚族群资金，在新经济政策下，为华人解决面对的经济困境。由于出师有名，声势浩荡，那时红极一时的陈群川也从云顶下山，加入阵营，准备大展拳脚。我们身负重任，对传媒展开大力宣传，等到公司注册成立，招股计划被批准后，便组队从北到南展开招股工作。

我还记得是从玻璃市的加央开始，沿着西海岸的城镇，一路设坛开讲，一直讲到新山为止。这期间，能演讲的都上台去鼓吹，职员就在现场分发申请表格。所到之处，可说是反应热烈。

我们的招股目标，现在看来不算多，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大数目，那是3千万令吉。截止之后点算的结果，情况令人振奋，远远超出目标，达到4千3百万令吉。随即召开董事会，讨论的课题是如何取舍。印象中最深的有一家小贩公会的组织，来信要求不能抛弃他们，因为在我们推展招股工作时，他们帮了许多忙。这是个好现象，说明各界都对马化有信心。

另外一项在会议上提出的议题，却使我们内咎与震惊。这是一个无心也是无知的错误。原来反对党将在国会提出弹劾，指责我们的招股方法是违法的。

后来根据一些对法律有识者之分析，这种向公众招股的公司，招股工作必须完全交给秘书公司去处理，有关董事不得用口头向买股人宣传，更不能亲手将申请表格交给他们。我们却由北到南，到处敲锣打鼓，而且在现场派发申请表格。

当时丹斯里李莱生还没有出任董事主席，群川是执行董事，是最高决策人。只见他在会议室里春山深锁，坐困愁城。后来三春老总来了，也参与商讨。老总为人处事冷静，在事情办妥之前，从不作肯定的允诺。不像一些领袖，基层有要求，总是说没问题，结果办出来的事情都是有问题。

三春老总了解这是一项棘手事件，但也显得不慌不忙，眯着形成一线的眼睛，微笑地对众人说：“我去想想办法，试试看！”后来怎样过关，由于我不是国会议员，没在现场见证，也就暂且不表。不过我相信朝中人多好办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办法总比困难多！

话说回来，马化的招股虽超出一千多万令吉，可说是不敢想望的佳绩，但在申请截止前的那段日子，却是有苦自己知。到快要截止的一星期前，投函申请者十分冷落。三春老总闻讯提早从外国赶回来，他坐镇总部指挥大局，为了稳定军心，从侧面发放了一则关起门来自己爽的子虚消息，说经已收到数百万令吉的申请。但实际的情况是前几天还每天收到几封申请书，但这一两天，邮差来了又去，居然没有送来我们所想望的东西。

这一天，老总坐在办公室茶饭不思，到了两三点还没有去吃午饭。助理安慰他不必挂怀，希望船到桥头会自然直。于是一行人下楼来，准备用餐。看到邮差步出大门，就上前叫住他，询问这两天，为何没有送来控股的申请表格？

邮差说：“有，送不来！已经装好很多个大麻布袋，正在发便条，要你们亲自到邮局去载！”

好消息！老总听了老怀大慰，那餐肉骨茶竟多吃了两碗！

从这小事件上可以看出华人都是精打细算的。他们捏着的钱，不会早几天送到你的户头里，势必等到不能再拖了，才情愿把钱汇过来。

发起这样一个汇聚族群的资金来作发展投资，对我们每个董事是项崭新的尝试，对群川来说更是重大的挑战。老总既然委他以重任，他的压力之大，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了这个大计，把自己搞得废寝忘食，身心两疲。

这一天，招股的宣传大队来到马六甲。在一个社团代表联席会议上，循例是由他作为主要发言人，向会众讲解控股成立的意义及目标。可能他是从北到南不停的奔波，舟车劳顿，也可能是用神过度，思考力与体力都难以支撑。讲到一半时，停顿了几分钟，完全没有动作，也没有言语，好像是虚脱了。老总的政治秘书雷大庆看到情形不对，赶快要我上台顶替。我看全场的气氛经已僵住，必须先打支兴奋剂，于是以轻松的话题切入。

我说马化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马控”，读这两个字拼音要读得准，要不然“我们支持马控”会变成“我们支持马共”。而控股的福建方言读音如果读不准会变成抢匪。这两个比喻一出，全场哄堂，气氛又振奋了起来，我才谈入正题。可见廷甲在马华干训班的演讲集会上半途要停下来领导全场唱一首歌，是有其道理的。

我在马化控股的日子并不久。事缘首相敦拉萨在某个场合上向三春老总暗示他不希望一些高级行政人员亦在商场上扮演主要的角色。老总转达给我知道后，我决定保留教育服务委员的职位。几天后，我向陈群川辞去马化控股的董事。

后期的控股发生了很多事故，导致政府进行干预，商业调查组展开调查，而有好几个人吃上官司。我因提早离开，变得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可说逃过了一劫。



征雁已故母亲郑文娟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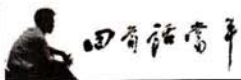
回首往事

他抽烟，我们赚钱

我从莱佛士书院毕业出来后，在新加坡河畔浪迹了一段日子，与丰子俊做了好朋友。那时期新加坡很多工团都在排演我写的独幕剧《雨夜》。这个剧本描绘一个工友之家面对的重重打击，情节紧凑，戏剧性也强，加上当年工运方兴未艾，因为天时地利，成了一部甚受欢迎的剧目。

丰子俊也是好戏之人，他正在齿科工会排演我的另一个剧本《楼上人家》，我才有缘识荆。他为人友善，乐于助人，看到我当时在量马路，就邀我到他的家去住。这地点是新加坡河边的三层楼古老店屋。他们一家人住在三楼，二楼的前座住着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亲戚，后半座有间房，虽然黝暗些，没有窗户，但因为当时失业，连衣服都要自己洗，也就穷不择宿地住了下来。夜里常在桥上伫立，望着新加坡河上驳船在黑得发臭的河面上运行。中国归侨作家马阳在一篇追忆的文章中提到他离开居銮要到中国之前来新加坡见我，文中描绘的场景，就是这个地点。

那时我正在求职，看到报上有电影机构要招聘中文部职员，便写了一份履历去应征。但过了颇久没消息，我便回联邦小住。岂知就在这时候，公司来函约我去面试。幸好丰子俊够朋友，他不假思索就代我去见主管，并且为我美言了好几句。随后急电通知我赶快亲自去会见主任。我见了他之后，才知道他是该机构的中文部主任，而且是著名的作家柳北岸。他好像心里有数，不多问我问题，就要我在月头开始



上工。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已经熟悉了。有一天在一起吃午餐，他才道出录取我的两个原因。首先，看我的履历，知道我喜欢写作，而且以创作独幕剧为主。他说做一份工作最主要对工作要有兴趣，要是没有兴趣，请一位博士来也无济于事。其次他说我的钢笔字他一看就喜欢。当时公司同时录取了两位新职员，另一位是在新加坡学潮中著有诗集《五月》而红透半边天的杜红。虽然薪水不算高，但在那年代，这份工作对一般青年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了！

在60年代初期，华语片的市场是很局限的。新加坡制片厂拍的是马来片，台湾人看的是台语片，香港人只看粤语片。华语片主要的观众是在新马两地，再加上砂劳越、泰国和越南有少许观众。由于主要市场是在新马，香港制片厂开拍的华语片必须根据新马的票房记录。影片题材的选择，明星角色的分配要迎合新马观众的喜爱。柳北岸因为从年青起就与老板拼搏天下，深得上层的器重。中文部的意见，多数是被接纳的。曾经有几次我们跟另一家电影公司竞拍同一类型的题材，老板精通中文，在看剧本时取舍快捷，但对方的老板只懂英文，所有文件与剧本都要翻译成英文，才让老板去定夺。结果是他们的影片还没有开镜，我们的电影已经在市场放映了。

我在中文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宣传，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忙主任审核香港行将开拍的华语片剧本，看剧本中有什么不合理之处，有哪些地方应该加以补充，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戏”？合不合新马观众的口味？哪些情欲的描绘到哪里就要点到为止？其他的工作如试片之后，香港方面有附来简短故事内容最好，可以马上去印手传单。要是没有，我们就要把整部电影曲折的内容写成“本事”，同时还要写出多对对偶式的联句，供广告部画版时采用。

大体上来说，这是一份需要思考力的职务。有些朋友很羡慕我们天天可以免费看电影，我们却是看了电影要工作，

所以一听到要上试片室看电影就害怕。当年我们早上试华语片，下午看粤语、潮语或台语片，有时也要看英语片。晚上电台职员来录音，为影片做宣传，我常代表公司招待他们。一天看3套电影，看多了，没有乐趣反而有受罪之感。

柳北岸主任是文人出身，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没有上司的架子。我们虽然多次要求改善待遇，工会也频频向公司施压，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了解他的处境，没有怪他，反而跟他打成一片，融洽相处。

有一次他答应新加坡电台要出席一个文化课题的座谈会，录音的时间到了，他却病倒在医院。他召我到医院去，当面要我代表公司出席这个座谈会。我知道他有意提拔我，心中万分感激。到电台录音室一看，参与者是星洲日报资深的主笔廖颂扬，南洋商报编辑同时也是我的文学导师杨守默（杏影），还有其他两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主持人是极负盛名的冯仲汉。除了电台广播之外，他们还把5位主讲者的讲话内容连同照片，登载在《电视与广播》双周刊上。有机会与这几位学有专长的老前辈一道谈文化，使我的知名度与地位提升了不少。回想起来，在我年青时，新加坡有3位著名文化人士提拔过我。一是柳北岸；二是杨守默（杏影），他长期鼓励与指导我读书与写作，并大量选刊我的作品在《文风》副刊上；三是刘笔农，他把我的各类型文艺创作都编成单行本发行。这3位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的！

话说我们中文部好几位同事都有抽烟。漫画家张洋，诗人杜红，还有一位才气磅礴的吴莹莹小姐都是同道。被我们誉为一代报人的《新报》主编，也是易润堂部长岳父的黄科梅更是烟不离手。而我们的柳北岸主任不敢叫我们戒烟，因为他本身也是烟客。我们中文部弥漫的烟霾要比别的部门来得浓。有一次，我戒了两天烟，张洋就静悄悄地放了一支烟在我的桌上，要我抽。我说我正在戒烟。他说：“做人何必这样折磨自己，你看金马仑的山番到深山去辛辛苦苦地采集到老虎奶，带到打巴市区来不过换一点食物和几包香烟回

去抽，你现在有得抽不抽。那又何苦来哉！”可见在这个环境，要戒烟也不容易！

正因为我们部门的烟雾太浓，引起了总经理的不满。他每天都借故洗手，穿过我们的办事处到厕所去。其他的同事看到他巡到了，都给他面子，把香烟隐避一下。只有我还是望看天花板在吞云吐雾。他显然是很不满意，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我也不把他当一回事。

几个月过去了，他显然是按捺不住了。有一天他召柳北岸主任到他的房间问道：“你请的新职员到底是负责什么工作？我每次巡过，看到他不是抽着烟望着天花板，就是坐在那边傻想，没有一次看到他工作！”

柳北岸说：“他抽烟，我们赚钱！”

总经理摸不着头脑：“哪有这种怪事？”

柳北岸说：“他不是抄写员，所以你看不到他埋头在赶抄东西！他是负责审核我们香港正要开拍的电影。他是在想桥段，如果他能想出更好的情节，我们拍的电影就越赚钱了！”

从此之后，我们的总经理就很少再来巡视中文部了！

〔2005年1月1日和2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左二）大半生烟不离手。

旧关仔角

请到旧关仔角面叙

我在19岁那年，参与策划全马有史以来最大的学潮。那一年，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支镇暴队，听说首次派上用场就是到来发射催泪弹把我们驱散。那一年，当学运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不知何方神圣的地下份子，派人送来一封信，指示我要如何把学潮搞起来，我因不满他想躲在幕后垂帘听政，为了引他现身，便约他在旧关仔角见面……。

不需要别人来恭维我，到了50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当年那股牛仔不识虎的蛮干勇气，我自己多少都有点佩服自己！

近日与华总文化委员会的陈达真、冯万顺及妇女组的关名侖陪同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高级策划王鲁湘访问槟城，受到以拿督林玉唐为首的槟城中华大会堂诸位董事的隆重接待。在会场忙于拍照的洪森合跟我谈起曾阅读过我在60年代初期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穷途》，才知道他也是我难得的文友。第二天他又特地送来一本《乔治市马华五支部研究华文中学校学潮十五人小组委员会报告书》，翻阅之后，这陈年的沧桑往事又不禁萦回在心头。

5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我从中路下来巴生一所中学读初一，才上了一学期的课，校长在半夜里给人家请出去，终夜没有回来。第二天清早园丁发现他的颈项被砍得只剩下一层皮，吊在宿舍后的山竹树上。我来槟城就读于钟灵高中之前两年，陈充恩校长被

狙击身亡，更早时也有一位教师惨遭暗杀。

我当时想在这样的血腥年代，要自求保重，最好是埋名隐姓，做个顺民，如果样样想强出头，最终可能落得做头损角！于是，我远赴槟城钟灵中学。

但进入这个新的环境，并不是一个静的环境。学校除了校风很严，功课很紧外，也鼓励学生多参加健康的课外活动。校内学会很多，可说应有尽有，更难得的是学术竞赛也多。我在钟灵3年中先后做了级长、级长执委、《学报》和《沙漠风》编委，也在作文比赛和演讲比赛中得奖。最主要的是在风风雨雨，排除万难后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出任主席。这个组织变成校中最受瞩目的团体。也因为这样，我很自然地就被推举为学运的领袖之一。可能是周围有很多同学支持，我对于早前那种耿耿于怀，唯恐被地下组织盯上的恐惧感逐渐消失了。

与其说是有同学支持而壮胆，不如说是学校当局对学生的高压手段与对华教不利的行径，使学生的反抗情绪达到高潮。那时候一连串发生了几次风波，包括为南大义演事件、戏剧组事件、中元点唱事件及《学报》事件，学生的反抗情绪已箭在弦上，再加上学校秘密接受政府特别津贴，各方面都在忧虑它会跟着变质。大家担心，此例一开，其他中学就会在有例可循或在巧言诱导下前行后效。真正的导火线还是从这方面引爆。

在罢课集会之前，在沸沸扬扬的气氛中，有一天有个别班的同学送一封信给我。我拆开一看，是一封密函，没有署名，也没有通讯处，文笔清秀老练，内容是指示我在当前的处境中如何将事件扩大，搞成一项反殖运动，而且暗示时常会通过有关方面跟我联络。我为此纳闷了几天。这就是我过去所害怕会碰上的，现在可说是上得山多终遇虎。

再过几天，另一位学生领袖偷偷地出示另一封密函给我看。我展阅之下，笔迹相同，内容大同小异。我明白他是要我们冲锋陷阵，他却躲在幕后运筹帷幄。多写意的一宗没本

生意!

我当然不服他的指令。如果是有诚意的话，他应该现身来商谈。于是我壮起胆来，给了时间和地点，通过那位送信的同学，约他在一个晚上，在旧关仔角见面。

我说不怕，其实是违心之论。我们策动学潮，如果马失前蹄，最多是被拘捕，拘留的时间是天长地久有时尽，而且在狱中还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跟这种幕后人物谋面，如果攀上关系，就有如侯门一入深似海，而且进去容易出来难。再说如果见了面，他提出的要求我断然拒绝，那又会有什么后果呢？会不会有一颗子弹就当面飞过来？这对我可说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

读李光耀的回忆录，看他描写三番两次会见马共全权代表时那种偷偷摸摸，诚惶诚恐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当时是反对党领袖，如果被逮个正着，可能断送他的政治前途。但当我在旧关仔角海滨，等待我的这位“心上人”时，我的心怀是比较坦荡的，因为我一无所有，我输得起。

只可惜我等到半夜，他都没有出现。他不肯或是不敢出面，我也就没有义务听他的了!

大学潮终于爆发，它使向来都是宁静的槟岛，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动荡中。

在中篇小说《升旗山下》，我这样写道：“发生了这件大事，我们被开除是难免的。平心而论，我们十来个领袖，因为策划罢课，被开除学籍应该是无怨无悔。但校方为了使这项运动后继无人，却乘机开除了几十个同学，这冷酷的手法，可说是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我们深受华文教育的熏陶，在“爱吾华教”的感召下，揭竿而起，牺牲小我，最大的目的是在唤起华教人士的关注，认清特别津贴对华教的弊端!这个主要目的即已达到，我对其他诸如执政党的组织调查委员会，反对党的藉机声援，也就意兴阑珊了。与其旷日持久地留在槟城，期求有关当局网开一面，不如道声后会有期，自己好自为之，去奋战前程!

我终于“抖一抖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走了。

离开槟城的那天傍晚，“平静的槟威海峡，在渡轮驶过之处翻起了几道白浪。我在自忖，一切的成败得失，所有的公义私情，都将随着这白浪而消失无踪，变成船过水无痕。但我们的大胆抗争，我们的无畏牺牲，会否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点滴的痕迹呢？”

这以后，我在巴生老家度过半年坐困愁城的日子，然后前往新加坡在育英中学完成高中课程。以两年时间在莱佛士书院修完高级剑桥班后，我在一家电影公司服务了两年。在60年代初期，以私人资格进入哥伦比亚计划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短期电视编导研修班。

返回新加坡后，承杨子国兄的举荐，想进入一个附设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工作，但那时新加坡已并入马来西亚，我的个人档案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政治部的审核。后据友人告诉我说，有关方面回示我与共产党活动无关。不久后，我就出任新加坡文化部《电视与广播》主编。

〔2005年1月8日和9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1956年，征雁（前排左一）在槟城钟灵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回首往事

物极必反 事出有因

在战前与战后，大马华文教育界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榴梿上市，先生找位置”。这是因为榴梿在年底12月盛产，那时做教师的服务情况如果学校董事部有所不满，在发下一纸公文之后，教师就得打卷包袱，四处去另谋出路。

这说明当年董事部的权力是很大，很完整的。

到了50年代独立前三两年，由于槟城钟灵中学秘密接受政府的特别津贴，董事部职权即而面对危机，那一言九鼎的情况已日薄西山，开始式微了！

根据《乔治市马华公会五支部研究华文中学学潮15人小组委员会报告书》指出：“在马来亚激起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过程中，自然引起众多之变动。尤其华文教育在此数年中之激荡，使华人社会更为关切。华人之传统习惯一向都以后裔子孙之教育为重，因此华人为着保全自己之文化与母语，经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过程中，掀起强烈有力之反应。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之教育白皮书第67号是华人社会反对最烈之对象。根据上述法令而实施，华校将会全部变成英文学校，而华人社会所费之心血与金钱所建立之华校将落在政府手里。”

报告书续称：“当年的教育局曾公开表示，政府之所以批准津贴金给钟中，是钟中符合新教育政策，根据1952年教育法令，可承认为合格的学校。钟中是第一间备受恩惠的学

校，其他华文学校如欲申请同样津贴金，应以钟中为模范。此种政策与1952年教育法令同样造成华人社会不安之情绪。他们所反对者是津贴金之条件可能改变钟中为英校，同时董事部对学校之权力将逐渐消灭而由教育局代替。另一方面，钟中与政府所签之合约，不但无公诸社会，连全体董事部亦未知其内容。”

由于钟中这种私下秘密的行径对华教将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我们就读于钟中的学生深感惭愧，而钟中也愧对华教，愧对华人社会。在那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50年代，那些热爱华文教育，热血沸腾的钟中学生领袖，岂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于是明知将面对牺牲，也义无反顾地开始行动了！

河海不择细流而故就其深，学生因为承受了很多打压与不合理的对待，才会酿成大学潮。

学校在接受了特别津贴之后，对学生不是循循善诱，而是一有异动，就把他们当成颠覆份子来对待。当年发生的许多大小事例，学校的高压手法可说罄竹难书。调查委员会在经过仔细地收集资料之后，将学潮的另几个原因臚列于下：

(1) 学生林水良与3位学生在膳厅商讨如何继续为南大义演问题，被钟中训导主任硬指为非法集会，乘机取消林水良之学长职位，同时不准他参加一切课外活动。不但不允许学生选举新学长，接着下令解散级长会议。

(2) 钟中戏剧研究会为富有意义和正当之文娱组织，且经董事会议一致通过而合法成立。校长不但不加以鼓励，反而列出苛刻条件，迫该会顾问负起一切意外责任，致使顾问一职无人担任，会务一再拖延，未能活动。后得赵泽洪、梁润洲、许西亚等教师表白立场，骆清泉监学加以保证方选出顾问而正式成立。校长除了强权制止该会舞蹈、歌咏及国乐各组之活动外，又限定会员不得超过一百名。笔者对此深表不满，因为我是戏剧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同时出任会长。同学们咸认此乃健康且富有教育性之文娱活动，却遭校

方阻碍及摧残，那种委屈与不平，也是学潮起因之一。

(3) 槟城各区为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筹募基金而举行中元节点唱大会，此种维护华校之正义行动，深得各阶层人士热烈支持。当时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曾莅场演说打气，而推动这项运动的两位铁马金戈人物是李典谟与郭银城。华校学生为维护华文教育而点唱筹募，岂能加以非议？不料高中三某同学竟受到英文顾问菲色素之干涉，同时将该生开除。经社会人士及点唱大会代表多方奔走下，该生方得准许回校就读。自此以后教育局便通函各校禁止学生点唱捐款。学生对华教的热忱不因此而善罢甘休。还记得笔者与其他学生领袖发动了一大批同学到点唱会场去义顾脚车，在多多益善，少少不嫌的原则下把捐来的义款，悉数献给教总。

(4) 钟灵《学报》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季刊，在事发前10年即已创立，旨在提倡文艺写作技能，提高阅读水准。该报所发生之事件，可分为3个阶段来谈。

(A) 第1个阶段：《学报》发刊至第39期，社长胡万铎、主编万景添、主管梁丁尧等7人（即吴国良、林阴文、胡万铎、侯国驹、陈逸生、万景添、梁丁尧）被政府引用紧急法令拘捕。学生为维护全体同学应有之基本权利及人身安全计，乃一致停止考试，提出抗议并协助营救被捕学生。

(B) 第2阶段：第42期《学报》刊登一幅鲁迅遗像，竟引起训育主任深表不满，随后即宣布教育局出版法令，所有稿件应由顾问检查，只准校内发售，不得接受外稿。而校长又表示非得他本人之同意，任何导师不可轻率担任《学报》顾问之职。《学报》在无顾问的情况下，足足停刊一年。

(C) 第3阶段：学生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引虎入室，迎来训育主任当顾问。于是积极筹备第41期《学报》之出版。但又是好事多磨。由于有两篇文稿未经顾问盖印即下版印刷，于是风波再起。社长杨荣标被开除，主编陈源松记大过两次。学生为同情社长及主编被开除与记大过，无辜断送同学基本求学权利，即请学长向校长求情。不料学长当晚就

被政治部拘捕。以后学生再也不敢派代表见校长。

虽然学潮不是单因《学报》事件而起，但却在这个时候引爆。

报告书也在不很显著的版位，述及其他几个学潮的起因，包括：

(1) 初级文凭考试之条例，规定英文及巫文为必修科，华文为选修科。教总曾议决通令全马华校杯葛考试。校长身为教总副主席却阳奉阴违，甚至代学生缴交考费。

(2) 教务主任一职由一英文教师担任。他对华文课程之安排，殊难符合华校传统精神，且令人怀疑。钟中在接受特别津贴金之后，将渐渐地把华校纳入纯粹英文学校之范畴。

(3) 凡未得校长准许，学生不得私下见任何董事；若学生欲呈函董事部，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盖章后，始可寄出。再加上学生最高组织级长会议被解散后，学生意见无法表达，在此情况下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闻。

物极必反，事出有因。空穴来风，其来有自！

时间是1956年11月23日，地点在槟城钟灵中学，马来亚最大的学潮爆发了！

结果导致68名学生被开除。笔者有幸，“大名”高居榜首。

[2005年1月15日和16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1956年底，警方镇压钟中爆发的学潮。



2005年12月11日，征雁（前排右一）出席爱校运动50校周年聚会。



征雁在爱校运动50周年聚会上讲话。



征雁（前排中间）在爱校运动50周年聚会上与老同学交流。

回首往事

忙中有错 错中有对

有人说礼多人不怪，也有人说礼多必诈。

到底我们行使礼节时，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定。礼太多了，逢人打恭作揖，卑辞厚币，人家会认为你必有所求；礼太少了，忽略了应有的亲善与敬意，人家会认为你缺少修养。

就说写一封公文吧，小时候我们读尺牍，读应用文，比较注重格式与礼节。现代年轻人写的是洋式公文，有话直说。当然如果执笔者的功力好的话，还可以写得面面俱圆，要是粗心大意，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有时是会贻害无穷的！

在政党服务处理一件事情时，有时由于太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与解决方式，或许会忘记了对周边环境与单位的关照，这也会引起反应而产生阻力的。

话说那一年敦陈修信前往西欧成功地动了一次大手术，将他的一个肺割除掉。回归时马华在梳邦机场发动了一项成千上万人的大集会来迎接他。场面之所以如此盛大与隆重，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与首相敦拉萨私下谈判要出任副首相不成功，再加上健康情况不佳，马华上层经已体会到他对政治已经意兴阑珊了。大家都预测他归来后不久，就会从马华的高层自动引退。这样一个激情与温馨的局面，希望他老人家在辞官归故里之后，回想起马华时还会“意难忘”。

我当时是雪州马青团长和雪州联委会组织秘书，人群的发动主要来自雪州，所以被委为总指挥。在其他各州的配合招募下，梳邦机场标语招展旗海飘扬，可说是万头攒动。比较凸出的一项安排是我们把吉隆坡及周边地区的舞狮队能够请到的都请了来。那20多头狮子再加上锣鼓喧天，幸好梳邦机场是已经开发的地带，要是在深山野岭，真的狮子看到这种气派，都要落荒而逃。

等到敦陈的班机快要降落了，有人捎来消息说我们舞狮准证警方还没有发下。我急了，找人向警方探询，警方回答说我们并没有申请准证。这一下我更急了，再找到负责申请准证的职员查问，还好这位仁兄有点经验，把信的副本也带在身边。展读之下，我才明白问题是出在哪里？

这就是公文写得不够周全，不够礼貌。

原来，信的内容大意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集会，有20多支醒狮队在现场表演，我现在谨此向你备案。

如果你是警方负责人，看了这封信，你会满意吗？首先你没有向我申请，其次你没有要求我发给你准证，我只好按下不表！

幸好当时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沙菲依也赶到机场。他当然不是为了我们的舞狮而来，而是因为敦陈是资深内阁部长，他特地赶来接机。我们也乘机派有分量的人跟他疏通，并对这“技术上的错误”表示歉意。

也惟有这样，这场接机大会才能圆满落幕！

一两年后，同样的公函上的纰漏又发生在我们马青分团的宣誓礼上。

那时候，我们在瓜雪有位忠诚的支持者郑亚今先生，他是经营海上蚬蛤的采集生意，拥有一艘可容百多人的大木船。就因为见了这艘大木船，我们动了脑筋，认为如果可以利用它驶到大海上，然后恭请两三位部长在海上为我们主持监誓仪式，那的确是别开生面，很可以博取宣传的一项创举。

积极筹备下，三位华裔部长请到了，参典的团员十分踊跃，可说万事俱备，只待开航。

我因为有梳邦机场舞狮事件的前车之鉴，要求负责申请警方准证的工作人员将公函副本拿来看看，展读之下，又是犯上老毛病。执笔的人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有三个部长的势可仗，所以措词就不拘礼节。信的内容是：定于某日某时在某个地点，有三位部长将莅场主持仪式，希望警方加强保安……

固然，有部长出席某个集会，加强保安是警方份内的事。但这个集会本身就有劳警方作同情的考虑，给予批准。或许警方会认为，为什么你们马青团，天上有路你不走，地下无门你闯来，在陆地上有大礼堂让你们宣誓，你们不此之图，反而跑到大海上在一艘破旧的木船上来进行。万一木船失火怎么办？万一碰上海盗上船骑劫怎么办？这些都难怪警方要细心考量的。

知道了自身疏失，赶快再写一封行文婉转，礼貌有加的公函呈给当地的警区主任，才算又过了一关。

至于到基层去排难解纷，纾解民困，所到之地如果有支部或区会的设立，也必须先跟当地领袖有个照会，如果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地头上横冲直撞，有时也会闯出毛病来。

70年代在一场改革斗争后，马华这个党呈现四分五裂。当权派为了重拾旧山河，积极争取民心，推行了多项改革。在为基层服务方面也大大加强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跑得最勤的是两位部长的政治秘书雷大庆和林廷甲，还有林方清和许堃锐等。通常是一有投诉，几个人就马不停蹄跑到现场去了解状况，再设法加以解决。

我也先后几次跟他们进出于甲洞区，去解决一些木屋问题，去得多了，就有消息捎来，说甲洞区的区会领袖对我们的行动略有微词。定神一想，难道为民解忧也有错误？后来才知道，又是患上老毛病，没有先照会当地领袖，就等于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于情于理，都是我们的疏失。最后还是

由我这个组织秘书去面对。幸好这帮领袖都很通达事理，表现得彬彬有礼。当时马华元老陈金火先生也在场。我自知理亏，先行认罪，并保证日后这种错误不再重演。他们也说得很好听，说马华是大家的，希望基层日后也有机会扮演分忧的角色。于是圆满收场，而我又上了一课！

另一个事例发生在福隆港。当时雪州马青搬师百余众，租了一座别墅，在山上举行三天两夜的干训营。又是上山没有拜土地公惹了祸，傍晚时分有人通知我当地马华领袖在咖啡室等我，要跟我谈谈。我带了我的助理吴华光赴会。起初气氛是不很融洽的。他们一直埋怨我们没有事先写信通知他们。这次我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我是团长，是干训营的负责人，对这项疏忽，只好道歉再道歉，最后为了使双方皆大欢喜，我邀请他们几位领袖明日清早光临，陪着几位部长一起检阅仪仗队。这样他们觉得有受到主办当局的尊重，事情才摆平。

其实，基层领袖被上层忽视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大凡一些组织或领导人物，都希望高层领袖看得起他们的领导，对他们的组织也欣赏。这种大型活动在当地展开，他们一无所知，如果街市上有人问起，他们哑口无言，这种屈辱感是任谁都受不了的。

年轻时候城府不深，处事卤莽，难免忙中有错；但知错能改，及时纠正，也可说是错中有对。

〔2005年1月22日和23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回首话当年

司仪·诗人·演员

司仪要面对群众，演员要面对观众，诗人虽然可以躲在书斋吟咏作赋，但他们的作品也得面对读者。这些需要大众支撑的行业，从事者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群众品流复杂，要求也可能很苛刻。

群众希望所接触到的司仪、演员与诗赋都能做到隽永、隽茂、隽拔。隽永是说话要意味深长，隽茂是指优美，隽拔是英爽特出。这种要求，谈何容易！就像我写《回首话当年》就是想到写到，在文字上不作刻意雕琢，那又能隽到哪里去呢？

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有些是阅读到的，有些是自己体会的，可能有点要求过高，但不妨提出来大家研究，能够接受的敬请笑纳，不能接受的可当着笑话数则，无须认真。

先说司仪。有的司仪麦克风一到手，就把整个舞台当作自己的天下，口无遮拦，言所欲言。有些是主席或贵宾讲话之后，他怕台下的听众不了解，又把他们讲的内容重述一遍，把听众的智慧与理解力都否定了，总之是要显耀自己，爱出风头。

一个有组织性的大会，一个有经验的负责人，通常对司仪的要求很高，不允许司仪在台上信口雌黄，也不允许他有半句废话。

由于华文是一种比较艰深的语文，可能你讲了废话而不

自知。

有一次在一个大礼堂听当司仪的友人作以下的报告：“大会现在要恭请会馆的会长，也就是大会主席上台来跟各位讲几句话！”

半夜里跟他喝两杯时，我说：“你刚才的报告表面看起来十分通顺，几乎无懈可击。但深一层研究，还是有一些废话！”

他说：“愿闻其详！”

我说：“既然大礼堂有舞台，主席要讲话肯定会走上台来，他不会跑到厕所里去；而上得台来他一定是要讲话，不可能上来跳迪斯哥！所以你的上台来跟各位讲几句话，就显得多余！”

他问：“要怎样讲才好？”

我说：“最好的台词是，现在恭请大会主席致词。”

牡丹已经很美，不需要绿叶扶枝，有时加油加酱，变成喧宾夺主，反而会模糊了主题。

可能是我的分析单刀直入，不够婉转，他一时接受不来显得有点不爽。因此我日后有什么意见也就不敢跟他再提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批评那首描写清明的七言诗有一些用词是多余的，可以把它改成五言诗。虽然改了之后，在押韵与行文上未必好过七言，但他指出的多余的字句是可以参考的。

七言诗的原文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批评者说，清明本来就是一个时节，所以时节两字是多余的，可写成“清明雨纷纷”。至于路上行人欲断魂，他说这一句更离谱，因为行人肯定是走在路上，不可能浮行在天空中，也不可能踏步在海上。这一句可删成“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借问两字可省了，变成“酒家何处有？”最后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他问谁？谁回答他？那怕

是一个樵夫、渔妇都不重要。可缩成“遥指杏花村”。

改成五言诗后变成“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前两句还顺畅，后两句好像没有了主词，缺少了些什么！

最后要谈的是演员。演员是一出舞台剧、电视剧或是电影最直接跟观众有联系的人。演员的表情动作与对白台词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部戏的成败。

虽然对白与台词是躲在幕后的编剧和导演编撰与操纵的，但讲得拖泥带水，讲得沉闷乏味，观众一般上都先怪罪演员。

有个时期各大华团在推行讲华语运动，但电视台却大量放映粤语片。大家都在暗忖这是文化部跟华团唱反调。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资深的广告界人士说这跟文化部无关，实际上是很多大厂商都不愿意在华语片中打广告，粤语片他们反而乐于接受。

什么原因呢？原来那时候香港拍的多是粤语片，中国片还没有进来，我们此地的华语片多是台湾的出品。行家认为，香港的片子有节奏感，对白简练，剧情发展明快。马来西亚观众看惯了，喜欢这一类的剧情片。反观台湾的华语片，节奏慢吞吞，对白罗里罗嗦，两个人的对白可以拖上几分钟，而且太多说教。

可是在任何形式的戏剧中，台词学是占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兹举一例，两个演员有一段对话如下：

甲：你要上那儿去？

乙：我要去找导演。

甲：你去找导演干什么？

乙：我要找导演拿钱呀！

这四句对白；看是通顺，毛病在于重复的用词太多。现代人拍戏，只要对方明白，讲得越简洁越好。他们的对白要是能像下列的快速扼要表达或许会更好：

甲：上那儿？

乙：找导演。

甲：干吗？

乙：拿钱呀！

写上这么多，或许会让人觉得华语华文的确是不容易读的，所以不论写文章或是上台讲话，在遣词用字方面都要小心谨慎，以使自我提升，因为华文的一个字有时有多种读音，也有多种解释。难怪有则笑话说，有个外国人学华语，他跟人家说有一条人，老师听了纠正他道，人不可说一条，要说一个，外国佬牢牢记住了。等他华文学得有点小成后，他对外国朋友说：“中国人实在莫名其妙。我说一条人他们说不对，但他们自己都可以说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

〔2005年1月29日和30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1968年，征雁（后排右一）亲自导演他的独幕剧《别后》，要求演员的对白简洁、口语化和生活化。

回首往事

忆良师·念师母

在课堂上，如果老师对课文的讲解有条不紊，层次分明，让你听后能豁然贯通，完全彻悟，你对这位师长肯定会印象良深；在舞台上，如果戏正公演，你突然忘了台词，处于凄楚无助的情况下，你同台演戏的对手，若是资深演员，他可能灵机一动，把你带出困境，你肯定会对他感激涕零终生难忘！

我算是有幸，曾经先后认识这样的良师与益友。他们是一对夫妇，男的是地理教师陈振亚。他是新加坡著名作家，笔名洛萍，写过许多小说，也是艺联剧团的导演之一；女的是新加坡电台著名主播江莎，由于声质优美，华语纯正，有金嗓子的美誉。

50年代我在联邦因学业受到挫折，转到新加坡育英中学完成高中课程。这所中学聘请相当多的香港老师，这其中除了华文老师郑枢俊的国学根底很深，最优秀的要算是教地理老师陈振亚了。这期间虽然香港名作家力匡也受聘到来加入教师阵容，但他的港派作风，我并不十分欣赏。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他挤上一辆开往加东的巴士，由于座无虚席，两人一起握紧铁枝，一前一后地站着。我有与荣焉，能跟心中崇拜的作家作近距离的并驾齐驱。于是我恭敬地问道：“请问您是力匡先生吗？”詎料此君一声不响，过了一会，才将手中握着的扇子一挥，察得一声，一幅山水画展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力匡的两字。虽然我对他学足古装戏中风流倜傥

的书生模样心存芥蒂，但并不影响我对他文采非凡的仰慕。往后，他在报章以显著版位发表的散文，格局新颖，清丽隽永，我还是每篇都追着来读。这已是题外话，暂且不表。

话说陈振亚老师教地理，有一套优异突出的教学法，听他一席话，胜读整本书。他是文学家可以将所要讲解的资料循序渐进，层次前后地先打好腹稿，加上他长年在教育界服务，已练就一副伶俐的口才。听他一节40分钟的地理课，他用心地讲，只要你用心地听，就大致上了解马来亚半岛的地理概况。你无须去死背强记，只要了解他分析的原理，你对马来亚的地势山水，风向雨量，物产民生都能融会贯通，了然于心。

他先是把马来半岛的地形画在黑板上，最重要是强调中央有座主干山脉，由北向南迤邐而下。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西边隔着马六甲海峡有苏门答腊岛，岛上有崇高的巴东山脉。再过去就是沧茫的印度洋。

强调这两座山脉是他讲解本区域地理的重要关键，因为它影响了我国的气候与民生经济。

另一点他要学生了解马来半岛面对两种季候风，一叫东北季候风，一称西南季候风。了解这两种季候风的吹拂方向与带来的雨量，才会了解东海岸之所以落后，西海岸却富庶繁华的原因。

然后他讲到正题：东北季候风大致上是在每年10月至3月期间吹拂。由于南中国海在炎阳普照下蒸发着大量的湿气，形成厚厚的云层，当风从东北方向拂来，它带来大量的雨水，于是东海岸封港、水灾、交通断绝时有所闻。但在西海岸，因为主干山脉阻隔了狂风暴雨，所以气象却迥然不同。

西南季候风大致上是在每年的5月至9月间形成，它从印度洋吹向马来半岛，同样带来大量的雨水，但由于在苏门答腊有巴东山脉阻隔，风势吹到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已成了强弩之末，产生的破坏力比较轻微。

到了这个阶段，他才谈到马六甲海峡。

由于东北与西南两次季候风的肆虐吹袭，都受到主干山脉与巴东山脉两座天然屏障的挡驾，马六甲海峡因此一年到头都风平浪静，许多大城小镇都沿着海岸建立起来，而这条海峡也变成全世界最繁忙的海运水道之一。

了解了这个天然因素，东海岸之因为缺少发展而显得落后、贫困，西海岸则大事发展工商发达，变成繁盛荣华，就不难理解了。

读了我所讲述的资料后，你已对马来亚的地理概况知晓七七八八了，至于其他的物产则比较容易记。稻米的产量最大的地区是在吉打与雪兰莪的适耕庄；锡米产区在近打河流域和巴生河流域，橡胶的种植各州都有，只是有疏密之分。当年的油棕种植还不成气候，可与黄梨、蔬果等稍为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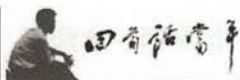
当年我在新加坡读经济课文时，必须熟读马大副校长翁姑阿齐斯写的一本有关马来亚的经济书籍，其中分析东西海岸贫富悬殊的现象，就与我们已经读过的地理知识一样。足见研究地理，不仅是神游于山水之间，它与民生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尊崇陈振亚为良师，不仅因为他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扼要的方法，让我们了解最全面的地理知识，他还在往后的日子里，指点我如何编好一本政府的刊物。

事缘我出任新加坡文化部《电视与广播》主编职务时，陈老师则在总理公署当文官。由于文化部与总理公署只有一层楼之隔，我们经常顶楼的咖啡所聊天。他跟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知道的事情也较多。所以常在编辑方针，及面对敏感课题时要如何处理，都曾给我诸多指示。

至于我会跟师母江莎女士同台演出，是意想不到的事。

那时我只是写写独幕剧，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粉墨登场。不知怎的给艺联剧团的导演周立良与电视台华文节目总监连当能看中，要我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的《清宫怨》四幕剧中扮演光绪皇帝，而江莎则饰演珍妃。我不敢接受，连番拒绝。他们盛意隆情，再三劝说。后来我想，光绪皇帝这个



角色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成，有的是内心戏，我这木讷刻板的表情与光绪无所作为的消沉形象一比，大概还没有上演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于是我决定作大胆尝试。

在新加坡，江莎的芳名可说红透半边天。她是电台著名的主播，我们有机会与她同台演出，其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此君十分和善，没有一点架子，而且很乐于指导后进。有一天我与江莎在排练一场谈情戏。陈振亚看了之后对我说：“你演得不够放，感情没有投入！”我说老师在台下看着我跟师母谈情说爱，在感觉上很别扭，行动上很受威胁。他说：“你应该把我抛到脑后，放胆进入戏中，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等到《清官怨》正式公演时，维多利亚剧院全场爆满，台下由部长级人马及文化界众多贵宾前来捧场。我却差一点当众献丑。与珍妃的一场重头戏演至一半时，我突然觉得脑筋空白，把接下去的台词忘了。在紧急关头，拼命侧耳倾听躲在幕后的提示给我念的台词，但完全听不清楚，处此绝望的情况下，冷不防，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江莎拉了我的手，转身往舞台后部的一个窗口走去。这时，我们已背向麦克风，她轻声偷偷地骂道：“死鬼，你又忘了台词。”于是她把我应说的台词轻念了几句，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们走到窗口，她指着窗外加上一句：“皇上，您看今夜夜色多美呀！”刚好窗外的天幕是树影扶疏。然后又拉着我的手，漫步走向前台，继续演下去。这段临时穿插的戏，台词也动了手脚，但在江莎圆滑自然的操作下，演得天衣无缝，免了我的“英名”毁于一夕！

所以说，跟有舞台经验的老演员同台演戏，是有绝对好处的。这件事虽然相隔将近40年，每当我想起师母江莎挽救狂澜于即倒的一幕，都会感激得不禁要清哼一句：“我永远怀念你”。

[2004年12月2日写于上海旅次，
2005年2月5日和6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新加坡电台访员林汉良（左一）跟《清宫怨》导演和主要演员访谈。征雁（左二）和江莎（右一）都在场。



陈振亚遗照

征雁（右）在《清宫怨》中饰演光绪，江莎（左）则饰演珍妃。



《金小玉》剧照。



征雁参与《金小玉》的演出，冯爱瑛前往探班。

大地无声除旧岁

春节一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贴上红联，看来是春回大地，欢乐满堂。其实，欢乐的背后有忧伤，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除了那些腰缠万贯的，其他普通的工商界人士，碰上行情不好的年头，银行催账催得紧，客户迫债迫得凶，工友的花红追得急，做老板的要渡过年关，真是谈何容易！

至于一般受薪阶级，学校开学伊始，几个孩子的学费杂费刚交代清楚，年关又到，百货市场的贺年礼品及新年饰物虽然琳琅满目，但总有捉襟见肘，爱莫能助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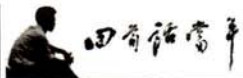
但新年总是要过。于是贴上楹联：“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有这种门联贴的，还算是不错的人家。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落魄人士，他们有联无处贴，虽然他们的对联是：“一碟残肴除旧岁，半碗冷饭过新年。”

而那些受天灾摧残，流离失所者和那些偷渡来马，受到警方追逐又失业的外劳，要如何过他们的年呢？岂不是要像古老的对联中所说的：

租半间茅屋栖身，坐亦由我，卧亦由我；

买二斤萝卜度岁，饭也是他，菜也是他！

华人的习俗，新年要燃放爆竹，是为了迎新去旧，为了增添欢乐的气氛。但已经很多年了，由于政府禁止燃放，我们是在大地无声中除旧岁的。说是无声，其实也不尽然。春



节一到，你侧耳细听，远近左右，都有爆竹声在响，只是疏疏落落，不敢明目张胆地放，但是到了初九天公诞，一过午夜12点，鞭炮声排山倒海地此起彼落。拜天公的人家个个像吃了豹子胆，肆无忌惮地燃放着。

政府虽然三申五令，告诫人们燃放鞭炮是违法的，关卡也时有破获爆竹的违禁品，并绳之以法。但为什么每逢佳节期间，民间的火力还如此充沛呢？想来这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边厢你栈道明修，那边厢他陈仓暗度。这么一来关卡难过关关过，办法总比困难多！而民间也多抱着侥幸的心理，先放了再说，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非法与伤风败俗的勾当，取缔之后，春风吹又生，想来都是这“将”与“土”在作祟。

爆竹在华人社会是有着深长的渊源，而新春礼节也跟华族有着源远的典故。

为什么要过年？过年时为什么要吃团圆饭？过年时为什么要穿红衣，贴红联？过年时为什么要放鞭炮？

这些古老的传说很多，引经据典者也不一而足。大概是年代经已久远，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不妨从很多版本中，试取其中一种说法来加以谈述。

古代人的说法，年是一种很凶猛的怪物。由于中国以农立国，到了年终谷熟了，农家把它当作是谷熟庆丰收的时节。这时候年就会出来毁家伤人，所以很多过年时要办的事都跟年的出现有关。

首先是吃年夜饭或是团圆饭。除夕之时，不管你是身在天涯或是远在海角，你都要不辞跋涉的劳苦赶回老家与家人共吃团圆饭。这表示孝敬你的长辈，爱护这个家，大伙儿团聚起来，以免家受到年的侵犯。

至于过年时要穿红衣，结红彩，贴上红色的楹联，那是有这么一个传说，说一个小妹妹在春节期间穿了一身红衣往门口一站，居然把那头年给吓退了。消息传开，以后家家户户过年时，家中的装饰都以红为主色。

在没有火药的年代，人们为了预防传说中的年逼近民居，在春节期间大家都敲盆打桶，或是燃烧竹子使它发出劈劈拍拍的声响，来吓退年的侵袭。火药发明后，逐渐演变成炮竹，除了保家还能增加喜庆欢乐的气氛。

我们当年在“庆元宵”时，也在会馆猛放鞭炮。每位董事乐捐100或200令吉，这样凑起有几千令吉，买来的大型炮仗可说是火力凶猛。燃放起来炮声轰动遐迩。原本是本区域最精彩的元宵胜会加上这震天撼地的响炮，就更有看头了。

我在宣传文告中说会馆将于元宵节燃放10层楼高的鞭炮。有人说我车大炮，因为会馆充其量也才3层楼高。其实我此言不虚，因为供应商林呈铨老哥派他的员工把我们所买的炮仗统统给串接起来，悬挂的时候还出动吊车，从底层拉上3楼，再让它垂下地面，然后再挂上3楼。如此弯弯曲曲，周而复始，如果把它拉直，的确有超过10楼高的长度。

为了安全起见，会馆的龙舟手与廿四节令鼓手全面出动。他们备好火把与水管，分别守在大厦前2楼与3楼走廊，如果炮仗在燃放过程中有熄灭或引起火患，他们可以马上点燃或扑灭。

如此大阵仗要是跟新加坡人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听说在50、60年代新加坡武吉知马的九八行，在新年时放鞭炮是不计工本的。一则为了好兆头，二则为了不输给对方，你放多少，我就放多少，输人不输阵。入夜之后，武吉知马的九八行商业变成了火海。听说有些商家燃放的价值不下数十万。这种现象真是匪夷所思！

由于处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加上一些人缺乏公德心，燃放炮仗也肇了不少祸，诸如从高楼上扔下鞭炮伤到人，飞高的烟火或炮竹掉落屋顶或射入民居，引起火患。于是政府要华团表达意见，看新年时节是否应该禁止燃放鞭炮？

当然对此问题的看法是见仁见智的。我当时是大马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的文化主任。根据有关的统计，大马福建人占华裔500万人口中的40%有余。而大马福联总会的意见在相当

程度上反映了福建人的意见。因此总会长丹斯里林玉静要我综合各方意见后发表一篇文告，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在文告中强调，华人新年的习俗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认为鞭炮应该准予燃放，以使烟火不熄，炮声年年。当然有些具有危险的像射上高空又可折射打进人家庭院的烟火应该禁止。像高挂起来长串的炮仗，只要有人照顾，采取预防措施，是不会有危险的。为了不要扰人清梦或惊吓婴儿，也可限定燃放时间，让大家过个充满欢乐的新年。

但政府并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不久后警方宣布全面禁止放炮。他们既然另有高见，我们必然会遵守。接着下来我们会馆在“庆元宵”之前，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有可能是我们前几年在会馆的炮仗放得多，所以深受瞩目，也可能是我们福联的文告支持燃放炮竹，所以就有一些谣言传到警方耳里，说我们的会馆将不顾警方的禁令，继续大放鞭炮。执行秘书苏继业通知我这件事后，我请他转告警方方绝无此事，我们一定遵循政府的法令行事。

后来还是有各方面的人在私下探听此事，为了息事宁人，我再次发表文告说：虽然我要代表大马福联表明支持燃放鞭炮，但政府既已决定禁止，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负责人，肯定会从实照办。而一个偌大的会馆组织也不会因这等事跟政府抬杠。

话虽如此，当“庆元宵”在晚间举行时，一辆警察巡逻车还是停在会馆附近，大概是要观察我是否此言不虛。

走笔至此，已是腊鼓频催的时候，让我顺此向各位读者拜年，希望那些过得去的朋友，夜夜捞生，年年有余。而那些有灾有难，流离失所的人士也应该学王小二那样抬起头来，把希望寄托在来年，虽然他们今年要过的是：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巴生福建会馆燃鞭炮，庆元宵。



长达超过10层楼的鞭炮震天撼地，令人叹为观止。



1983年，巴生福建会馆举办教育周，教育总监慕拉（右一）莅临时，受到征雁（左一）等人的欢迎。

回首往事



他走了，在浓浓的夜色中

香 港回归之前，很多人惧怕既得权益会有所丧失，在新的主子踏足港岛时，政体会会有所变化。虽然邓小平申言再三，一国两制意味着马照跑，舞照跳，但忧心忡忡的大有人在。于是有的人束装就道移居美加，也有人坐困愁城，眉宇深锁。到了回归的跫音逼近时，走不掉的人寝食难安，如坐针毡，很多都患了失眠症。有则笑话说，有个病人去请教医生，医生劝他要看开，不要去多想这个问题，最好在睡觉前开始数绵羊，从一数到2000，这样或许就可以睡过去。病人说：“不行呀，我已试过了，当我数到1997时，我又吓得跳了起来！”

在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50年后，东方的睡狮于兹苏醒。中国从沉沦中崛起，她要以坚定的信念收回香港，不仅神州大地的子民欢欣雀跃，吐气扬眉，散布在环球各地的广大华裔也感同身受，喜在心头。

自从周恩来总理劝告我们放弃双重国籍，最好选择居留国作为国民后，我们就抱着生于斯，长于斯，而准备死于斯的心态，怀着“江南虽好是他乡”的观念，把我们的居留国当作祖国了。但由于藕断丝连，想起了老祖宗被八国联军残酷蹂躏，想起了先辈们在鸦片战争后所过的屈辱日子，当你听到香港要回归了，你能无动于衷吗？除非你是数典忘宗的香蕉人。

虽然不是中国的公民了，但海外华裔与北国乡亲是同祖同宗，同文同种，而且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是一脉相承，对于香港回归这样一件大事，他们必须关注，应该庆贺。

那时候ASTRO电视设立伊始，收看的客户寥寥可数。但它却透露了一个喜讯，要将回归的历史性仪式作现场直播。可是我们环顾四周的反应，并不像想像中的热烈。至少那些号称代表华裔的组织以及和中国在工商有交往及促进两国友谊方面的团体，除了发表公式化的文告外，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反应与回响，但是没有。大概他们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其有乐大家享，不如关起门来自己爽的心理，以免行差踏错，惹得周身是蚁。

我敢肯定这样的节目将是华裔喜见乐闻的。但当时要挤进朋友的客厅去看ASTRO，谈何容易？而我们的会馆却有一个大礼堂，经常出租作为宴会与表演的场所。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能将香港回归的节目播放供大众欣赏。但要做这种有功无赏，打破要赔的事情，有几项事物必须先厘定，尤其是政治的考量。于是我找会长拿督林荔清及其他几位负责人商量。

我们把谈的问题分成3个重点：即敏感，走向与效忠的问题。

在上世纪50年代，这的确是敏感的事。那时候收藏一张鲁迅的照片，都会被人家套上红帽子。70年代情况改变了，国家领袖到北京跟毛主席握个手，回来后，在大选期间，将彩照在全国大街小巷张挂，结果让执政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往后中共放弃支持马共，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活动紧密，大马的旅客到大陆观光如过江之鲫。敏感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有似无，实际上是无了。

至于政策的走向，在那个时期也呼之欲出了。我们虽然是小国寡民，但我们当年的领袖却扮演弱小国家的英雄。他常言人之所不敢言，干人之所不敢干之事。他东责山姆大叔，西斥铁娘子，南诘澳大利亚，这样一来三面受敌，为了

杀出重围，只好贯彻他所提倡的向东学习了。早期的东指的是日本，后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我想后期也被归纳在内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舵手是有意要搭上这列东方经济快车，而把航行的方向指向神州，那我们作为子民的亦步亦趋，对香港回归也加以强调，及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那又何罪之有呢？

在会馆直接转播香港回归庆典，会否牵涉到效忠问题吗？我想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虽然我们的效忠再三受到极端分子的质疑，而文字上的争辩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因为效忠国家是一个国民内心世界的思想结晶，不能以表面的阿諛奉承来定夺。我常喜欢以汤姆斯杯羽球赛来作为例子。如果一场球赛是印尼对泰国，马来西亚的华裔观众对谁输谁赢都无所谓。如果是中国对印尼，华裔公民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由于宗亲血缘的关系，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中国队。但是如果那场球赛是马来西亚对中国，大马华裔观众不论是在现场，咖啡店或是在家中观赛，他们都会声嘶力竭地高呼，支持马来西亚取得胜利，而没有人会支持中国的。这种万众一心热爱大马的自然情感的宣泄，足于表彰我们对大马的效忠！

会馆高层负责人有的受过高深教育，有的是工商界钜子，他们都了解当前的政经走向，大体上都认为这项转播是有历史性价值的。于是购买电视机，添置Astro仪器，在舞台上架起大银幕的工作积极进行。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派员向电视台取得向大众转播的认可。

回归日子快到了，各界人士正苦于无处观赏此庆典。看到会馆的文告说将在大礼堂免费直接转播，都雀跃万分。由于庆典仪式是在夜间进行，我们估计前来出席者将异常踊跃。不出所料，天还未暗，络绎不绝的人都喜形于色地涌向会馆，一个偌大的可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早已爆满了，看了这个情况，我才深深体会到吾道不孤。

整个夜晚随着节目的高潮迭起，观众的情绪澎湃起伏是

不言而喻的。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稀客，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摄影与采访队赶到现场，作实地报导。他们先在贵宾室向会长荔清和我作了一场访谈，泛谈转播回归的意义及个人对中国回收香港的观感。而后采访队一直守在现场，到凌晨2时节目完毕才收队。

最精彩的时刻是米星旗徐徐降下，五星旗及紫荆旗在壮烈的号角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升起时，部份观众激动地湿着眼角，站起来热烈鼓掌欢呼。这些精彩画面都一一被采访队拍入镜头。

最黯然的场面要算是那个经常给北京政府头痛的末代总督彭定康陪着英国王储搭上邮轮离开香港海港时，那浓浓的夜色，象征着英殖民地主义者在远东最后一颗灿烂的彗星经已殒落，而在岸边依依不舍的送行人士，望着总督那副大江东去的凄怆表情时，都深深体会到“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返，寒风萧瑟”的辛酸。

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我们的会馆应该是全马结社组织中最隆重地转播香港回归，而且得到最大效应的团体。我们感到高兴，因为在有远见的领导层策划下，我们能及时为会员及华裔社会提供服务。而我们的作为，也受到各界赞赏与支持，尤其是得到北京中央电视台的垂注，不惜千里派队前来采访。

往后在闲谈中，我们一位姓许的董事提到他本身曾在上海，而他的朋友则在北京看过这项香港回归在巴生摄制的访问纪录片，足见中央电视台已向中国作全国性的播送。对我们来说这真是福有双至，喜不单行了！

[2005年1月4日写于上海旅次。2005年2月19日和20日刊于
《光明日报》中马版]

回首往事

我终于走进大芭

我生性比较孤僻，向来不愿为功名利禄而表现得奴颜婢膝，不会为了富贵荣华向人家谄媚奉承。当年有机会做议员，不愿接受提名，只因为要深入基层去强颜欢笑，去勾肩搭背，有时还要明知不可而许下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总觉得是对自尊的一种自我折损。

也曾经做过一个短时间的学业保险，而且成绩还很不错，但在招徕了所有认识的熟朋友后，需要向新的客户与生疏的人劝说，想起那各式各样的七情上脸，心中觉得难受，最后只有放弃。

在经历过学运、工运与政党政治的诸多斗争与挫折后，斗志已经锐减，对勇往直前的事也意兴阑珊了。这时候有些像风雨中折了桅的孤舟，需要找一个避风港歇一歇。

余秋雨说：“大隐隐于市”，我则只想小隐一番，于是我投身大自然，走进了大芭。我进入大芭，并不是参加陈平部队，因为在紧急状态时期，有句暗语指“进芭”就是去参加地下武装活动。我的进芭是去种杨桃。

那是因为一位朋友一句话的启示，他说种果树是最写意的事。你躺着睡大觉，它也在自动生长；你丢弃一两个星期不去理它，它也会开花结果！姑不论他的话是否正确，想到不必去看别人的脸色，可以自我放纵地过着孤云野鹤的生活。任谁都不会想到，我终于做了农夫。而且我对农作是相当认真的，并不像蜻蜓点水，尝试一下就跑。我竟在杨桃芭

守了4年有余。

种植是一门大学问，这其中欢乐有哀伤，它的苦乐辛酸是一言难尽的。

住惯城市的人逢年过节，都会求鬼拜神，祈天赐福。来到杨桃园，因为以前的园主留下了一个拿督公神位，我也入乡随俗，每逢初一、十五照拜如仪。在这远离尘世的天籁境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只好“不问苍生问鬼神”了。

拜拿督公通常是要在神坛摆上甘文烟、槟榔、烟草、石灰等祭品，最主要的是从园里找来几颗长得最丰满，卖相最金黄的杨桃献上，然后倒茶烧香，祈求拿督公保佑我们出入平安，季季阳光普照，雨水丰富，年年丰收。

那时候我有一批住在蒲种的朋友经常到芭里来求神求万字。有一天看到我如此拜法，大不以为然。其中一位说，你拜的这个拿督公是山番芭的无业游民，太过奉承与侍候他，他就会以逸待劳，不会认真照顾这个园地的。

我问他要怎么拜？他说你应该找来几颗被虫咬烂的瘦削的杨桃摆在神位上，上了香之后说：“拿督公你到底是怎么样搞的？我求你来看芭，你有没有守在这里？还是到处去乱跑？你看园里的杨桃长得多么瘦削，而且很多都给虫咬了！你如果继续要我这么诚心地侍候你，你最好打点精神，要不然，我把神位拆毁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我的这几位朋友都是劳动界的好人，只是品流很杂，有的是兼职的乩童。在鬼魅的世界，他们言所欲言，可以翻手为云，复水为雨。我却留在大芭中找生活，所以不敢相信他们的连篇鬼话，试想如果我照他们的话去做，有一天我独自走在芭场中，后头有脚步声跟上，正如泣如诉地向我投诉，我该怎么办呢？

怕蛇的心理人皆有之，我也怕蛇，尤其怕碰上毒蛇，但在这热带雨林开辟的芭场，与蛇为伍是习以为常的事。因此我非常关注，如果给毒蛇咬到，有什么良药可以急救？问了

好多方面的人物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说最好的方法是送院急救。

我们有一片新种的蜜糖杨桃，种了两年多，已经高出人头了。我去巡视时喜欢把头贴近树叶，观看树上那一枝开花，那一枝已结果了。有一次当我的脸逼近枝叶时，忽然觉得眼角边有黑白相间的物体在蠕动。我即刻退了两步，定神一看，是一条黑白混杂有两尺长的蛇蜷伏在树枝上。我转身找到一枝小木棍要去打它，它却不见了。根据芭场的人说，这种一显现即消失的多数是拿督公现身。这且不表，问题是当时如果这条蛇向我的额头啄了一下，我将怎么办呢？

一般人都晓得的土方是，如果被毒蛇咬到手，伤口在下臂的话，就用布带绑紧上臂；如果小腿被咬，就绑紧大腿，目的是不要让毒汁跟随血液流入心脏，然后想办法紧急送院。

但咬到额角或脸面，要往哪里绑呢？难道要用布带绑紧颈项？那岂不是要我在杨桃芭上吊？

杨桃园受到猴群的干扰是常有的事。它们来过之后，通常是有迹可寻的。听说猴子生性贪婪，见一个要一个，有多多益善的心态。它们来到树下，看到有一颗杨桃熟了，便摘下来放在腋下，走到第二株，看到有满意的又摘下来，放在腋下。但当它张开手臂时，原本的那颗就掉在地上。于是它走到第三株，有漂亮的它又摘下，同样放进它的腋下，也同样的原本挟着的那一棵又掉了下来。这样一路走去，它可以摘下几十颗杨桃，但它走回芭边，跳上树去的时候，手中只有一颗。

第二天当你来到园地，看到地上扔弃的熟了的杨桃一路伸延到芭边去，就知道已经有猴群来造访过了。

后来我们养了几条狗，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因为狗看到猴子来了，会吠、会追、会去攻击它们，猴子就不敢肆无忌惮。有一天午后，芭里的工友都外出了，只有我守在那间小木屋。这时一只老猴王带了整百只猴群来到芭边的乔木树

上。群猴在上下跳跃，张牙舞爪，嘶声尖叫。看了这个气势，我的确有点心寒。要是老猴王一声令下，它们一起扑向木屋来，我则老命休矣！还好那几条狗严阵以待，吠个不停，就是不让它们下得树来。但猴群以众欺寡，终有几只侵入园地来。这时群狗冲上扭成一团，结果有只黄狗战败而返，耳朵给猴群咬得鲜血淋漓！

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损失，但经历这场猴与狗的搏斗后，心里多少有些威胁感。后来跟蒲种的这般老朋友提起，他们又有治猴的妙计。

他们说当猴群来袭时，最主要的是用陷阱或其他方法抓住其中的一只。然后把它养着，等到猴群再次来侵时，将这只拘留的猴子像鬼画桃符地漆上各种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将它一放。这只猴子看到猴群，一定兴高采烈地扑过去，要重过团体生活，讵料猴群看到来者这副装扮似猴非猴，似鬼非鬼，以为有怪物来侵，经猴王一声命下，全体搏命奔逃。经过这次的惊吓，杨桃芭里持续三、五个月不会有猴群的出现！

〔2005年1月6日写于上海旅次。2005年2月26日和27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和幼女子洁展示他杨桃园的产品。

田有福书

风月场中的无妄之灾

年轻的时候，因为职务关系，经常要采访影星歌星或是寻访著名艺人谈商登台演出事宜，所以不时进出于歌台舞榭。在那个境域里，杯酒交际，舞影双双，虽然没有“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么风光旖旎，但在酒食征逐的日子里，过的的确是奢靡的生活。

后来年事渐长，改换了职业，生活方式也随之转变。这时期倒喜欢邀约三五良朋在咖啡店或大牌档，把酒话家常。如果老板欢迎我们喝得夜一点，到了夜半无人私语时，大家挑灯夜饮，可以从政经文教谈到上下古今，那种酒酣耳热，逸兴遄飞的感觉，要比陶渊明的“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更加写意。

其实在咖啡餐室喝酒要比酒吧和夜总会来得经济又安全。来咖啡茶餐室的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来晚餐或夜宵，要不然就是三几个朋友在喝茶聊天谈生意。在这里，你喝酒，他们不喝酒。当你谈到得意忘形时，可能会有些放肆，他们也懒得去瞅睬你。这样一冷一热的关系，彼此可以相安无事。

在酒吧与夜总会就不同。在那儿，你喝酒，他们也喝酒，这领域品流很杂，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你也摸不清对方是何方神圣？如果你抱着“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想法走进欢乐场所，可能是错误的。酒这种东西，小饮怡情，大饮乱性。当对方已经喝得太多，乱了性之后，你即使“静”若寒蝉，不动声色，他也可能来犯你，找你的麻烦。

既然如此风险，不如做个住家男人，深居简出，可以省却很多无谓的烦恼。但你或许会说人不风流枉少年。喜欢杯中物与征歌逐色的年轻人初闯风月场所，虽然不必怕得如履薄冰，但至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除了要提高警觉，还要反应快速，要不然很可能碰上无妄之灾。

60年代的新加坡，逛酒吧上夜总会的风气很盛。我所认识的报馆、电台、电视台和文艺界的友人，有事情谈商时，多相约到酒吧与夜总会去，很少光顾咖啡店。而实际上那年代，有冷气的，坐得舒适的Pub和Cafe也很少。咖啡店都是老式的，多不适合那些半新潮文化人的口味。

有一天晚上，我们好几位同行在加东采访了一则新闻后，因为时间还早，就一起到小坡一家酒吧去消遣。我们选择这酒吧，是因为报纸上刚公布新加坡有两家酒吧得到警方批准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这就是其中的一家，其余的一般上半夜11时45分就必须打烊。

能够得到警方如此宽待，想来势必记录良好，我们可说是来捧场。没想到在同样的时间，有一批行船人也成群结队地到来捧场。这两方面一捧，竟然迸出一场火花。

开始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乐，但三杯到肚后，情况有了变化。有3个人走到我们的桌子来，其中一个按着我的肩膀问道：“为什么你说我们行船人没有钱？”

这就怪了，我们当时谈论的是文化界圈内的事，跟他的航运与捕鱼业风马牛不相及。我很和气的告诉他，由于我跟他素昧生平，而且对他们的行业十分外行，因此不可能去批评他。

与我同座的都是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包括报章采访主任，电视台导播，如果引起殴斗，新闻见报后大家的面子要往何处挂？于是乎能忍则忍，暂且静观其变。

这帮行船人可能是大饮乱性了，不肯罢休，重复再三地走上前来问同样的问题，而且动作有点粗野，拉拉扯扯。为了息事宁人，我作了最大的让步，我说：“我实在是没有

讲，既然你说是我讲的，好吧！就让我向你道歉，我跟你说‘苏里’好吗？”他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就说：“人家都已经跟你说‘苏里’了，算了，走吧！”

他给朋友拉回自己的位子之后，我看他跟身边的一个酒吧女郎交头接耳了一阵，过后他又走了过来，看来是要重燃战火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时我也有点火了。于是心生一计，走了一步险棋。这步棋的确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我召来一位侍应生说：“请你们的老板出来！”

老板当然是不会在店里的，最后来了一位满脸歉疚的经理，我对他说：“你们的营业可延长到凌晨两点，是警方刚刚批准的。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在座的几位，其中有一位是刚上任的警方发言人。如果你的酒吧没有办法维护酒客的安宁，让喝醉的人任意干扰你的顾客……。”还没等我说完，他听到警方发言人，知道事情不简单，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们稍等片刻，我自会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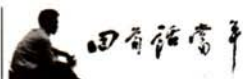
我抬出警方发言人这个招牌，虽然是要吓唬他，但也并不夸张。因为这位发言人是我的老友记，他原本在文化部，是我的上司，前两个月才升级，调往警察总部任此高职。

只是一会儿功夫，酒吧内的有关人员已经全面调动，他们五步一岗地各就各位。经理过来说：“没有事情的，你们现在可以慢慢走出去！”

我们顺序地走出大门，纵目一望，马路对面和这边的五脚基有十多个行船人在等候着。还好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要不然，我们是有苦头吃的。

几天以后，我重回这家酒吧，找另一位小姐坐谈，要了解一些真相。她一五一十道来，我才知道此事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

我的这位朋友C君任职于歌台，多才多艺，人亦豪爽。我常与他喝两杯，听他讲述在联邦各地小码头演出的经历。有一次我跟他来到这家酒吧，招待我们的就是那位与行船人



交头接耳的L小姐。老实说她长得漂亮，C君对她情有所钟。以后我很少碰上C君，他就孤军上阵，而且跟L小姐搞得你浓我浓。这期间他到底对她做过什么，答应过什么，非局外人所知。最后C君大概是饱食远飏，做了负心的人。L小姐左等右等你不来，此情此恨“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最后作为C君朋友的我出现了，她就唆使已经有些酩酊的行船人来找我的麻烦，以便消一消这口气。

这出闹剧的剧名叫《李代桃僵》。他去偷食，我来当灾！说穿了，这是蛇蝎美人心的外一章！

再下来要简述的一个事例，说明了如果你跟别人到风月场所去喝酒，却不知道他的底细，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有个在丽的呼声录制广播剧的朋友，收入不多，但也喜欢杯中物。有个晚上在大坡南天一带蹓跶，碰上一位二世祖，邀他去喝两杯。他因为曾给他请过几次，今晚又承他看得起，肯定有一顿免费的吃喝，于是欣然跟他上车。来到如切的一家酒吧，两人一起推开大门，迎面即冲来几条大汉，举起木棍与巴冷刀向他们侵袭。他的朋友因为在风月场中混惯了，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看到情形不对马上溜之大吉。我的朋友反应迟钝，就在惊慌失措间，已被击中几棍，插上了几刀，在脚步踉跄中，走不了多远就跌入沟渠里。

在紧急送院后的几天内，他都昏迷不醒。最后可能是回光返照，他苏醒了，告诉他的妈妈说，他没有做错什么事，只是跟一个朋友进入酒吧，他们就攻击他。说后不久，就断气了。

事后根据探访，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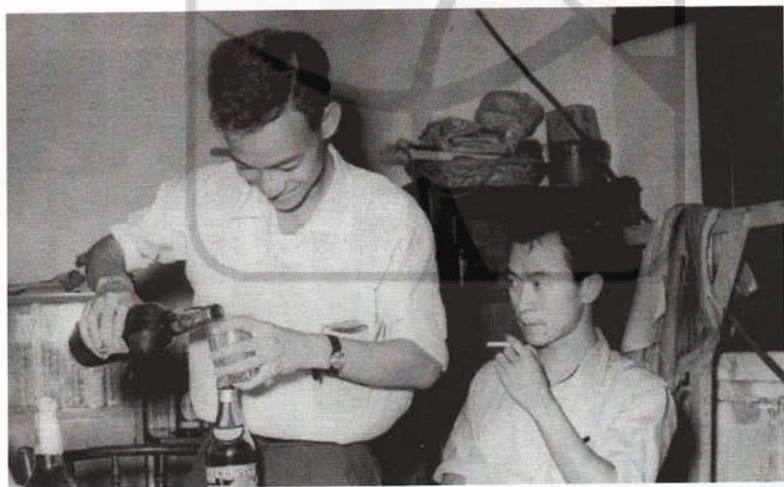
有个女孩子出身贫家，人长得秀丽。当了酒吧女郎不久，就给二世祖搞上，而且腹中还怀了他的骨肉。但二世祖始乱终弃。女郎决心斩断情愫，换了几家酒吧，但二世祖看到她跟别人投怀送抱，心有不甘，不时前来干扰与凌辱她。她为了找一个靠山，经友人的介绍到如切这家酒吧服务，因为老板是黑道中的强人。诨知二世祖还是经常来欺侮她。最

后她把不幸的遭遇向老板全盘托出。老板看她楚楚可怜，顿生怜爱之心，决定把她收为已有，全面保护她，并派人警告二世祖，如果再到他的酒吧来，就要取他的命。

二世祖凭他有钱有势，认为自己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不把这警告放在心上。这一夜，当他带着一个替死鬼毅然再到这家酒吧时，老板的人马已经等他7个晚上了。当他们推开酒吧的大门，惨案就此发生！

对我的朋友来说，这个准备寻欢的晚上，变成了断魂之夜；这场风月之旅，使他走上了不归之路。

[2005年3月5日和6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酒逢知己千杯少。



征雁（后排右二）在新加坡一个宴会与友人合影。



征雁（后排中间）在新加坡时与友人聚餐。

回首福常年

生平良友岂能相忘

当年与老作家姚紫交往时，他曾说过，点头的朋友千千万万，问你吃饱了吗？还未吃的话一起来吃的友人多如恒河沙数。那些极好的朋友，能彼此知心、相知或情谊最密切，最多只能称作知心、知交或挚友，而不能称作知己。知己是能够深切认识自己的良友，一生中只能碰上一两个。他说有机会交到知己，你不但要花时间、花金钱，甚至要用生命去交。

由于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不敢轻易将生平良友冠上知己，想想还是用挚友来得妥当。当然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挚友，但在我的家乡，当我从事政治，以及在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有几位挚友曾经在精神上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也在实际行动上支撑过我，这些挚友都使我深深有感没齿难忘。

先说我的父挚拿督李荣德。

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时期，从联盟到国阵，几乎有半个世纪，拿督李荣德可说是家喻户晓，名字响当当的巴生社会领袖。由于他长袖善舞，对各政府部门都熟谙而且有交情，所以为民众化解了很多面对的难题。

先父陈德水先生在参与马华的20、30年间与拿督李荣德交情甚笃，常追随在他左右，以他马首是瞻。五一三事件发生时，那一届大选，李老被推选为联盟国会候选人。街坊上甚至有流言说，由于他深得首相东姑的器重，如果中选，极有可能受邀入阁。那时先父也到各群众大会上演讲，为他

打气。但他终被反对党候选人击败。

我的印象还很深刻，那天深夜反对党的胜利游行车队经过夏吧街我的店口时，还高声揶揄道：“陈德水！你的老朋友李荣德倒了！”

谈起资深的曾为民服务的政界宿将，使我想起北马有一位数朝元老，曾一连中选好几届国会议员，听说此公乐于助人，对选民有求必应，但也因为常有选民的儿子为非作歹，被警察拘捕后，做家长的都跑来要求他去担保或是祈求警方从轻发落。他实在给这些事情搞得不胜其烦，于是养成了习惯，凡是来求情的家长，他必定先轰他一轮再作打算。他会指着求助者骂道：

“你会生儿子，不会养儿子，教儿子！”

“你既然可以让他去做匪类，为什么还要来求我？”

“每个人都说他的儿子很乖，只是警方有眼无珠，抓错人。”

“如果我有这样的儿子，我的脸都不懂要放到哪里去，还好意思来叫多隆！”

等到那个求助者给他轰到脸青面白，不知所措时，他会起身朝门口走去，然后喊一声：“走！”

那个人一脸茫然地问道：“去哪里？”

他就回答说：“警察局咯！还有哪里？”

荣德他老当然不会像北马的元老一样擅于骂人。不过他在服务社会也会有“岂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并不是他对基层的要求虚与委蛇，而是的确尽心尽力去做。只因他是一个受英文教育者，谈吐直肠直肚，政治的手腕不甚圆滑，表达的语言不很委婉，所以有些人也会埋怨他。

譬如说你有一件很棘手的问题找他帮忙。他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到吉隆坡各有关部门去穿梭办理，甚至会直闯部长的办事处去深一层了解实况。如果各部门都表明事态严重，无法插手，他会很坦诚地告诉你事件的真相。但一般人总是不死心，会再三登门要求他再想办法。这时他就会责备你说：

“我已经告诉你没办法了。为什么你要再来要求？”试想如果他的回答是：“好好，有空时，我再去跑一趟！”对方是不是听了比较舒服？因为基层的反应是：满意产生赞颂，失意引来攻评。

谈到拿督李荣德，我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老人家曾引导我走入政治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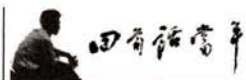
“五一三事件”之前，我举家迁回巴生，承他老的错爱三番几次通过先父要我参与政党活动。有一天早上，他约我去见他，把我载到巴生市议会的会议厅去。我推门一看，里边坐满了议员与各执政党的领袖。原来这是巴生国庆日住家装潢比赛的委员会在开会。拿督李致词时声称他本身工作忙碌，未克参与这项工作，现在介绍我来顶替他的位置。说完，把我强行留下，自己就溜之大吉了！

老人家的一片好意，用心良苦，逼着我从幕后走向前台。也因为这个机缘，我跟各族委员经常要到各住宅区去评审，所以跟本区巫统与国大党的领袖相处得很融洽。这之后，再蒙丹斯里李孝友的提拔，要我进入雪州马华去任组织秘书，我因此暂时搁下了案头的工作，开始了到处去作政治演说的生涯。

另外要写的一位挚友是李荣春。

50年代初期，我在巴生华侨中学念初中时，荣春他老哥的年纪比我大，也高我几年级，那时我参与歌剧《天鹅》的演出，他是李良镇老师领导的弦乐队的提琴高手，落力在台下为我们伴奏。认识了之后，才知道他原来不只醉心于音乐，还酷爱文艺。

当时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忱风，写得一手很秀丽的散文，由于勤于做研究工作，后来升任马大中文系主任，澳洲某大学客卿教授，现在又回到拉曼大学任高职。他就是洪天赐博士。80年代我们编撰一本大块头的巨著《巴生福建会馆志略·文献》，苦于无人写一篇完整的巴生历史，最后还是找到洪天赐博士为我们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历史鸿文。



我在50年代，参与槟城钟灵中学的“大学潮”，被政府开除学籍。回到巴生坐困愁城的半年日子里，很多朋友都把我当成瘟神般，个个避之则吉。那也难怪，那当子政治部的探员如影随形，步步追踪，很多人都怕跟我在一起会受怀疑，被牵连。

在那段最寂寞、最困苦、最烦躁、最潦倒，对前途最茫然的时候，只有一个朋友不信邪，他毅然走向前来，每天都在我的左右，跟我同进共出，陪我散步，陪我喝茶，跟我谈文艺，鼓励我要学伏枥老马，志在千里。这位老哥就是李荣春。他的话语支撑了我，使我觉得我还有前途。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我称他是知遇，应该是不为过的。

几乎是每个傍晚，他用完晚餐后，就骑着脚车来到我家门口，我也骑着脚车，跟他并肩踏过巴生河上的浮桥，而后往彭亨井方向一直去到爪哇社皇族住宅区，才转入康诺桥，回到巴生北区来。

入夜之后，我们常在加埔路口的咖啡档喝茶。这里有一片空阔的草地，坐在几棵百年老树下清谈别有一番情调。我们谈的多是马华文艺与世界文学，但也不乏现实的话题，抒发了我们对当年许多政策的不满、愤怒与无奈。但举头一望，邻近的满春园与大世界游艺场正灯火辉煌，乐声悠扬，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真是有人欢乐有人愁的写照。

新加坡的资深作家莫河先生，早年驰骋于生活线上，仆仆风尘，“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又感于“悲欢离合总无情”，于是寄情于笔墨，追忆前尘，缅怀旧雨，真挚之情，溢于言表。最近他在新加坡《赤道风》季刊写了一篇《巴生夜话——与征雁老友话旧》，文中除了提到巴生文教界闻人陈学璋与林明业之外，也介绍了荣春他老哥。

他说：“柯孺（荣春的笔名）是50年代初擅写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的作家。剧本《金沟巷》曾荣登1965年新加坡独幕剧创作比赛榜首。”他是在二、三十年前通过林琼的介绍认识柯孺。这一次的巴生之旅，行色仓促，错失与他再

次会晤，诚为憾事！

我前几天与目下在中国武汉大学留学生院攻研的陈雪风以及刚从首相署退休的李锦宗在巴生聚餐时，锦宗他老哥念念不忘柯孺，还特地问起他的近况。由于锦宗他数十年如一日，都在收集整理马华文艺资料，并加以评介，所以远在50年前柯孺的文艺创作才华，他依然历历在目，印象深刻。他认为柯孺具有创作才华，只可惜他没有继往开来，要不然他在马华文坛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2005年3月12日和13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与姚紫（左一）过从甚密。



征雁（后排左二）在父母生前合摄的全家福。

回首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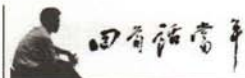
千山我独行

五一三事件过后，敦陈修信为了重振马华声威，放弃了雪州联委会主席职位，专注于搞他的华人大团结运动。这时候他招贤纳士，各方豪杰兴乎来归的大有人在。有些在华团组织虚有其名的专业人士、党上层领袖可能误认他们具有三头六臂，可以呼风唤雨。于是有人不必经过国会议员的门槛，通过委任，就坐直升机似的作三级跳，一跃就跃上部长宝座去了。

雪州马华联委会主席的职位接着由丹斯里李孝友担任。李老接任后，看到敦陈留下的旧班子大部分是受英文教育人士，而李老是华校出身。他曾私下诉苦说，主持雪州马华的会议就好像坐在英国议院开会一样。他深切了解马华公会在经过五一三的沉重打击后，必须要以新的姿态、新的作风出现。受英文教育者不乏专才，亦有远见，但在那个年代，要他们适应华人社会的从政方式，他们还经验厥如。坐在冷气室里高谈阔论的可能千军易得，要能深入群众，礼贤下士者则一将难求。所以他殷切地需要有多几位受华文教育者来协助他从事党团与基层的工作。

丹斯里李孝友招募了很多年轻人，也同时招揽了我。

话说李老与我的父亲陈德水先生有师生之谊，而家父与他的令尊又有董教关系。日本南侵之前，我的父母亲在间津侨民小学执教，家父是校长，李老的令尊是董事长。他们一起办学，一起筹建校舍，交情深笃，堪称知交。孝友在小学



毕业后，父亲怕他跑到间津后面的黑风洞去参加抗日活动，由家父安排他到外州去读中学。但由于他是热血青年，也有过被开除的记录。

说到他们老一辈的交情，有段往事是值得提一提的。

日本兵攻进雪州后，敌机随着狂轰滥炸，我的父母也弃守校园，逃回巴生中路的老家。那时候没有通讯设备，老朋友在兵荒马乱中分手后，不知对方的死活。孝友的令尊够朋友也够义气，因为挂念老朋友的安危，竟跟另外一位挚友驾了一辆老爷车，不敢走大路，从间津穿过很多园丘小径历尽艰辛，也冒尽风险，最后摸到中路小镇来。看到了家父，喜不自胜地紧紧握住家父的手，千言万语都不说，只说一声“你还在”就老怀大慰了。结果席不暇暖，又匆匆上路赶了回去！

我长大后常跟随父母亲去拜访李老及他的家属。那时候他住在加影锡米山，经营他老爸留下的面线厂与橡胶生意。有一次在他客厅坐下后，觉得气氛有些不对，李老正忿忿不平地谈着当地的补选事。原来李老经已参政，而且在地方上积极活动，颇得各界的支持。他自认这个执政党的候选人非他莫属。但政坛上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听说首相东姑经已授意要给一位叫阿武峇卡的上阵，如果选中的话，可能出任州务大臣。

于是孝友他老放出风声，要以独立人士提名，跟他试比高低。

往后的发展听说东姑召见了。由于知道他有雄厚的基层力量，得罪不得。在劝退之余，答应他在来届大选给他一个国会选区。

古训有云：“欲得上，仅得其中，欲得其中，仅得其下”。孝友他老原本要的只是一个州议席，现在首相竟然答应他一个国会议席，变成欲得其中，却得上，种豆得瓜，何乐不为？于是乃偃旗息鼓，坐待良机。

东姑他老人家是君子一个，言而有信。到另一届大选

时，给了孝友他老一个很有把握的选区。从此他一炮而红，非但光耀门楣，也官运亨通。可见政治这东西，有了机会就要抓紧，就要争取。要是逆来顺受，谦虚礼让，或许马华与马来西亚的历史里就不会留下丹斯里李孝友这个显赫的名字了！

我在修完哥伦坡计划在东京举办的短期电视编导课程时，孝友他老已经升任马华总秘书。由于旅居日本时，常有跟他通讯，回到大马时，马华总部正在征聘多位助理秘书。他说只要我有兴趣，可以即刻报到就职。我当时因热衷于文艺写作，在同时有另一个选择时，我终于重回新加坡去担任文化部的《电视与广播》主编。因为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心中十分难以释怀。

五一三事件之前，我举家搬回大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李老在接掌雪州马华后，由于要大力整顿，重整旗鼓，殷切地需要几位受华文教育的人士追随在他左右，乃通过家父劝说我参加他的阵营。

孝友他老再顾茅庐，盛意盎然，我如果继续回避，就却之不恭了。于是我对他的招揽作了慎重的考虑。

眼看华人在五一三事件中的种种遭遇，我深深感觉到华人自今而后，是不能只顾做自己的生意而不问政事了。因为你不管政治，政治将会来管你。尤其应该点醒华人社会，不要以为塞钱就可以解决生意上的难题，因为新的条例颁布后，可能有些行业已经不是你的族群经营的了，那时想塞钱也无处塞了。到了这个地步东隅既失，桑榆已晚，岂不悲乎？

我在暗忖，我那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的小小优点，可以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个小角色。如果有机会深入群众，以实际的例子来证实政治的力量确在主宰一切，让华裔社会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认定华裔的权益只有通过政治力量的争取才能达致。不管宣传效果如何，只要能够向公众发布这样的讯息，我想我已多少尽了公民的义务了。

另外一点是作为写作者，不能老是局限在小圈子里，拘泥地反映小天地的事。作家必须扩大视野，扩大生活层面，多体会各领域的奇情怪事，才能创作出多姿多彩的现实作品。我虽然经历过学运、工运与文官生活的各种颠簸流徙，对于政治圈内所传闻的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现象，也想去领会一番。这毕竟是写作者体验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我决定加入马华。

但这个时期，正是马华士气与形象最低落沉迷的时候。原本有许多人都对政治敬而远之，文艺界的朋友更视为畏途。经过五一三的沉重打击后，有更多人谈政色变，生怕在这个领域露出头角，就会面对巴冷刀似的。因此很多文化界的友人知道我参政时，都没有为我祝福，媒体的朋友还在报上批评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我主意已定，抱着“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心态，从容不迫地束装就道了，从此开展我在人生逆旅中另一阶段的生涯历程。

〔2005年3月19日和20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在70年代，征雁（中）的父亲陈德水（右）跟丹斯里李孝友（左）寒暄。

回首往事

喜宴应酬何时了

最近常听一些做小本生意或经营食档的小贩在哀叹，说行情坏，入不敷出。其实是通货膨胀，受薪阶级薪金的提升跟物价的飞涨形不成正比例。这边厢已经捉襟见肘，那边厢又有左邻右里，亲朋戚友的红白事要应酬，这难以预料的开销，的确使一般市井小民，百上加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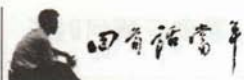
前几年，看到一位做议员的朋友，为了赶赴喜宴而奔波，问他感受如何？答案是苦不堪言。他说做议员的出席结婚宴会，如果不必包红包那当然是赏心乐事。但议员没有特权说可以不包红包，而且要比别人来得大包才表示你是人民的代议士。有时接请帖好像收贺年卡一样多。

再说对这些请柬你必须一视同仁，不能顾此失彼，要不然选民会怪你大小眼，他们怀恨在心，到来届大选你就有得受。

一个议员区区的薪金与津贴要租屋子，请职员，成立服务中心为民服务，要付水电电话费，又要有如影随形的秘书跟在左右。再加上那摆脱不了的人情应酬，如果不动动脑筋，想想空头，袋子里经常都会变成花篮打水一场空。

但有些议员是醒目精灵，能够举一反三，当上一两届议员就捞得风生水起。也有人在这个问题倒不是我们需要挂怀的，反而，下面所举的穷措大的遭遇，值得我们关注。

话说我在五一三事件之后，在南马跑市场，做学校生意。每次到那个小镇都会找K君帮忙，因为他跟各校的校长



熟络，我需要他带路，为我打打边鼓。

K君乃退休的文化界人士，是寒士一介。虽有三几依格园地，那当子土产没价，市井萧条。他常喜欢形容说：“你晚上在街头摆一架机关枪乱扫，也扫不到几只脚。”不过他穷开心，热心于地方上公益事业，是属于“叫他做工走头前”的好好先生。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冲闯力还很强，因为老而不休，我们经常谑称他是“老不休”。

他学识渊博，十分健谈。我们常于夜里在咖啡店或大牌档坐下来，他黑狗一支，我白啤几杯，话盒一打开，他可以从政经文教到上下古今，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看到他谈得口沫横飞，我常喜欢修改唐诗，戏弄他道：“借问仙头何处有？坡众群指老不休！”

这样的半夜欢谈，在我们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但有一天我来了，在几个熟悉的老地方却找不到他。于是我摸上了他的家，见他憋着一股闷气坐在客厅中。我问他为何深藏不露？

他说：“大难临头！”

我说：“国泰民安，何难之有？”

于是他坦白说出这个月他收到18张结婚请帖，实在是穷于应对，所以骗人家说他有事出了新加坡。为了不要露出破绽，只好深居简出，“独守空闺”！

我听其言，观其行，看到老朋友处此窘境，心头也沉甸了下来，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那一夜我到外头打包了几味小菜，买了几瓶啤酒，两人在他的院子里把酒问青天，不管他墙外的今夕是何年！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几杯通大道后，依然驱不散那“喜宴应酬何时了，辛酸知多少”的哀愁！

我们的社会对于结婚喜事，大开筵席，劳师动众，原本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赞成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结婚机会，而且是在修身之后，步向齐家的门槛，意义重大，所以应该大事庆祝一番。而且通过宴会活动，散居各地戚友

亲朋可以因此会聚。从广义来说，通过这聚会的接触与交流，可促成族群的小团结，然后推广至大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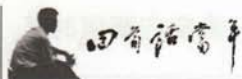
而且饮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华裔秉承我们老祖宗的传承，中华料理早已在世界占了首席之位。君不见近代的日本经济发达，国民收入十分可观，但日本人不大晓得吃，所以几家著名电视台要联合到香港来拍摄满汉全席，把中国人享受的帝皇式佳肴介绍给大和民族。因为在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东洋人是样样强过中国的，岂可在美食文化方面望尘莫及！

而有些华裔则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丰衣足食的境域中，老朋友久别重逢，再也没有什么促膝谈心的事了，请你吃一餐是最普遍的礼节，反正民以食为天。结婚筵席一开，无酒不成礼，最好是喝得不醉无归。节俭虽是儒家的美德，但请朋友吃上最好的美食，也是儒家的善举。于是人逢喜事心情爽，只求欢乐，不拘开销。

反对者则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次结婚的机会，那么我们的国家有2500万人，就有2500万次的喜宴。既然人皆有之，就没有什么稀罕，不必大事铺张。你没有摆大酒席，没有人说你寒酸，你发来请帖，人家表面上向你恭贺一番，暗地里却在怨叹又中了一张“三万”。

至于喜宴可以联络乡亲，促进族群的交流，其实也不尽然。君不见在宴会场中，三五熟悉的朋友围成一桌，嬉哈自如。酒桌出尽，抹嘴松人，何交流之有？出席一次夜宴，出门时塞车，到会场等开席，如此磨来拖去，几乎要折腾一个晚上。如果一个宾客因为等东等西要浪费两个小时，那么在座有1000位嘉宾就合共浪费2000个小时。而余兴节目的卡拉OK，如果会唱的上台唱几首还无所谓，要是碰到荒腔走调，喊得天花板似乎要掉下来，再加上震耳欲聋的音响，简直是受罪。

每次餐宴佳肴丰富，有些男士在这种应酬场合穿梭惯了，由于暴饮暴食，个个都挺着肚皮带球跑。这种油腻包心



的现象，对保健是很不利的。因为菜色多，一般上都吃不完，打包也好，倒掉也好，浪费的情况相当严重。当我们想起海啸的灾民与非洲的饥民时，就联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前副首相拿督慕沙依淡曾说过，以前马来甘榜举行婚礼，有个风俗，左邻右里不是送一甘当的米，就是送一只鸡，因此白米堆积，鸡只盈门。后来他们觉得华人的包红包办法不错，也以青包取代鸡米。这样一来，东家可通过青包的收入，安排筹措其他婚宴事宜。足见大马各民族汇聚，文化正在不断交流，新的文化也因此逐步形成。

马来友族结婚请客，虽然菜肴稍嫌简单，但他们的自由餐进行方式，干脆利落，省时省事。宾客来到喜庆之家，跟主人寒暄几句，交一个青包给他。然后周旋在宾客之间，要坐要站，悉听尊便。然后捡几样美食，享用一番。如果还有闲情，跳一场弄迎，然后跟主人握别，就可轻松踏上归途。这种餐会的好处，通常是在进行中都有菜色供应。譬如请客时间是下午1点到4点。你如果很忙，3点30分才报到依然可以向主人祝贺，与宾客联谊，品尝美食，而且只需花15或20分钟便可完成任务，不必像华人的餐宴要折腾上一个夜晚。

或许有人会说，我有的是钱，要怎样办婚宴，干卿底事？不错，但为了那帮厌倦了冗长的喜宴应酬，又不敢哼声的人着想，我有两个建议，不吐不快！

建议一，不影响酒楼的利益，不影响红包的份量，酒照喝，歌照唱，大鱼大肉、鲍鱼干贝、海参猪脚、烧猪、卤鸭可以出齐，但以自由餐的方式，要求酒家把菜色分而治之，分三四个阶段出菜。宾客在指定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到来都有得吃，都能完成向主人道贺，与宾客联谊交流的任务。这个办法，虽然红包不能省，但却能以半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一场喜宴。如果行得通，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建议二，将准备以5万令吉花在一场风光婚宴改为花5000令吉，形式简单的自由餐。可以广邀朋友弟兄前来同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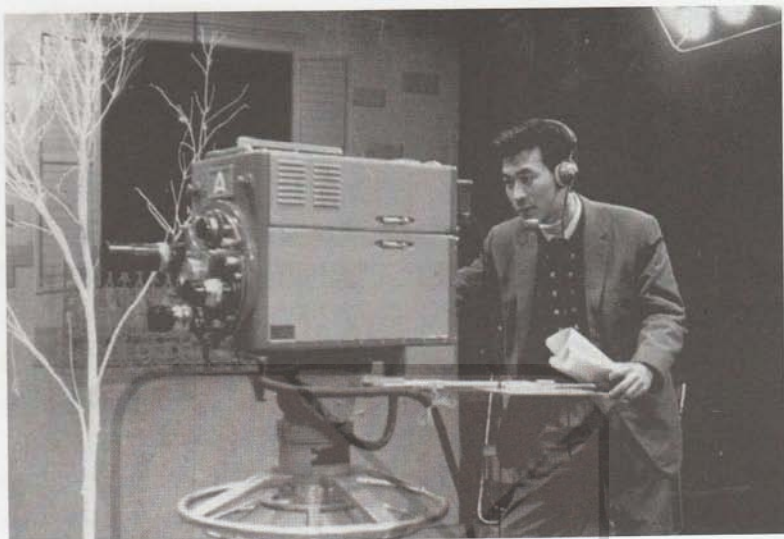
共庆，同样可以达到祝贺，交流联谊的目的。当然由于主人家开销减少，客人的红色也可跟着水落船低，富贵奢华的婚宴要包一百或百五令吉，这个简单的自由餐大概30令吉就差不多了。此风一长，省时又省钱，岂不令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

以上两个建议应该是“浓妆淡抹两相宜”，仅供参考。如果不会有人认为是我在文化习俗上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我就释怀了！

[2005年3月26日和27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右三）在社团活动时，不得不经常参加宴会，这使他感慨良多。



1963年，征雁参加哥伦比亚计划在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电视编导训练班。



征雁（右二）与电视编导训练班部分学员合照。

回首往事

向拿督李文敬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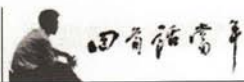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倡举，有些人会在私底下埋怨，有些人会在暗地里暗锤。但在请客风气搞得很滥的今时今日，它有振聋发聩，针砭时弊的革新意义，值得鼓励，应该推广。

去年年底挚友拿督李文敬筵开百席，为他的长孙举办婚宴，一律敬辞礼物，谢绝红包。受邀人士有入免出，皆大欢喜。但那些正想借助红包为他们儿女的婚宴大事铺张的人，可说是苦在心中口难开，因为如果让此风一长，他们想风光一番的计划，岂非要大缩其水。

我在会上受邀致词时也借题发挥了一阵。我说：“我刚为第8届大马文学节编撰了一出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浅介著名西北歌王王洛宾的生平。正当我们此地在为盗版与版权问题闹得沸沸腾腾，王洛宾却有一句名言说：‘听众喜欢我的歌，就是我最大的版权。’有人要演唱他的歌曲，只要请他吃一碗牛肉面，他就可以老远地跑去帮他们排练。而今晚宴会的主人拿督李文敬也有一句名言，他说：‘我请客又收人家的红包，我就不是真心要请客了。’”

在认识文敬老哥的几十年过程中，听其言，观其行，我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的为人。他的这句话一点也没有故作，完全是肺腑之言。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对那帮在华团中争权夺利者的恶评，说他们是霸占屎坑不疴屎，或者是“叫他做工说没闲，叫他



拍照就坐头前”，有些甚至沽名钓誉，在大权紧握之后，便钻营舞弊，假公济私。

但在华团中也有些人士是一片丹心，他们并不恋栈于权势，只是想取之于社会用诸社会。他们支持文化的建设工作，希望发扬华裔的人文传统；他们救济贫弱，希望为人世间增添一份清馨与温暖。拿督李文敬是这方面的善长仁翁，像一首福建歌所唱的“欢喜就好”，只要他认为有意义，只要他能力所及，他出手豪爽，无怨无悔。

在潮州戏曲中有两句歌词是“火烧城楼全无望，担沙填海子憨工”，但拿督李文敬却是靠担沙填海建立起他的事业。他早期靠运输业，载泥运沙，刻苦经营，稍具规模后，他投资建屋发展。由于长袖善舞，待人以诚，在员工们三军用命下，近期与州政府属下的机构联袂发展屋业，在本地区堪称为颇有身价的发展商。

事业有成后，他每到年尾的收工宴都开上近百筵席，广邀亲朋戚友与他的员工一起联欢。席上美食佳肴在所难免，大量价值不菲的幸运奖颁到他们父子手软，再加上员工的奖励金，使得他们尽兴而归。

当年我们会馆春节施赠贫老时，每年的红包多由林殿利、林惠光、拿督林荔清及拿督李文敬等乡贤热心报效。有一年，执行秘书因事忙，忘了征求拿督李，过后还给他责怪道：“为什么今年没有要我出红包？是要为我省钱？还是看我出不起？”就像今年春节，有家酒楼请他当赞助商莅场颁发红包，他这一次的善举，想来没有1万也得花上8000令吉，总之他“欢喜就好”，侠义柔情！

至于说我们会馆的龙舟队与廿四节令鼓队又如何与拿督李文敬攀点紧密关系，使得他老与我们的队伍如影随形，常在我的左右，那就要话说从头了。

有一次跟他在一个吃喝的场合闲聊。他谈起有意要为他去世多年的母亲追荐功果，不过他表示没有意思要收人家的礼金。我说如果把收来的礼金当费用是一回事，但如果把悉数礼金捐助文化或慈善事业那又有另外一层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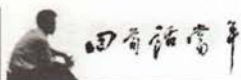
当他在犹豫时，我单刀直入地向他建议，不如把礼金捐给我们会馆的龙舟队与廿四节令鼓队作为活动基金。我再向他强调民族的文化是应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照顾的。要是民族的文化已被同化，语文被消灭，连名字也被改掉，这个民族在那个居留地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而龙舟与节令鼓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演形式。因为桨声让我们追忆起爱国诗人屈原为国为民而牺牲的伟大情操；鼓声引我们回归历史，让我们从历代兴衰的事迹中以古鉴今。

拿督李听了之后，干净利落地只回答我两个字，就是OK!

拿督李文敬答应将为母亲举行追荐功果的礼金，捐给我们会馆的龙舟队与廿四节令鼓队作为活动基金后，于是一个大场面的追荐功果大会在他的私宅举行。我们出动了全部龙舟与节令鼓的队员，穿上制服列队在门口迎宾送客，并殷勤招待到场贵宾。酒酣人散后，点算结果，礼金共收入4万多令吉。这个数目大大鼓舞了我们推广中华文化的信心。虽然我们每次出国表演会馆都拨出一笔现金，我们还须向董事们个别劝捐，每个队员也必须支付若干方得以成行。但拿督李文敬这一趟的大手笔，使我们信心满满，要把鼓声传到世界各大洲去。

捐献了这笔钜款后，他还继续以3000、5000令吉支撑这个组织。有一次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张志银1万令吉的支票要捐给龙舟与鼓队，我实在是没有理由再收这笔捐款。我说龙舟与鼓队暂时没有出国的计划，没有用到钱，如果有需要，我会向他开口。在我坚持下，他才作罢!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致力于完成两项大动作，就是在短短的半年内，将廿四节令鼓擂进神州，接着搬师到澳洲盛大演出，而龙舟队也随行参与两地的国际赛。我们在北京与墨尔本表演现场插着的一对大彩旗写道：“为会馆扬眉，为天地扬威!”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说，这的确是两大动作，两项创举，它非但横跨世界两大洲去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也为我们的会馆，我们的国家争取了一份荣誉!



为了报答他的真诚支持，我们在会长拿督林荔清的赞同下，在两次出国表演前都恳切邀请拿督李文敬担任领队率团前往。但他一而再地加以拒绝，李老的性格我很了解，他对公益事业不落人后，但要他出任学校的董事长或会馆的理事，他却意兴阑珊。他说他生平最怕演讲，带队到外国还要讲究外交礼节，他宁愿找个理想的地方去度假去做他的土皇帝，好过跟我们到国外去行外国礼。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注重礼尚往来，希望能达致投桃报李的心愿。因此我们安排了很多场面让他上镜头，譬如龙舟队在练习时，我们邀他到海南村巡视现场，几次的龙舟航举办前，他都陪同会馆负责人视察巴生港口港外的航道，有大集合时，也恭请他检阅龙舟与鼓队的仪仗队。配合当年会馆的文告，李老的大名总跟我们光辉耀眼的文化活动连成一线，并驾齐驱。

有时候，他个人或他的公司有喜宴或是收工宴在会馆大礼堂举行时，不必他开口，我们的鼓队会自动在台上布阵，我也亲自上台当司仪，营造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氛。龙舟队的总策划，也是马航高级职员洪加星，会穿着大衣，在节令鼓齐擂中陪同拿督李文敬进场，行至中场时，鼓手停擂，高呼三声“唏比奥列”的欢迎口号。想当年，前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在浮罗交怡为世界第2届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主持开幕，当他莅临时，我们的鼓手也是以同等口号欢呼他的到来。难怪李老在步入礼堂时，脚根会有点轻浮。

有一次他私下问我：“你们对我这样的捧场，会不会有人不高兴或是眼红？”

我也轻描淡写地回答他：“我想不会，如果有人像您这样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同样地捧他！”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但恩义与感情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我应该代表我们的鼓手与龙舟手，向拿督李文敬致敬！



拿督李文敬（右一）移交巴生福建会馆龙舟队旗帜给拿督林荔清（左二），（左一）钟福财。征雁（右二）和陈福财（左一）在场见证。



征雁（左5）和拿督李文敬（左6）等人参与巴生福建会馆活动时合影。



拿督李文敬（右二）与龙舟队队员庆祝在龙舟赛中有所斩获。



拿督李文敬受到二十四节令鼓团员的欢迎。

回首往事

日本投降 我们逃亡

人家是日本兵打来的时候就逃难，我们却在日本投降后才开始逃亡。

这话说来有些不合逻辑，但事实确是如此。

那两颗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扔下之后，隔了一两天，有架飞机在我们市镇的上空散发传单，我也跟着朋友跑到黑土芭去捡来看，证明日本真的投降了！大家欢天喜地，想到这3年8个月的日子已经熬过，接下来希望有幸福太平的日子可过。

谁知道，一场灾难却在等着我们。应该责怪的是英军的无能。日本兵从泰国长驱直下时，英澳联军节节败退，最后是落荒而逃。等到马来亚的子民受尽铁蹄的蹂躏，打了胜仗，人们期盼着英军早日荣归，谁知他们姗姗来迟，迟迟不登陆。这无政府状态维持了一段时日，有评论者说马共没有趁此机会接管政权，或许是坐失良机。当时虽然抗日军相当活跃，不时从外地押了一些汉奸走狗的人物，来到我们的小镇咖啡店，喝了茶，让罪犯吃一碗长寿面之后，就把他们蒙上脸，用车子载到后面芭去枪毙。那时年纪小，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去送死，难免心生怜悯。不过想到他们在日治时代的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实在是死有余辜。

这些抗日军虽然威慑力很强，毕竟是散兵之流。由于英军迟迟不肯登陆，日本兵虽然投降了，却军权在握，而他们的眼中钉就是抗日军。我们的小镇是抗日军相当活跃的地

区。小时候我常跑到一家公会的楼上去听大人们合唱抗日歌曲。他们挂布条，演讲，都在煽起抗日的情绪。

日本兵虽败犹勇，为了发泄这股憋了很久的愤恨，他们调动了大小军车，在一天午后，悄悄地掩至我们的小镇。

原本宁静的甘榜，顿时惊天动地震撼起来。妇女的哀号声，小孩的啼哭声夹杂在后巷，局促的脚步声中，邻家的一位老妇人从前门冲了进来，跑到院子里喊了一声“日本兵来了！快跑！”我那时正蹲在那儿整理风筝。大姨抱着表妹素珍坐在门槛上喂奶。那个时候的小孩子一听到日本兵，就好像碰上了魔鬼，我扔下了风筝，夺门而出，大姨也抱着表妹一起逃命。

我们径往屋后的橡胶园跑。左边几家住宅的篱笆边突然出现几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兵。他们正举起长枪，幸好不是平射，而是向天开了几枪。我们原本已吓得手酸脚软，听到了枪声，更是双脚麻木了。那条并不宽阔的黑水河，以前在嬉戏时可以一跃而过，现在居然跳不过跌进河里。大姨妇人，没有经过跳远的训练，跟表妹一起跌进水里去是可想而知的。爬起来后为了保命，继续往前逃。我看大概跑了好几个“兰带”，见到有处草丛可以掩蔽，才躲进去坐下来歇一歇。

过了不久，一阵阵的爆炸声从市场的方向传来，我们蒙在鼓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在暗忖，会不会把我们的店屋都烧了？胶园中有些老树倾斜一边地生长着，它的树根浮出地面有好几尺高，我就爬上树根去张望，要探个究竟。这是一项无知的举措，幸好日本兵的目的只是在吓唬人民，所以枪是往天空开，要是想杀人而平射的话，岂不是要给予子弹扫倒。

几声爆炸之后，一连串像是干柴遇着烈火的哗哗啪啪声响在持续着。在矮树丛与茅草间大概挨了两三个小时，听见芭边有人在走动，一个好心的老邻居喊道：“日本兵走了，可以出来了！”

回到市场一看，老店屋依然屹立着，反而是对面的华文小学被日本兵放一把火，已夷为平地，正在冒着浓烟。家庭的成员这时已从不同的逃难方向回归家园。虽然没有伤亡，但也没有什么值得庆幸，因为一场更艰苦，更大的逃亡即将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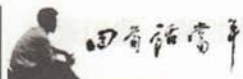
市井一片混乱，阵阵喧哗，大家都像惊弓之鸟，卷起铺盖向偏僻的大芭撤退。因为下午一场淫威烧了学校，晚上如果大军再开到，不知有何惨剧发生？还是走为上计。看来入夜之后，这个小镇就要大摆空城计了！

我们分成两第三批，先后上路，留下年纪最大的外婆与大姨丈最后才离开。我跟着大姨、尾姨及两个表姐妹，有的背着，有的提着行装，有的抱着孩子从市镇6英里半出发，要步行到9英里的大芭去暂时投宿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农家。

走到半路暮色已经晚了。一个青年踏着脚车飞也似的冲上来，不知是恶作剧还是听到误传的消息，喊了一声：“日本兵又来了！”说罢，头也不回就往前冲去。我们原本就诚惶诚恐，听了他的话，更吓得魂不守舍了。于是急急忙忙转入人家的屋后，跟黄土路有段距离，继续前进。

郊野人家，各式各样的狗儿露出獠牙，对着我们这帮不速之客狂吠。这还不打紧，最难受的是特大型的蚂蚁，有黄的，有黑的，爬上脚上与身体上乱咬，痛得每个人呼呼叫。

在这寸步难移的情况下，只好冒险再转出黄土路。抖落了周身的蚂蚁后，大家一边走着，一边侧耳细听，有没有军车开动的声响，由远而近地逼过来。其实这项顾虑是多余的。日本兵诡计多端，当年英军在东西海岸建了许多炮台，准备跟从海上登陆的日军对仗，谁知他们却静悄悄地用脚车队从泰国攻入北马。此刻我们专注于军车的声响，如果在暮色苍茫中突然闪出几个骑脚车的日本兵，那也不稀奇！几经折腾，我们来到8英里那个有三五间店屋的小市集，再向右又摸黑地走了一英里路才来到大芭亲戚的农舍。大姨与尾姨行装甫卸，就忙着打点今晚的住宿事宜。



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我从小就给外婆与大姨照顾长大。我与外婆朝夕相依，她特别珍惜我，我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她。现在兵荒马乱，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跑在前头，她在老家殿后。她的行踪安危使我耿耿于怀。隔了这么多小时，天也暗了很久，还不见她跟上。我心中焦急，老是在动着念头，非即刻见到她不可。

于是拉着表姐亚葱在一边商量。她最支持我，两人就不辞而别，匆匆上路了。当然我们是不能出声，一出声肯定给大人拉住。

我们朝着刚才的来时路，要赶到6英里的市镇去找我的外婆，看她是否安全？体力上其实已经精疲力竭了，但一股至爱的亲情在鼓动着，要看到外婆安然无恙的欲望支撑着我。我们用跑步来代替步行，看来像是勇敢，其实是具有一股蛮劲。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既惊且悸地往前冲。

大地一片凄清，夜已深沉。路旁的野狗在狂吠，农舍的门缝中透露出微弱的灯光。这昏黄闪烁的光影，使夜色更显得荒凉。我们还是把眼光盯在前方，生怕有军车的车灯照射过来。差不多还有半里路就到市镇了，我们看到有个黑影踏着脚车迎上前来。来者何人？近前一看，原来是我的表哥。在这风声鹤唳的黑夜里，他看到我们两人像无主孤魂还在游荡，喝问我们何故在此？道明来由后，他把我抓上脚车后部载货的竹笼里，说道：“外婆跟着大姨丈随后跟上了，快走！”说后，跳上脚车，急忙往前踏。可怜我的表姐亚葱，只好跟在后头，拼命地跑，拼命的追。

来到8英里转弯的小市集，看到一群人围聚着，手中握着三四把火把，照亮了每个人忧郁愁苦的面庞。原来大姨他们找不到我们两人，就跟尾姨与农家的亲戚持着火把沿门逐户地找到一英里外的小市集来。看到我们回来了，当然是既惊且喜，又恨又爱。这时候骂得我们越苛刻，就证明她们爱我们越深。

过一会儿，大姨丈骑脚车载着外婆也赶到了！看到了外

婆，我一句话也没说，投进了她的怀抱，紧紧地抱住她，然后放声哭了！当年，我才8岁！

往事云烟不堪回首！我的外婆在60年代初期因脑充血去世。我少年时最放不下，最亲切，最关怀的人撒手尘寰之后，我在稿纸上滴下了几滴真挚的眼泪，写了一篇《情感的巨债》而后就解开心结，开始作人海漂航，远赴重洋去进修了。

我的大姨郑月桃活得比较长寿，她在前两年已届90开外才逝世。尾姨郑秀波晚景不错，现在依然健在。表哥郑金瑞后期移居增江新村，经营杂货生意，也过世很久了。而逃亡时陪着我受苦受难的表姐亚葱，后来嫁给一个小园主，夫妻努力农耕，现在儿孙绕膝，老来幸福。我们来到万津，提起红毛嫂这个名字，妇女界认识她的人还真不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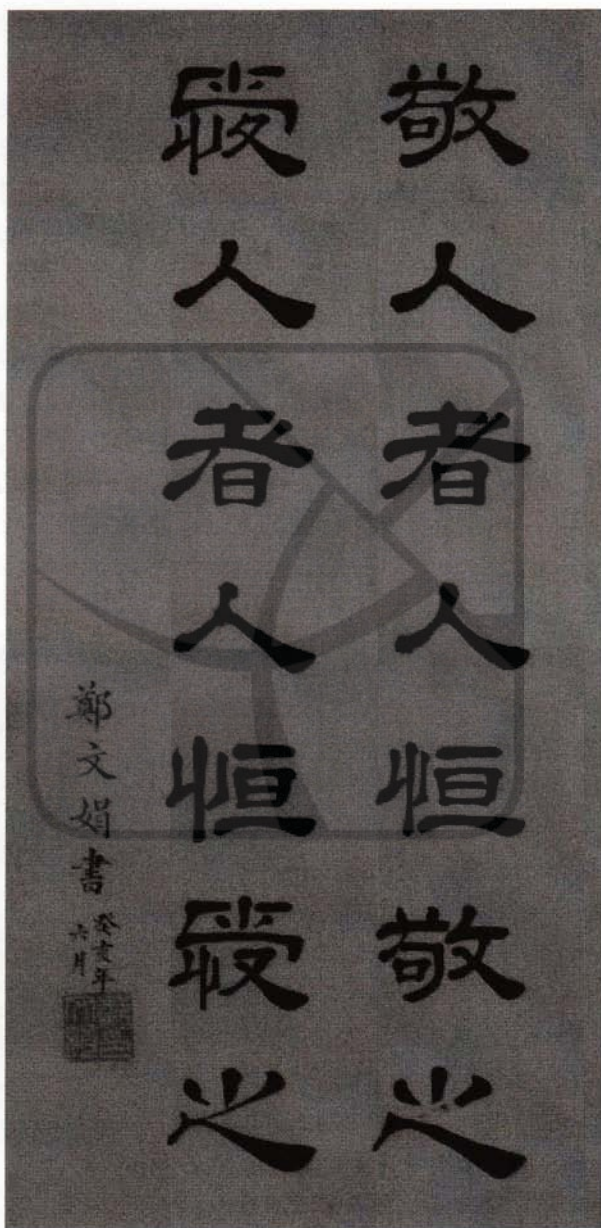
[2005年4月9日和10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后排：王葱、章素花、陈达真、陈征雁、郑金瑞

中排：章素珍、郑秀波、郑文娟、陈振良（手抱）、颜亭、郑月桃、
章益辉（手抱）、颜金珠、陈振业

前排：陈振裕、陈丽真、章素兰、陈淑真、章素心



征雁已故母亲郑文娟的书法

回首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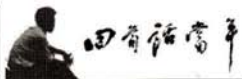
袖里乾坤远 心中日月长

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岛，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林有福政权，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突然脱离大马宣布独立，这期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旅程。对内对外的政治斗争，政坛上的明枪暗箭，对当事人来说，真是“袖里乾坤远，心中日月长”。

尤其是建国伊始，岛内没有资源，列强与周边国家都没有即时伸出援手。新加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国运黝暗，前路茫茫，像是马六甲海峡南端的一只“黑土刹”，不知何去何从？幸好，领袖果敢有毅力，他们决心要把新加坡改造成一个廉洁，有凝聚力的社会，于是广开宣传管道，教育群众，领袖人物则拟定纲领，坐言起行，身先士卒。曾几何时，任谁也不会想到这只“黑土刹”会摇身一变，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建国前后的波谲云诡，可歌可泣的故事，李光耀的回忆录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他的功过还需要等史学家的春秋秀笔来加以论定。我虽在新加坡先后住上12年，曾目睹这场历史的变迁，但因孤陋寡闻，对这“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敢随意置喙。这里提到的是曾经目睹耳闻或亲身体会过的一些移风易俗与提升效率的运动。虽然是小事几件，但也证明他们是说到做到，而且雷厉风行，所以推行的任何新猷，都能立竿见影，都能产生效果。

先举两个反贪污局在执行任务时那种穷追不舍的断然行



动。

话说新加坡国伊始，岛上某处大火，消防局派出四辆消防车紧急施援。几个小时后，每个队员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力歇筋疲地收队。待至最后一辆消防车驾入驻地，大门一关，经已埋伏的反贪污局官员全部现身，一声不动的喝令之下，全体队员举手被搜身。

结果从身上搜出很多贵重的珠宝和名贵的饰物，反贪污局局长也不赘言，只说了一句：“叫你们拿利斧去破门救人，为什么你们去破橱救出这么多珠宝？”

经过这一次出其不意的检举后，还有人敢效尤吗？

曾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辆巨型树桐车行驶在武吉知马大道上，后面跟着一辆警察巡逻车，再后面则尾随一辆反贪污调查局官员的车子。警车发觉这辆跟踪的车子来意不善，由于他们已经在半路收了树桐车的贿金，要是对方拦截检查，一定人赃俱获。在惊慌失措，无计可施下，只好踏足油门狂奔，但尾随的车子也穷追不舍。

最后巡逻车知道逃不过，将车停在路边后，驾驶员跳过沟渠逃逸，后边的两个警员也夺门而出，难道也想逃吗？后来还不是那句话：法网难逃。

我们经常看电视情节上看到的警察追匪徒，现在却演变成反贪污局的人员追警员。老实说这种珍贵的镜头要不是在纪律严明的国度，你想看都没有机会，因为在有些地方，有些人把反贪污挂在口头上，言而不行，行而无效，警员出门身上可以随意带着钱，还可以坐下来抽烟喝茶，甚至可以拦截勒索，做个“有牌烂仔”。

谈到新加坡在整顿公务人员的态度及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也煞费苦心，因为殖民地统治遗留下来的官僚作风，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过来的。但他们有的是决心与恒心，软硬兼施。一边通过教育循循善诱，一方面通过法规强制执行，假以时日，又有了收获。

就说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吧。他老表情严肃，不苟言

笑，看来是很难亲近的人，但他是世界级有名的经济学家，新加坡后来会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大家都公认他居功至伟。

就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他对其部下官员的要求也很高。有一天清晨，他巡视财政部，看到一个官员迟到，办公桌还空着，他就拿了文件坐下来办他自己的公文。试想那个官员来到是多么尴尬，要如何向他解释呢？如此杀一儆百，以后部门的高官显要还有人敢迟到吗？

我本身也有个小小的经历。那年在文化部编《电视与广播》，由于销路还不错，发行商老怀大慰，新春时节送来了两支色酒，一支给我，另一支给掌管我们这个出版组织的秘书。那时候在政府部门办事，收礼物是件很敏感的事。我们两人没有胆量收下，于是拨电到反贪污调查部门征询意见，对方的回答只是那么简单的三个字：退回去！

当时要是漫不经心地轻易收下，然后与三五友好把酒问青天，恐怕青天是没有什么好问，反贪污局的人员有很多话要问我们倒是真的。

不仅是对公务员约束严厉，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国会议员、政治秘书、政务次长、副部长，甚至部长都有一套行为准则，只要稍有越轨引起非议，上头就会加以干预，轻者给以警告，重则采取纪律行动。

话说有位大学毕业生，家境富裕，在中选为国会议员后，大概对党有功，被委为一个其实职务是不高，不过却很可以炫耀自己的官职。此君生来比较“好脸”，又有点吊儿郎当。他结婚时，广发请柬，租下人民协会，大事庆祝。其盛况使得加冷与芽龙途为之塞。后来上头认为如此铺张，当事人没有以身作则，没有在国家艰苦建国的初期实行节约，而大发请柬广收红包，是利用其官位在打秋风。虽然只是给他一番训斥，但他的官运似乎从此也暗淡无光了。

举了很多硬邦邦的例子，在本文收笔之前，让我们来谈一件软性的但却是悲伤的事。这都是由于百密一疏，老马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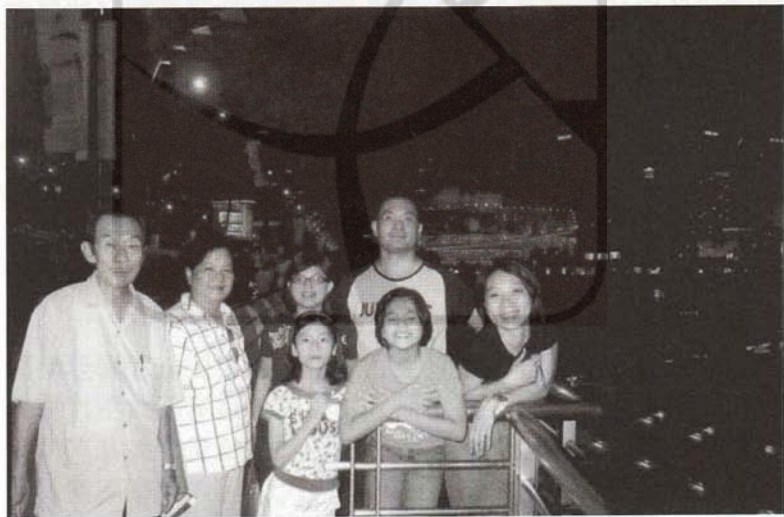
蹄，忙中有错，错了就酿成悲剧。

话说当年主办道路安全周，运动才轰轰烈烈地推展，安全周的主席就在半夜撞车身亡。是什么原因导致惨剧的发生，年代久远，我也记不起，问题是于安全周期间，安全周的主席闹出了一件不安全的事件，那个组织当然不会好受。

我也有感而发，帮安全周写了两句标语：

“宁愿迟一点到，不要永远不到。”

[2005年4月16日和17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左一）和家人在新加坡观赏夜景。

回首往事

俱往矣！那偏激与歉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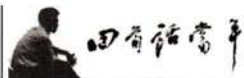
我进入雪州马华后，丹斯里李孝友即委任我为组织秘书。说来我是相当幸运的，很多吾党同志都必须经过支团支会、区团区会，然后才有机会挤上州的领导层。这实在是旷日持久的事。我却因为有了李老的关系，就坐直升机，作了三级跳。

但这个组织秘书的任务却很难担，因为马华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改革斗争后，支离破碎，不论谁坐上了宝座，都只能统率半壁江山。组织秘书的职务是要深入基层，去安抚与劝慰敌对阵营，让他们重新归队；而本身的阵营也在自我分化，派系林立，选举和其他权益的纷争无日无之。眼见到处烽火，我们必须南征北讨，四处灭火。当时我们戏称自己的工作党的消防员。

由于我的工作义务的，看到我经常到处奔波，李老就很关怀地问我的经济情况怎样？我说我有一间小印务馆在操作，不敢说没有远忧，但至少不会有近虑。不久后，他推荐我出任福利部彩票局委员。这个职务没有底薪，只是每次开会或外出公干时，有50元酬劳，外加车马费及生活费津贴，在经济上是帮不了我什么忙的。

只是能为政府服务是一项荣誉，而且出任的委员都是当时各族的达官显要，我知道李老用心良苦，是要提升我在党与社会的地位，所以铭感有加。

福利部彩票局的大小事务有行政人员在打理，委员除了



开会商讨有关政策性的项目和批准新的措施外，最主要的工作是每期开彩时，需亲至现场监督。因为这样，我们有很多机会旅行，到全马各大城镇去看摇珠开彩，而且所到之处，都得到代理商热忱的款待。在大鱼大肉的晚宴过后，他们有的会有一些暗示，就是要求彩票局多拨一些彩票给他们代理，以便赚更多的钱。但委员会对此经常有个坚定的立场，不为所动。理由是拨多了，他们在该州卖不出，就会拿到外州去销售，如此影响外州代理商的生意，他们就会提出抗议或产生纠纷。

那当儿，福利彩票在柔佛州最畅销，因为柔佛地广人多，资源丰富。他们不只在该州卖，还有部份销到新加坡，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市场是新加坡南部的印尼小岛，包括廖内群岛，福利彩票更受欢迎。

听说在苏卡诺总统倒台前那段日子，印尼币不断地贬值，拥有一张印尼钞在一夕之间就失去一半的价值，他们宁愿购买福利彩票来保值。所以很多地方把福利彩票当纸币来应用。万一开出来是头奖，1元变成40万元，岂不乐乎！

说来有趣，我担任委员时与其他各族委员每期合购200张福利彩票，两年后到我离开时，连100元的安慰奖都没有中过。但我上任伊始，一连3期的头奖都是我的家乡巴生人中到。两期是落在巴生，一期落在外州，但由巴生人在外州旅行时购得。这是巧中又巧，我不是财神爷，没有无边法术来庇护我的老乡。再说这财神爷不好当，因为我想起财神庙有对古老的对联曰：

只有几个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

不做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叫我为难！

我在参与政治后曾听说，以前的联盟和后来的国阵，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如果有个成员对其中的议案加以反对，主持人就会按下再议，不会强行通过，除非是全场无声，粒声不出，那就当作众无异议了。这种民主开明的态度是真还是假？我因为无缘出席这种会议，所以不知底蕴。不过在法定

机构中，尤其是各民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像福利部彩票局、教育服务委员会，我确有亲身体会过。

兹试举一个发生在彩票局的事例。

有一天召开会议时，主席在一份有关报告书作证下，要解除吉兰丹州的代理权。当然要解除合同必定牵涉到财务、销售或其他种种问题。在几份推荐书中，其中有一份是首相敦拉萨建议由一家与巫统与巫青团有关系的公司来取代。

我当时因为年轻，相当偏激。我对于换代理没有什么兴趣，我所关注的是一位贵为首相的最高领袖对这类事情也要来插手。

于是我提出反对。

表面的理由是政商分开，如果让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取得代理权，以后马华马青在其他州属也要求代理权，那事情就会很复杂。

在座的各族委员看到我连首相的推荐书也公然反对，大家鸦雀无声，没有人支持我，也没有人反对我。主席是老经世故的政坛老将，看到场面有点僵了，就说既然有反对的意见，就按下不议，等以后再重新检讨。

后来我在更全面地了解有关情况后，才发觉我当时的表态是十分卤莽，非常不智的。

那时期吉兰丹的政权经已落入反对党的手里，我最大的错误是不知道首相已兼任吉兰丹巫统联委员会主席。他要重振旗鼓，收拾旧山河，肯定要尽量满足基层的诸多要求。要他老人家亲自出面来处理这种芝麻小事，也肯定是情不得已。我却泼了一盆冷水，过后想来，深感歉疚。我这种性格，大概只适合跟随陶渊明去朗诵：“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那么当天主持会议的福利部彩票局主席是谁呢？原来是鼎鼎有名的政界宿将丹斯里陈东海，陈老曾深受东姑的器重，除了是联盟的秘书长，也担当许多重要的政治职务，也曾跟随东姑前往英伦争取马来亚的独立。他崇高的地位和贡

献，国人都对他十分敬仰。但后来有些华社人士对他颇有微词。事缘在宪制谈判代表团前赴英伦之前，本地主要华团纷纷提呈备忘录，要代表团呈给英国殖民地大臣，表达华人的共同意愿！但是到了谈判完毕的翌日，东姑在酒店中走过陈老的房门，看到他桌底下有一包东西，问他是何物？才知道备忘录非但没有呈上去，还原封不动地搁在桌底下。

此事并非我信口雌黄，或是从旁门左道打听得来，而是东姑他老人家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段记载。

虽然如此，我们跟陈老在彩票局却相处得很融洽。我喜欢他主持会议的手法干净利落。有问题时，可以讨论、争辩。没有问题的话，反正议程早就寄给各位过目，众无异议，10分钟内就宣布散会，然后咖啡、茶点就端出来，大家喝茶谈天。

当时，我们有三位华裔委员，除了我之外，另两位是麦汉锦和曾永森。有一次会议也是很早就结束，十来个委员正在喝茶聊天。曾永森他老可能是塞车，所以迟到了。他急急忙忙地推门而入。陈老不慌不忙地问道：“迈克，你是来开会，还是来喝咖啡？”陈老虽然不苟言笑，但开口时也常语带幽默。曾陈两老关系密切，是老朋友，一个笑话除了引来哄堂外，非但无伤大雅，反而提升了会场的情趣！

[2005年4月23日和24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回首往事

提着那灯笼来

加入马华之后，为了加强党的形象，我们策划并推动了多个大型集会，像施赈贫老、千人宴，而提灯大游行是个比较讨好而又深具文化意义的重点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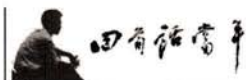
记忆所及，我在小学时候，曾参加过一次提灯游行，那是庆祝英女皇巡幸马来亚。过后或许是施行紧急法令，集会与演出受到严厉的管制。经历一段很长久时间，在报章上几乎很少看到中秋赏月式提灯会的消息。再加上苏联与美国的太空船先后登上月球，证明嫦娥的芳踪已无处寻，一般人对月娘娘的神秘感也淡薄了。

其实科技发达是不应该与传统文化节目混为一谈的，尤其是灯笼设计是中华艺术的结晶。在中秋赏月与提灯会已日渐式微的时刻，我们一批同道认为应该身体力行去提倡，去推广它，让它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于是我们决定主办“提灯大游行”。

第一届的游行比较简单。我们用一辆小罗里挂满了亮着的各式灯笼，请来了一支铜乐队，还有三两所学校派出队伍参加，再加上马华各支会的队伍。路线是从百家利花园游行至永安镇再折回。虽然碰上雨天，总算成功收场。

我用《达坂城的姑娘》的原调，改编了一首提灯歌，歌词曰：“巴生区的中秋，分外热闹，月亮呀大又圆哟。我们这里有个提灯大会，男女老少喜洋洋。您听那军乐，响亮而又雄壮，提灯队伍多壮观！带着您的弟弟，领着您的妹妹，



提着那灯笼来！”

说来有趣。我们经常跟朋友夸耀说，我们有办法使反对马华的反对党人士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游行，没有人相信。

我们把改编的歌曲录制之后，就租一辆广告车在住宅区内四处广播，号召小朋友当我们的队伍经过他们的门口时，就提着灯笼加入，跟我们一起游行。

小孩子的性格是喜欢凑热闹的，还没到冬至就想搓丸，人家有得玩，我也一定要有。看到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已买好灯笼，你说他能安于室吗？于是吵着老爸要买灯笼。但有些老爸是反对党人士，向来把马华批评得一文不值，现在他的儿子要提灯参加马华的游行，的确是左右为难。

等到提灯大队开抵他的家门，鼓乐响亮，灯火普照，小孩子能不心动吗？看到隔壁的儿童已提着灯笼加入了队伍，他也不顾一切地冲进队伍里去了，这时的老爸怎么办呢？让孩子在黑夜中混在大队中，没人照顾，多危险，多不放心呀！于是硬着头皮，为了孩子，也跟进队伍去走了！

既来之，则安之。在爱我中华文化的号召下，他也分享了一份喜悦，暂时忘记了身居何党，也在雄壮的铜乐队声中，昂起头来，健步向前！

第2届的提灯大游行，规模是扩大了一些，增添了一些吸引人的花样。路线依然是从百家利游行至永安镇再折回，但人算不如天算，百密必有一疏，有些挫折，使我们得到了不少经验。

其实我们事前的部署工作做得相当仔细。游行路线来回有多远，要明确知道。一路上两旁的树枝有没有低垂而会挡住高挂在车上的灯笼？如果有，就派员前去砍除。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点都不能大意。往后发生的一件与游行有关的悲剧是这样的：有间神庙的神出游，耍大旗，队伍行至永安镇路口时，旗竿尖碰触到高压电线，结果当场殒死了一两个人。

我们的第一个挫折是碰上雨天。游行的队伍迟迟不能出发。大型的户外活动最怕天有不测之风云。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对有关部门的天气预测，没有什么信心。记得当年新加坡举办国庆大检阅，天气预报是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结果一场倾盆大雨把李光耀总理和他的内阁部长淋得像落汤鸡！

提灯游行原本定在7时30分开始，但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雨，把行程延搁了。如果是滂沱大雨，它易放易收，来去匆匆。这种淅沥的夜雨，如泣如诉，像是绵绵无绝期似的。

要是队伍冒着细雨前进，灯笼湿了会破裂，灯火在风雨中会熄灭，那提灯会还有什么看头呢？这还不要紧，我们请来了一队远近闻名的双溪威华小敲击乐队，队员大概有四、五十人。他们年纪都很小，多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这些小朋友的安全与健康才是我们主办盛会的人要优先考虑的，而且游行的路线来回最少有两英里。冒雨前进，要是孩子着了凉，生了病，我们是推卸不了责任的。

我坚持要等，等雨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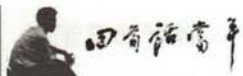
时间已超过9时，细雨还是下着，各参与队伍有些不耐烦，开始鼓噪了。他们都聚集在商店的五脚基，而乐队的小学生则躲在戏院门口和阳台底下避雨。

望着街灯，在水银光的照射下，雨丝还是飘着，我实在是有点拿不定主意了。要取消游行，解散他们吗？我不敢想象它的后果会如何！而很多负责人都逼着我冒雨游行，不然太晚了，各方面都不方便！

我烦得很，跳上一辆朋友开的车到巴生市区去转了一圈，想让自己冷静一下。我在想如果回到现场，雨还是下个不停，我只好宣布解散。

转回百家利的方向行驶时，朋友把手伸出车外，高兴地对我说雨好像停了！我伸手出去探，果然没有了雨丝。虽然整个晚上都是老天搞鬼，现在不得不感谢老天保佑了！

我回到现场，就急忙吹起集中的哨子。各方队员的脸



上即时云开见月明，有了笑容。于是狮鼓响起，党旗高擎，提灯的队伍依次出发。双溪威华小的敲击乐队也很壮观地踏上了征途。在刹那间，百家利花园的中秋之夜又欢欣震荡起来。

这届游行的重点设计是不惜工本，请广告社特制了12盏12生肖的大灯笼。亲自动手为我们赶制的是早年新加坡美专的高材生陈三保。他很有艺术天份，12只动物做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一亮灯出发，就赢得了喝彩！

我们还别出心裁，找来了12辆载客三轮车。那时候这行业已被逐渐淘汰了，只好派人到各处网罗，才勉强凑足这个数目。把生肖大灯笼绑在三轮车上，用一架小型发电机，以一条电线联系着所有三轮车。在队伍前进时，光辉夺目，连我们本身看了都有点沾沾自喜。

但最大的问题就发生在这组三轮车上。

队伍行至一处斜坡，车夫踏得很辛苦，在死命地拉着，拖着。过了一会儿，发电机还在操作，但全部生肖的灯光，都熄灭了。后头的负责人跑上来报告说是电线断了！前头的队伍已经去得很远，要停下来驳接电线，肯定会掉队，也没有理由叫前头的队伍停下来等它。

再听陆续到来的汇报，原来这组三轮车夫多数是抽鸦片的。刚才等雨停已耽误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没有去抽上两口，已经没精打彩了，上斜坡时，个个都投机取巧，不出力，想靠前头卖命踏的人能通过一条电线把它的车子拉上去。如此这般，怎不把电线扯断呢！

气煞是没有用的，去责怪这帮鸦片仙也无济于事。商量结果，还是让他们摸黑前进！可惜的是我们花最多心机的压轴戏，只是昙花一现，为中秋节露出一道璀璨的光芒后就落幕了！

多一事长一智，经历过这些艰难与挫折，日后再办提灯会，相信会做更多思前想后，未雨绸缪的工作。

回首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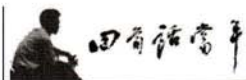
滨海夜放花千树

我们在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以马华一个小支会的名义一口气主办了三届中秋提灯大游行。虽说辛苦，但因为知道本身的行动并不孤寂，而感到快慰。那时从报章上有限资料得知，槟城和关丹有灯笼会的举行，而巴里文打也有提灯游行。这足证有不少不忍坐视中华传统艺术日渐式微的人士，已在默默地策划与运作，要使中秋这个节日与灯笼艺术再放光彩！

文化虽说是一种摸不到的，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但它是民族的根，民族的尊严。当它静止不动时，它仿佛一无所有；当它动起来的时候，它是充满激情的。有人做了就有人跟，当很多人参与文化活动时，它就蔚成风气。

往后的几年间，很多华团都有中秋赏月会，灯笼会及提灯会了。在捷报频传中，最意想不到的的是《星洲日报》与国家博物院联合主办了灯笼制作比赛。这个举措非同小可，意义深长。连国家机构都参与提倡及推广灯笼制作，华人团体还能对自己的传统艺术坐而不睹，视而不见吗？

据钟润光校长透露，他掌校的滨华一小，也受邀参加，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制作新的。他便把曾经参加过我们提灯大游行夺得冠军的，以薄薄峇迪布制成的风筝灯笼，从储蓄室取了出来，抖落了尘埃后，拿去再参加比赛，结果又夺得冠军。这足以证明有创意的作品，置诸于任何场合都会被赞赏的。



提起这深具本地色彩的峇迪风筝灯笼，我印象还很深。当所有参赛学校在赶制灯笼期间，我曾到访各校与美工老师及同学们交谈，目的是感谢他们全情投入的支持。当我来到滨一华小时，钟校长与他得力助手黄冠燊及美工老师们曾给予殷勤招待。但当我要参观他们参赛作品时，他们竟然闭门谢客。不管这是闭关自守还是闭门造车，想来他们的创作必定是有一些斤两，不然怎么会赏大会主席以闭门羹呢？但这也证明当时各校的竞争情绪是多么激烈。正因为各校都全面动员，日以继夜地投入这中华传统艺术的创作，导致我们的第三届中秋提灯大游行在大马华裔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份荣誉是应该跟巴生区华小的各校师生，尤其是美工老师一起分享的！

对中秋的怀念，对灯笼的爱心，我们所做的推广工作，已点燃了星星之火。看到全马各地逐年都有不弱的响应，我们深信这把燎原火是指日可待的。既然后继者众，于是我认为自己应该转移目标，向别的文化领域进军。

我在1980年加入巴生福建会馆当董事。81年起由于老友林荔清出任会长，承他抬举，要我出任教育主任来推展文化工作。真是侯门一入深似海，我一踏入之后就捱了21年。这期间从教育主任，副会长做到署理会长，都是义务地在拓展比较有创意与大型的文化活动，包括教育周、庆元宵、龙舟赛、龙舟航、廿四节令鼓队，各民族百人大鼓队、女子大鼓队、三期的美术教师研讨会、3M教具展、马拉松式的中小学美术展、书法展及华人节日由来大汇演等不一而足。当时在副主任林少青及执行秘书苏继业的配合下，虽然责任繁重，工作不易，样样都得大动脑筋，但因董事部同人全面支持，巴生各文教团体不断协助，所以终能过关斩将。

后来会馆的青年团要举办中秋提灯，找我帮忙策划。我考虑了当时的环境后，给了他们几点建议：首先以巴生福建会馆的人力财力，要举办一个像我们以前办的中秋大游行是绰绰有余，问题在于推广。假如不老是局限在巴生，而能把

它推广到周围的市镇，让更多人了解庆祝中秋的意义，提倡灯笼制作的目的，那就功德就更为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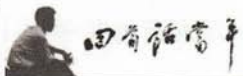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把它推展到巴生滨海区。所谓巴生滨海，其实涵盖了很广阔的地带，所有雪兰莪州的滨海市镇都包括在内。记忆所及当年雪州有12个国会选区，而巴生滨海区就占了8席，以后选区不断划分，此区的议席有增无减。

其次是把这项活动推广到乡村，有更大的效果与更实际的意义。当年我的独幕剧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公演时，作者虽有成就感，但毕竟观众的人数有限。有一次拙作《雨夜》在大港乡间演出，村民争相走告，天还未晚，很多村民都从家里搬来椅子霸占了好位。到上演时，连树上也爬上了观众，此情此景对作者与演出者都有极大的鼓励作用。

70年代我从新加坡回来后，以马青团的名义排演了一出南来作家白寒的名著《头家哲学》，为马华总部大厦筹款。在巴生演出，因为是自己家乡还能连场爆满，去到吉隆坡市政厅演出时，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因为大都市的人餐宴与娱乐的选择太多，这种文化性的演出，你送票给他，请他来捧场，他们都不来。就如我的儿子其贤在推广篮运，在八打灵的球赛，我去参观。观众席上疏疏落落，真是“余不欲观之矣”！但当球赛移到仁嘉隆新村或万津举行时，反应就十分热烈。

当年中国抗战时，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深入乡村，走上街道去演街头戏。在激情的煽动下，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背起枪杆，上了战场。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青年团在陈友信硕士的领导下，有一帮思路先进，能够举一反三的干才，他们原则上赞同后就坐下来研究如何推广。我建议把巴生滨海区一分为二，分两年的时间来走。第一年先走瓜拉冷岳路线，从直落或仁嘉隆推展至森州边境的双溪比列和雪邦。第二年走瓜拉雪兰莪路线，从加埔起到霹靂州边境的沙白安南，途中的市镇都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于是青年团组成先头部队，在每个据点展开部署联络。我的工作只是出一把口，当各地有意联办的各团体代表分别举行会议时，我就前去演讲，阐明中秋节存在的价值，强调灯笼的文化意义，并把我们的一点主办提灯游行的经验告诉他们。

各地华团代表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者大不乏人，现在看到有人从巴生福建会馆来鼓吹与领头，再看到左邻右里的市镇都有了反应，所以不参加者几稀！

其实会馆青年团只用了最有限的资源去拓展一项最有成就感与涵盖面最广的文化活动。因为各地的提灯游行费用都由各联办团体承担，我们只是特制了一个特大型的跑马灯放在罗里车上作开路先锋。

而且这盏灯在2年间的两条滨海区路线上，用了十多次。有些主办单位如果有要求，我们会从巴生或吉隆坡央请一些文娱表演队伍前去助阵，以壮声势。

这2年间，一次向南，一次向北的滨海区提灯大游行，除了各站点都有爱我中华文化的人士在默默推动外，我们会馆的青年团有一批骁将，也居功不小。在我依稀的记忆中，像陈育顺、傅天明、杨志全、周万标、洪玉彪、连有福、陈福财等等，他们都跟得很紧，做得很勤。这帮年轻人还有个优点，就是这么劳碌地南征北讨，却没有一个人争着要代表会馆上台讲话。而我也不敢掠美，这两年有举办提灯游行的十余个市镇，我只在一两个站点讲话，其余的都委派会馆一些比较资深的董事前去致词并主持点灯仪式。

第二年走瓜拉雪兰莪这条北部滨海路线时，南部的活动继续进行。我们又想出了一个招数，就是要求各地主办单位，在游行完毕后，将他们的花车设计好好保存，我们将汇集这些花车在巴生举办花车大游行。

果如其然，各地领导人都给予大力支持，因为他们花了好大心血创制的花车，游完街就要毁掉，多么可惜。现在有机会到更大的埠头去再展雄姿，何乐不为！更何况是可再次

弘扬中华文化。

这次的巴生提灯花车大游行，涵盖面就很广了。由于丹斯里林玉静出任了大马福联会总会长，而他在巴生推动华教是广受敬仰的人物。我当时是福联的文化主任，跟他接触频繁。他建议这项大游行由大马福联与巴生福建会馆联合主办，再邀请巴生十余个福帮属会加以协助，这样一来就阵容鼎盛，号召力也很强。

当晚参与提灯花车游行的单位共有40个，可说声势浩瀚，璀璨无比。我们会馆呈献的4辆花车，其中2辆是滨海南北这两两年来的领头巨型灯笼车，青年团一辆花车及提灯队，再赶建一辆龙舟花车，由24名划手拿着桨在花车上陆地行舟。出动军乐队的有滨华独中、兴华独中、修道院女中、万挠三育华小及巴生培英华小5个单位。

参与提灯队的华小是滨一、滨二、青年、中华、培英、中华女校、兰花园、启明、班B。派出提灯队的除了兴华独中，还有雪邦、丹绒士拔和仁嘉隆的社团。

最使主办当局感到欣慰的是，巴生滨海南北两条线上的社团反应十分热烈。他们的花车设计多侧重在民间艺术，手工细致，构图精巧，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真善美！这些双管齐下，出动花车又有提灯队的华团来自加埔、沙沙兰、巴东新村、瓜雪、巴西不南邦、适耕庄、大港、万津、双溪比力。

日莲正宗派出150人，分成水族表演队与欢欣表演队，沿途表演。其他的节目有新韵音乐社花车、南安青年团舞蹈队、圣约翰与红新月会救伤队、高跷队、单轮车表演队，再加上领前开路的旗队、标语队及丹斯里林玉静与拿督林荔清率领的大会职员队，浩浩荡荡地从巴生福建会馆出发，再次在巴生街市上散播文化气息，再次把巴生皇城闹翻了半边天！

回想当年，巴生滨海区各市镇的中秋节像“春风夜放花千树”，乐队鼓声嘹亮，传灯歌曲悠扬，花车光华夺目，灯

笼火树银花。如斯盛景，依然历历在目，印象犹新。时至今日，中秋的庆祝四方响应，灯笼的游行已蔚成风气，甚至有些华团还倡议列中秋节为公共假日。

当中秋的庆祝活动与灯笼的制作在逐渐式微的年代，全马各地传统艺术的推手却献出爱心默默地耕耘，他们在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在今天花开满树！

〔2005年5月7日、8日和21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巴生滨华一小的风筝灯笼二度夺得比赛冠军。

田有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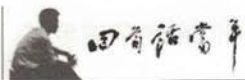
我们来到了汨罗江

由于中马区一路来没有龙舟赛，巴生福建会馆认为这项传统文化应该提倡，但经验缺乏，不知从何下手。当时槟城经常有举办国际龙舟赛，马六甲也有几位马华的领袖在推广。有一天在报章上看到2位负责人是我在担任马华中央文化委员会主席时的成员，于是在会长拿督林荔清率领下组队前去拜他们为师，并参观当地的造船厂，结果决定购置5艘龙舟。

赛会还没有举行，就捷报频传。在当时的州行政议员拿督黄天福的穿针引线下，雪州政府议定将我们主办的龙舟赛列为“雪兰莪州嘉年华会”的主要节目，并拨款5万令吉赞助。这一来，声势非凡，赛会也在盛况空前的情况下假梳邦湖举行。参加的队伍共24队，除了大批华团青年参与外，马来军团与工厂的印度工友，纷纷上阵。他们对龙舟运动的热情演绎，才教主办同人十分鼓舞。

往后我们会馆的龙舟队先后参加槟城、波德申与马六甲的龙舟赛，并鼓励马来同胞参与划龙舟活动，将5艘龙舟借给巴生市议会，先后在巴生河与港口的北港码头举办龙舟赛，在马来群众中也掀起了一阵热潮。

3年过去了，到1991年，有一天新加坡的光辉旅游社老板，也是新加坡著名老作家符红雨先生来访，带来了一位中国来的贵宾，邀请我们的龙舟队前往中国湖南参加他们主办的开放后第一届国际龙舟赛。这就大件事了，我们在受宠若



惊之余考虑了3个要点：一、湖南的汨罗江是屈原葬身之地，也是龙舟的发源地，能够身历其境参与赛事，意义深长。二、受到中国主办当局的邀请，对巴生福建会馆是件难能可贵，十分荣耀的事。三、不论胜败，我们果真派队前往，都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华传统文化。

经董事会批准后，会馆拨款2万，多位董事再以个人名义热烈捐助，队员本身也负责若干，总共筹得67万。在经过了3个月难度很高的体能集训与海上划舟训练后，我们踏上了征途。原以为国内有其他队伍前去，结果证明是我们单刀赴会。我们的财政林惠光还在兰花酒家设宴，为将近30位的团员饯行。黑狗啤厂商报效全体职队员特制的参赛制服，大马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玉静特地赶来主持授旗仪式。

我们的队员中像洪加星、林贵发、陈潮才都是马航的高级职员。他们曾代表马航参加澳洲的国际龙舟赛。据洪加星告诉我说，国际赛的联欢会有要求各国队伍上台去唱歌或表演节目，我们必须先有准备。我考虑之后，将国内脍炙人口，在国际场合经常都有人唱的Rasa Sayang，除了开头的那一句以马来语唱出，下边的一段则改成华语歌曲。这首曲调，活泼热情，轻快豪迈，容易唱，又讨好。

改写后的歌曲定名为《我们来到了汨罗江》，歌词如下：

我们来到了汨罗江，
放眼北国无限的河山；
我们敬仰诗人的气节，
世世代代永不忘！
我们在迢迢作万里行，
来自遥远的南方；
我们支持传统的文化，
不管得奖不得奖。
转眼端午又来到，
各国划手逞英豪；

划呀划呀划呀划，

嘿！划出友谊的春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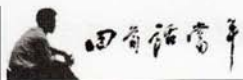
我们大队人马来到岳阳时，龙舟的技术如何还没有表现，但已歌声嘹亮，先声夺人。大陆内地的人开放伊始，见闻有限，总把马来西亚当作一个番邦，只会讲番话，听到我们的歌声中似乎参杂着华语，接近我们时才知道这些番客讲得一口比他们还要标准的普通话，于是引起他们的好奇与赞赏。我们的巴士途经岳阳街市，队员唱起了《我们来到了汨罗江》，街市众人引颈注目。一位老人家听得入神，一边踏着脚车，一边回过头来张望，结果车与人一起撞上一棵树。

我们在汨罗江南湖赛场练习，也是歌声不辍，引起了一大批人士的围观，再将印有我们龙舟队彩色专辑的《南洋商报》在现场分发后，立刻引起主办当局、新闻界、电视台、电台的热烈反应。有者漏夜走访领队拿督林荔清，谈初到贵境的感受，有的在赛场访问我改编这首歌的动机与过程，有的电台访员要我清唱，以便播给湖南的听众欣赏。最大的阵仗是湖南电视台搬来了摄制队伍，租下一间冷气卡拉OK歌厅，录制了《我们来到了汨罗江》的访谈与队员的大合唱，最后也劳驾了北京新华社派员到我们住宿的岳阳宾馆作了一场专访。

这是光彩的一面，但也有暗自饮泣的一幕。

我们的队员多数年纪偏高，虽然孔武有力，但身裁却乏善可陈。那天在飞往长沙的途中与台湾的冠军队同机。此队个个肌肉饱满，像是举重人士。看到我们老中青的组合，以为我们只懂番话，就用闽南说了一句：“这一队我们可以随时把它夹起来！”，意思是用筷子夹菜那么容易！回来检讨后大家已经憋了一股晦气，再因为参加让各队熟悉水道的不计分的预赛，我队居然在分组赛中包了尾。这一比试，才知道自己的队伍是如此不堪一击，有些队员悲从中来，羞愧地哭了。

再看看别人的队伍是如何严格地训练，我们就自惭不如



了。中国参赛最强的临湘队，听说是从钢铁厂调来的技工组成的，个个剃光头，一有差错老教练用湖南话骂得他们头都不敢抬起来，而且用一支有两尺长的藤棍，指着额头，指着鼻尖，几乎要打下去了。我在想，如果我用这个方法对待巴生福建会馆的龙舟队，我早就被他们合力扛起丢进港口的海里去了。

经过一两天练习的观察，队员发现我们表现如此差劲，问题是出在桨上。主办当局给我们的桨太大太长了，而且船身狭窄，坐在同一排的两个队员会互相撞击。又有队员投诉中国队员的桨比较小支，而且划后就用布袋包起，不公开亮相。我们先保持缄默，后来是澳洲队提出抗议，我们也跟上。

这一晚一位代表主办当局的旅游局高官来到我的房间，房内挤满了整20位的职队员跟他争论一些问题。他争辩不过我们，说了一句：“你们的歌词不是写着支持传统文化，不管得奖不得奖吗？”我回答他说：“我们带着一片热忱远道而来，不论胜败，我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传统文化。你们主办当局如果用这种手法让自己的队伍得胜，会否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工作上留下诟病？”他听后不再争辩，吩咐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办事处领取新的桨，也决定半夜赶工做给我们。此君原本似乎有点怕输，但也开通，而且开通得可爱！

湖南的国际龙舟赛使岳阳沉醉在前所未有的欢欣振荡中。那龙城一条街，70多只各式各样的巨龙设计在街头街尾此起彼伏。53艘各厂商、企业、学校、政府部门以龙为主题创制的彩船，绕着比赛地点南湖在巡弋。

开幕时，4条形象逼真的巨龙在主席台两旁的水道冉冉上升，向观众致意。接着“礼花迎宾”由15发礼花弹喷射出五彩缤纷的各式图案和显示出“岳阳人民欢迎您”。“水上摩托竞速”节目中6艘高速行驶的摩托艇，让人目眩心惊。

“对空击彩”则是10名运动员坐在3艘汽艇上将空中飘落的600个彩球一一击破。

“花样滑水”由15名滑水员表演叠罗汉及跳台滑水。

“飞机花样跳伞”由24名跳伞员，不论从任何角度或任何姿态跳下，都能平稳地降落在湖中的平台上。而在空中时则敬献节旗、踩汽球、飘彩带、作天女散花式的精彩表演。还有轻型飞机低空飞行撒彩纸、喷散30米红色彩带。总之节目的精彩绝伦，充分表现了泱泱大国的气派。

观众像倾巢而出的蚂蚁，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南湖旁边的几座山头，估计有30万人。看到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场面，我对我们的队员说：“胜败不要紧，现场有30万人看着你们划龙舟，你们已经很荣耀，夫复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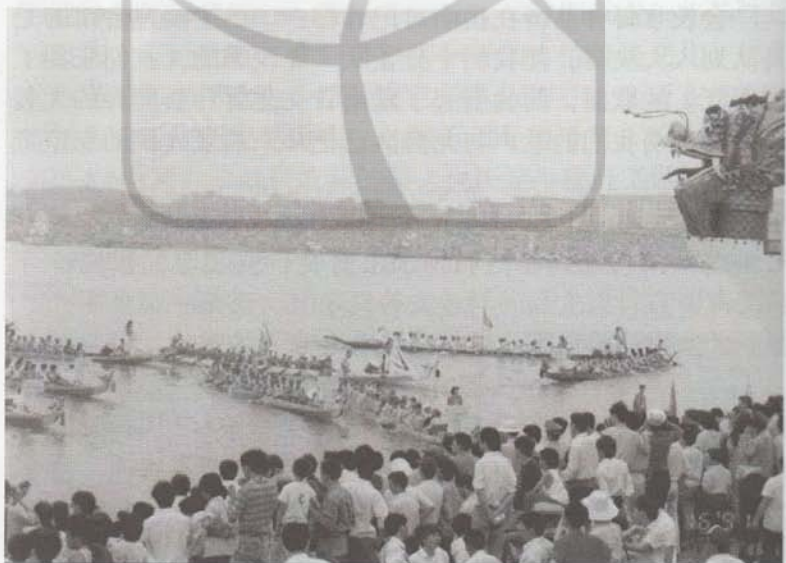
国内外共有27支队伍参赛。我们的队伍抹去了泪痕，在教练兼队长林贵发的运筹帷幄下，身心全然豁了出去，在第一天的初赛与复赛中，横扫日本、台湾、英国及香港的队伍，昂然进入国际6强。第二天大决赛更上一层楼，荣获赛会的第5名。

会长拿督林荔清在岳阳对记者称：“巴生福建会馆的龙舟队划入大决赛，使我们十分雀跃，而改编的《我们来到了汨罗江》的歌曲，的确引起了湖南省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大轰动。这证明我们的歌声与龙舟队已把马来西亚人民的友谊带到中国来。”

[2005年5月14日和15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巴生福建会馆龙舟队在汨罗江合影。



成千上万的观众在汨罗江两岸观赏龙舟竞赛。

田奇福书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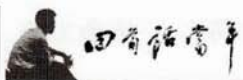
经历了两次提灯游行，面对许多挫折，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经过检讨，归纳了几个要点，以后再组织类似的游行时要特别注意：

(1) 为了增强气氛，激励士气，游行时能安排越多的乐队越好，不管是铜乐、弦乐、敲击或是华乐，只要乐声响起，就会振奋人心。由于提灯队伍一般上都是安静地前进，我们鼓励队员在沿途上可以合唱歌曲，增强欢乐气息。而大队若能以狮队领前与殿后，也可收到鸣锣开道，击鼓收场的效果。但要距离得当，以免狮鼓声将其他乐队的声浪盖掉。

(2) 如果是大型的游行，沿途围睹的观众人山人海，则灯笼切不可提至肚脐的高度，而要撑高到头上前进，要不然站在后面的观众，将欣赏不到你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灯笼。我们建议各队伍可用藤枝拗成7字形，把灯笼悬挂在顶端。

(3) 小时候我们用蜡烛点亮灯笼，但参加游行就不行了，因为蜡烛被风一吹就熄灭，提灯者要停在路边再点燃，整个队伍就显得很散漫。最好是用干电池亮灯，要不然就用小型发电机，以电线接通队中的所有灯笼。一来不怕熄灯，二来在夜色中灯笼发出的五彩灯光璀璨美观。

(4) 乐队在夜色中前进，本身没有亮光，威严美观的制服显现不出它的特色，最好后头跟着小罗里，在车顶用探



照灯照射。要不然则要求每个队员的帽子上装干电池小灯泡，可照亮自己，使队伍更壮观。

(5) 主办当局应该分发给参与队伍若干经费，他们拿到钱后，可以马上购买特制灯笼的材料，从速进行工作，要不然等校长来倒贴这笔费用，一来不公道，二来工作就会耽搁。

(6) 至于灯笼要怎样提法，也应该跟他们说分明。“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且是悬挂在藤的顶端，就没有问题。要是用一支长棍绑住灯的底部前进，那就贻笑大方了！因为根据老一辈的人说，这样的提法，跟出殡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的那两盏大灯笼的提法一样。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动员了好多文教界人士的策划，我们决心扩大规模，举办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型中秋提灯大游行！

虽然我们是用政党的名义，以巴生武吉拉惹马华支会来继续主办，但只要目标正确，富有意义，各界人士依然大力支持。我们向巴生区68个华团发出邀请信，结果有52个单位应允派代表作为我们大队的领导人。我们也邀请17位政商及教界的知名人士组成顾问团，再特别请商文教艺术界的顶尖人物凡13名组成评判团，成员包括：杨忠智、钟正山、黄兼博、林木海、刘国耀、梁志成、赵自新、周福泰、罗大章、林缙文、张耐冬、李业霖、曾松华。

在符气湖、王谦怡领导的巴生滨海华校教师公会的全面配合与协助下，我们得到该区域的12所华小派出19支队伍参加，真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由于参加游行就等于参加灯笼制作比赛，而作品不能买现成的，必须是各校自己的创作。

大家本着为校争光，为传统艺术尽点棉力，不仅是美工老师与同学们日夜不停地埋头苦干，连家教协会也动员参与其盛。大游行举办前的一两个月，该区域的教育界已掀起了制作灯笼的沸沸扬扬的气氛。我们主办者只是总其成加以

发扬，而各校的美工老师却身体力行，让传统的艺术开枝散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才是居功至伟。

当时的王谦怡校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代的美工教育，着重于启发儿童的创作能力。通过这次的设计与创作比赛，儿童有机会去表现他们创作及设计的才华。集体创作及分工合作增广视野而达致美工的教育目标。”

在学校方面有了热烈反应后，接着喜讯频传。滨华中学、咸沙中学、永春公所青年团派出3大军乐队来支持，桃源俱乐部的南音组与加埔四里松青华乐队也将坐在花车上奏乐助兴。我们主办单位的国旗州旗党旗队，两幅蓝底白字，上面书写“宣扬中华传统艺术，促进各族文化交流”。大标语队以及我们特制的大型宫灯队则由蒲种的林俊海与吴清州派来的大队人马负责。

最后要解决的是检阅台问题。请来搭台的职业人士，开的费用太高，而且是演大戏的戏台，不是我们所要的。于是灵机一动，把我经营印刷馆夹纸张的木板搬几十块来平铺在草地上，只要高出几寸，就是一个平台。然后请广告社用三夹板锯一轮直径有20尺长的圆月，喷上发光的黄漆，再砍来一些竹丛，围绕圆月的两边，竹底用灯光射上打照。圆月上的主题，请我的母亲郑文娟女士题字，写上“巴生武吉拉惹马华支会主办第三届中秋大游行。”先母从年轻到晚年都热衷于书法，她的柳体楷书与隶书体写得不是我说好，而是别人多赞好。

这样一幅检阅台的图景，诗情画意远远望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一轮圆月从大地升起，旁边竹影扶疏，学生们提着鱼龙与各式各样的灯笼，摇曳着操过圆月前检阅台，景象有如宋朝辛弃疾所写的：“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里玉壶是指月亮，光转是普照。

责任虽然艰巨，工作也辛苦，但我们几位负责人却精神抖擞。在我左右的邱暮祥校长和冯万顺工作最繁重，忙了两三个月；钟润光校长和洪灯明校长在咨询与联络工作上扮演

重要角色。工委会的执行小组苏继业、周清顺、郑振中、庄志斌也尽了汗马功劳。大会议决商请林荔清担任游行大队的总领队，黄美才为总顾问，同时恭请丹斯里张汉源部长莅临主持开幕。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或许是三、四十年来所仅见，也可能是大马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中秋大游行订期1980年9月20日夜晚举行。出发地点是百家利花园大草场，途经联邦大道，转入西礼路而后在中路口巴生幼稚园前面的空地解散。

真的不出所料，游行时间一到，百家利花园的草场，街道可说万人空巷。联邦大道挤满了的人潮，交通可说断绝了，因为驾车人士都把车停在大道上看游行。

当张部长点亮一盏灯笼，一簇气球将它冉冉拉上夜空时，在场的几百盏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灯笼都亮起了灯，现场七彩缤纷，美不胜收。接着军乐齐鸣，南音委婉，华乐悠扬。群众的欢呼声像热火朝天，游行队伍操过检阅台与评审台时有如波澜壮阔。这情景用“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来形容最贴切。

我们原本是要求各校同学提灯游行，结果他们别出心裁，各展奇招，很多料想不到的花样陆续推出。他们不只是提，甚至于推、拉、抬、扛、抱、捧、举、背、戴、挑着大灯笼来前进，可谓跳出旧框，使场面大异其趣。所设计的灯笼款式包括：国旗、国花、星月、风筝、马来曲剑吉利斯，充分表达了我华族友爱和亲善的情操。还有蜈蚣、马车、灯塔、雨伞、走马灯、各类乐器、手推式大蝴蝶、各类精巧之花篮及各种本地水果，令人游目骋怀，耳目一新。

刘瑞平校长看到这场文化盛会的伟大场面，联邦大道上群众的欢声雷动，夹道欢呼的情景之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盛举必然会唤起民族艺术意识的自我醒觉，掀起一种在艺术上强烈向上求进的作用。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在我国大放异彩的动人场面，也享受到传统艺术高度发挥的兴奋。”

在游行队伍中，我走在滨华中学乐队指导张国荣的后头。当他看到共和学校右邻的天桥上人潮挤得重重迭迭时，他情不自禁地一直回头对我赞叹道：“空前！空前！”

星洲日报驻巴生记者发出的报导，描绘这场盛会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提灯大游行。南洋商报则报导称，观众不下5万人，引起一阵狂潮。没有见报的新闻是，由于联邦大道交通阻塞达两小时，受困人士中有一位来头不小的警官心中忿忿不平，恫言要找我算账。后来请有关人士去解释一番，他也就不了了之。

参加中秋提灯大游行的巴生区12所华小是：启明、中华女校、树人、班B、滨二、滨一、班A、共和、循民、中华、兴华及青年。比赛结果滨一以峇迪布制作的风筝灯笼队夺得冠军。

大会结束后，记者问我的观感。我说，如果我们和未来的那一代，只满足于目下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本族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一天，我们固有的文化会被我们自己抹煞掉。因此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用行动表现，实地去推广，才是上策！

[2005年5月21日和22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中秋提灯大游行其中一个景观。



征雁在第3屆中秋提燈大遊行開幕儀式上致詞。

回首往事

跟老作家做朋友

姚紫是上世纪新加坡著名的文艺作家，曾任职于报馆，主编文艺副刊；柳北岸则大半生从事电影工作，同时也是名诗人。这两位资深的老作家，我在旅居新加坡时，都跟他们交过朋友。

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此两人，皆为吾师也！

姚紫曾出版《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马场女神》、《阎王沟》等，由于当时他任职于《南洋商报》，在报章大事宣传后，的确轰动新加坡文坛。较后期刘芑农的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杂文，小品集像《黑夜行》、《情感的野马》，都是他的呕心力作。

他的小说，注重气氛的营造，多能独创风格，不落俗套，篇篇都有新的意境。由于具有丰沛的文学修养，他对文字的运用也十分老练与挑剔。某篇文章描绘在深更半夜越过新柔长堤，到了狮岛时回望新山，他写道：“新山，夜正浓！”在文章末尾，以这样勇于创新的字眼来抒发他的所见，他正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意境！

我最欣赏是他编文艺副刊和文学刊物的版面设计。他力求新颖，突出大方。回忆几十年来的文艺界在这方面下苦功的编者似乎很少。他曾经私下对我诉苦过，当年他在国内初次编副刊时，有朋友讥讽他编得很好，说一翻开报纸，小说、散文、诗歌刊在那个部位，读者早已心里有数，不必费眼神去寻找。这之后他就专注于版面设计，推陈出新。也就

由于要求过高，东要一副插图，西要有一些线条，对排字房的工友来说，等于画蛇添足，因此时常引起冲突。

我认识姚紫，是在50年代。那时我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正困守在家深居简出。有个傍晚，吉隆坡的郑捷浩带他到巴生来找我。我因不修边幅，穿了件背部有裂缝的衬衫准备迎接他，给我的父亲制止了。他说姚紫是有名的大作家，不能穿着破衣跟他见面，可见连我的父亲对他也十分敬重。

跟他初次交往，觉得他很健谈，分析事理也头头是道。印象最深的是他手中握着一罐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我当时在文艺界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能够与这样一位大作家识荆，深以为荣。他了解我的处境，回新之后，写了一封“良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信鼓励我。

以后我到新加坡求学办事，也常跟笔农与谢克去拜访他。我从来没有在他编的副刊与刊物写过稿。与他交往，纯粹是敬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日子久了，发现此老性格古怪，脾气暴躁。跟他在一起谈论事情时，你必须对他拿顺风旗，要是向他吹对头风，肯定会有一场不愉快的争论。

譬如他拿起一本行将出版的封面说：“这个设计看起来很沉！”你最好回答说：“看起来不会浮！”要是他说：“这个版面很暗淡！”你的回答最好是：“是呀，看起来很不起色。”要是你说：“不会呀，这种色彩正符合现代潮流……。”他肯定会跟你没完没了！

有个时期他来吉隆坡编《钟声报》，听郑捷浩说也常因排版的问题，发起脾气时对着排版工友满口三字经。但此老脾气属于“火灰性”，待尘埃落定后，他又觉得有负于人。于是买了大包、小包、烧卖回去孝敬那些工友。

最近笔农在他的作家回忆录中有一篇写到姚紫与苗秀两老在斗气的小故事，十分精彩。由于笔农是姚紫的学生，也曾为他们出版过好几本书，对两老的“空头”知之甚详。话说新加坡的独立桥通车之后，苗秀还没有走过。有一天要姚紫载他去吃风。还未到独立桥，两人在车上就有了一点口

角。来到桥边，姚紫把车停下说：“你自己走路过去看看，我在这里等你！”苗秀也不勉强他，就步行走完独立桥。到了另一边，他跳上一辆德士就直接回牛车水的老家去了。过了几天，两老又碰上了，姚紫直斥苗秀有去无回，害他在桥边等了几个钟头。苗秀说：“你会等我？那天还未到独立桥你几乎想赶我下车了，我不会那么傻，再回头去扑个空的！”

在五、六十年代，女作家很少，尤其是外来的成名的女作家更是一枝独秀。香港的女作家殷勤来到《南方晚报》服务不久，便上演了男同事在编辑部因争风吃醋丢红墨水瓶的事件。她离开后，姚紫帮她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印行了一份刊物。有一天殷勤到槟城访问，当地的多位老作家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后，有人诗兴大作，出上联“殷殷勤勤地”以求对，也有人不慌不忙地对曰：“萧萧遥遥天”（萧遥天），结果哄堂。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

姚紫虽然先后创作了多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根据刘笔农在作家回忆录中说，那时候姚紫正面临一大群左翼人士的围攻。他们之间最大的症结问题是对黄色文艺的认识、了解及定义，因为姚紫的一些小说，篇中常有女性的出现，而且还有时会出现一些涉及男女间“性”的表现。那些年轻人多认为他蓄意进行这些性事描写，似乎故意拿性活动的情节来诱惑读者，是属于色情的读物。当时整个左翼潮流都在反黄，他们当然视姚紫是黄色作家的代表。其实姚紫并不是不知道当时的大势所趋，只是他的性格不信邪，不避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震荡！

我在五、六十年代以学潮为背景写的中篇爱情小说《升旗山下》最近重修后再版，槟城的陈炳光在序文中就这样写道：“其实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止是一个动荡的，更是一个喊打喊杀的‘战斗年代’。那时期无形禁区满坑满谷，比比皆是，读书人要写类如《升旗山下》的柔情小说，还真需要有点勇气。”想当年在处理爱情小说，描写情到浓时，如履薄冰，连一个接吻也没有。马华文艺评论家陈雪风



看了说：“那也难怪，我在那个年代谈恋爱，连女朋友的手都没有摸过！”只有我那小儿子，看到如此保守的写法，批评道：“实在差劲！”

最后要谈到柳北岸。他任职于一家电影机构，是我的上司。那时我们的一位老同事，文坛前辈，也是《新报》主编黄科梅溘然长逝，中文部留下一个空缺。姚紫几次三番请我去夜宵，要我跟柳北岸疏通一下，如果要续聘人手，希望能对他作优先的考虑。其实他们两老是很熟络的，只是不好意思开口。我当时热情有加，城府很浅，看到姚紫在量马路，一心要帮助他，便向柳北岸直接反映。柳老也够老谋深算，他没有拒绝，先说会考虑。等我追了两三次后，他说已知会老板了，由老板决定。等到我追问了五、六次后，依然没有消息，我有点按捺不住了，要柳老说个真话。柳北岸也按捺不住了。他给我的答复其实是在指导我，要我以后应该怎样思考一些问题。他说他在国内就认识了姚紫，他很欣赏姚紫的文学才华，如果他进入我们的公司，肯定对公司会有很多贡献。只是因为他的脾气，他俩之间，宁可做朋友，不可做同事，因为做了同事，恐怕连朋友也没有得做了！

我明白了，谢了柳北岸，我又上了一课！

虽然姚紫的脾气，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使他功败垂成，是他的一大缺点，但他的才华是应该被肯定的。他对新华文坛的贡献也是不可否定的，尤其是他在风烛残年时还具有那股弘量与伟大的情操，去照亮别人，将毕生的积储贡献出来为繁华新华文坛而帮助数十人出版新书。据笔农说，“其实那一大批拿姚紫基金出版书的人当中，大半身家都比姚紫富有”。

我离开新华文坛已经35年，不大清楚近况，就不知当年骂姚紫是黄色作家的人，有没有来申请姚紫出版基金？

〔2005年5月28日和29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回有循常

不问苍生问鬼神



回到年幼时住过的家乡小镇，实际的情况并不像曾朗朗上口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经历了半个世纪，人面固然是不知何处去，但桃花却也不再笑春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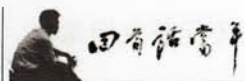
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崭新的店屋已鳞次栉比地建立起来，邻近地带也发展为工业区，一切呈现欣欣向荣，想起往年的落后与简陋，有着云泥之别。

日治时代与和平初期，这里民风纯朴，但却封建保守。由于百废待兴，教育与医药事业亟待振兴。科技思想的缺乏，迷信的习俗就很容易滋长蔓延，乩童卜卦，拜鬼求神的风气很盛。

这也难怪，当年人们有病，送院求医，在乡野甘榜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那时私人西医少得可怜，诊疗所更从未听过。有任何头烧耳热的病症，就向中药店抓一点药来吃。吃得有效，固然可喜，顽疾屡治不愈的话，就去求神，在这样的境域里很多人便“不问苍生问鬼神”了。

我们的家乡，就有一个鬼神的代言人。

她年纪应该有七、八十了，虽是三寸金莲，但走起路来还很矫健。她坐下来点上几支香，在观音娘娘面前念念有词一阵之后，便阴阳贯通，无所不知，对亡魂现在身居何处？病症要如何医治？她都能无师自通，娓娓道来。当年我们年纪小，对她的话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深信不疑，后来长大



了，才知道她是一派谎言，胡说八道。

这位老婶是我家的常客。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外婆，两位姨母都对她很尊敬。她除了求神问卦，行医济世，有些人家有家庭纠纷，也尊她是老长辈，请她摆平。

有一次，我的大姨与尾姨请她为外婆看一个运途，外婆与我也在场旁听。在香烟袅袅中，在阵阵的梵音里，她大概已经神游地府探清了虚实，于是叹一口气道：“唉！无希无望，此人气数将尽！”我们听后吓了一跳，问她有没有办法补补运？她说：“前路非常黝暗，看不到一点光，补运也没有用。”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往最坏的方面想，问她还能够跟我们相处几年？她说：“快则两年，慢则三年！”

两个姨母听后哭作一团，我也跟着泪下，外婆虽然没有出声，但脸色也沉了下来。

不管这老婶怎样胡扯，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往后我的外婆多活了二、三十年。所以我说她是一派谎言，胡说八道。

人之未死，说她将死，只要不迷信，是无所谓的。人之有病，假如根据她求神的方法来医治，而将人医死，那才是罪过。

我的表妹章素珍年幼时病了，家人就因为听信这老婶求神的医治法，险些儿把表妹命都送了。

素珍那时才三、四岁吧，发烧了几天，有点昏昏迷迷，吃了好几帖中药都没见效。于是请来老婶求神问分明。老婶坐乩之后说：屋的四周妖气迷漫，必须马上与外界隔离。

如何隔离呢？首先把窗户紧闭，让它密不通风。尝试之后无效。再问神。老婶再一轮坐乩，命令把床的蚊帐放下。如此这般，还是没有见效。最后连神都光火了，使出了它的绝招，要我们去买一堆甘文烟来，放在床下燃烧，用它的浓烟来薰，要把这股妖气驱散。

这么折腾了好几天，由于缺少新鲜空气，正常的人都会给憋死，更何况是一个有病的幼儿。看来悲剧就要上演了。这时的素珍表妹，只剩下一口游丝。根据老人家的意见，孩

子这么小，有什么三长两短，最好是移开，不要留在自己家中。

这一天，请了一个人，把她抱上车，送到坡底的天缘道堂去。我在楼上的窗口望着她，想到朝夕相处的小生命，就要这样离去，心里有化不开的一股愁哀！

但奇迹却跟着出现了。隔天之后，传来了好消息，说她已经清醒过来，也能够吃一点东西了。我们都分享了难以形容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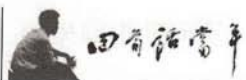
却原来这天缘道堂坐落在巴生河畔，那朝来寒雨晚来风，那阵阵清凉新鲜的空气，正是这垂危的小生命迫切需要的。一个星期后，她生龙活虎地回家了。可见神是救不了她，她反而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找到了生机！

素珍现在儿孙满堂，虽然已近花甲之年，但还是青春健壮，在商场与妇女界也是一位活跃的人物。如果当年一直沉迷于鬼神的邪说而没有及时将她移开，对我来说或许会失去一个表妹，对社会来说，恐怕会少了一个女强人。

家乡小镇有亲情的激荡，也有友情的温馨。每个人都有他的儿时玩伴。我可说比较幸运，因为有个诚恳的莫逆之交周明强陪伴，我在乡野间度过我的童年。明强老哥家境比较贫困，但温顺听话，很有礼貌，深得我外婆与大姨的疼爱，在我家中出入，我有的吃喝，他也有一份。他是个很感恩与怀旧的人，即使几十年之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商家，他也经常到我家作客，尤其是我大姨的家中有什么红白事，他一定抢先赶到，像是我们家中的成员一样。

现在都市的儿童，在父母的支配下，追求名校，正课之外，要补习这样，学习那样，电脑、钢琴、芭蕾舞、绘画，实在负担太重。记得小时候，明强和我放学之后的“必修科”是种花、养鱼、养鸟，到芭边的黑水河去游泳。这样的生活虽然是放纵了一点，但在大自然的活动中，身心却得到正常的发展。

我们在旷野里嬉游的日子，是个动荡的年代，那时实施



了紧急法令，保安部队的军车不时穿梭过我们的小镇到芭里去剿共。我们年纪小，不晓得怕。其实当时已经有马共的踪迹出现在离市场四、五英里外的蓄水池和一些农家。

有天傍晚，明强老哥和我带了一些抓鸟的用具到后面芭的山坡地带去抓咕咕鸟。这里有两三座山环抱着山谷。谷中，散布了几间农家，山脚下的几株树木，夜间常有咕咕鸟来栖息。我们抓鸟的方法很简单，先观察树枝与地上何处有鸟粪，如果有，那证明晚上有鸟来栖息过。于是爬上树去，在染有鸟粪的树枝涂上黏胶。要是咕咕鸟来了，脚踏到黏胶，翅膀一拍，整个身体就被黏住，这样可以把它活捉回来。

一切都布置好了，两人伏在山坡上的草丛中，等着不敢出声，怕会惊动鸟儿回巢。入夜之后，没有月，四下里漆黑一片。邻近的农家起初还有两三处昏黄脆弱的灯光，不久之后，也都全熄了。农家的生活就如此简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这万籁寂静中，只有星星，虫鸟的鸣声，还有疏疏落落的狗吠声伴随着我们。

老实说，我们不是抓鸟能手，缺少苦等的耐性。再说四周的草蚊多得很，我们守了两个钟头，便空手而回。

第二天，母亲放了一把大藤鞭在我的面前。在一阵严厉的逼供下，我坦承昨晚是到后面芭的农舍去抓鸟。结果是被痛打了一顿。等那口气稍为消了之后，她才说我们昨晚的作为是拿生命去开玩笑，很可能做无谓的牺牲！

只是想抓两只鸟，何牺牲之有！

却原来，她从邻家那些与政府人员有交往的地方领袖口中探悉，昨天傍晚，有几十个剿共部队的军警，从另一边的红毛园丘小径偷偷掩至，包围了整个农舍地区，机关枪按架在山头，目标对准这农舍。因为有秘密消息来报，马共人员将于当晚到农舍来提取粮食。

天呀！这么危险的地带，这么惊险的关头，我们脑海中的有限天地，又怎能知道四周的无限危机呢？

要是在一片漆黑中，树上传来鸟儿深陷圈套的声响，我们一时高兴，冲下山坡，山头上的保安部队看到人影晃动，以为马共人员已潜入，即刻向这边开火，我们岂不是陷入枪林弹雨的火网中？

时间已经相隔五、六十年，明强与我都垂垂老矣，有时偶尔相聚在一起提起这陈年往事，因为太惊险了，生命攸关，大家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

[2005年6月4日和5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征雁（右二）和章素珍（左一）等人于2005年旅游欧洲时合影。



2003年10月，征雁与家人飞往尼泊尔旅游。



2002年12月2日，征雁与家人前往福建探亲。

田有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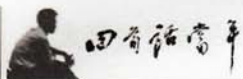
节令鼓擂进两大洲

廿四节令鼓并不是巴生福建会馆首创。它是新山几位音乐与文学界朋友陈徽宗与陈再藩及一批爱护中华文化的人士编写的曲调，研究新的击鼓法而推广起来的。它的特色在于以中国鼓敲击出马来西亚的旋律与色彩来。我喜欢它那气势磅礴、惊天动地而又慑人心魄的鼓声。有人说听到了鼓声使我们走进了历史，我却认为击起了金声鼓，让人感觉到自己文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我们会馆的鼓队是廿四节令鼓在本地流行了六、七年之后才成立。那时请来了节令鼓第一批训练班的成员云大雄当教练。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教得很投入又传神，能充分将师傅的意旨传授给学员。在三两年之间，我们的鼓队在中马区红透半边天，受聘到各大场面演出达二、三十次。

看到队员们生龙活虎，气势如虹，而且也表现突出，我在想要是有朝一日能够将鼓队带到别的国家去发扬这种技艺，将是一件赏心乐事。那时候我们的龙舟队从湖南汨罗江参赛后载誉归来，接着主办“龙舟航”为巴生滨海区华小筹款，现在又有了廿四节令鼓队四处去表演，的确为会馆争光。有一晚在把酒言欢时，队中一位负责人点醒我，其实我们的鼓队应该跟着龙舟走，因为世界各大城市都有龙舟赛，我们赛完龙舟再表演击鼓，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我想的确有道理。廿四节令鼓对外国人来说是全新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它的优点，自然不会主动邀请我们去表演，



只有参加龙舟赛，我们再毛遂自荐，反正他们不必多付费，有多一个节目演出，自然乐见其成。

主意打定后，我们重新整编，要龙舟队员全部加入鼓队，作双重训练，因为我们不可能率领一支龙舟与一支鼓队同时出国，那开销将是我们负不起的。大部分的队员都乐于接受，只有三两个龙舟手因为没有音乐细胞，只好退出。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鸥旅游社的刘建章老哥拿了一封北京国际龙舟赛的请柬来，要我们派队前去。

这位老报人跟我交情甚笃，我对他的办事能力绝对有信心。知道我们的附加条件是要有廿四节令鼓队也前去表演，于是他联络中国旅行社，向北京主办当局力争，结果批准了。换句话说这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支廿四节令鼓队开始要插进神州了。

高兴之余，头痛的问题接踵而来。那28个鼓从吉隆坡送往北京的航空运输费是1万6千令吉，比我们在广州买新的要贵上两三倍。找会长拿督林荔清寻对策，他也赞成拜托中国旅行社代我们在广州购买28只金声鼓，由铁路运往北京。总之为了要使马来西亚特色的鼓艺传播到北京，的确煞费心思，但刘建章他老哥在幕后，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半年之后，我们鼓队插入澳洲墨尔本时，情况就顺畅得多。我们的策划人洪加星，是马航高级职员，因曾参加过澳洲国际龙舟赛，跟主办的负责人很熟，他事先将我们在北京表演的录影带交给他们欣赏，结果那担任大会主席的华裔跟澳洲安捷航空公司的巨头看了很雀跃，一口就答应。而安捷航空公司还承担我们28个鼓的航运费，我们因此省下了1万8千令吉。

虽说我们已找到一条通过龙舟做红娘的门路，要将廿四节令鼓队带往世界的其他角落都没有多大的困难。但一支近30人的队伍远征外国，开销浩大，虽说万事俱备也需要先探东风。这两次的北京与墨尔本之旅，每次需要耗费7、8万令吉，或许有人以为会馆有大把资产，我们有得挥霍，所以在

短短半年的时间可将廿四节令鼓带到两大洲去作国际性表演。其实不然。会馆的董事咸认我们是在推动中华文化，为会馆争取荣光，所以这两次的出国参赛龙舟与表演击鼓，会馆都分别支付2万令吉资助，其余的不敷之数，只得靠我们自己去筹措。

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存有一笔龙舟与鼓队的基金。那时拿督李文敬为先慈追荐功果的全部礼金4万令吉捐作我们的活动经费，我们的龙舟队为利伟达饮料拍商业广告，收入1万1千令吉，会长夫人拿汀陈丽明举办个人画展，义卖画作捐助7千令吉，每个队员各捐助若干，才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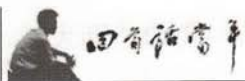
半年之后前赴澳洲，鼓队本身表演已筹集1万令吉，会长拿督林荔清、拿督李文敬、国会议员陈仪乔各捐助1万。董事林惠光、许天顺、林殿利、徐成来、刘迪、林秀文、陈嘉财、许丕全、陈燕庆、陈金龙、郑元璋及邱炳炎各赞助2千令吉。职员与队员也要负责一些，方得以成行。

来到北京的九龙湖旅游景点，我们从储藏室开箱取出金声鼓，将廿四个节令的名称贴上，队员将随身带来的鼓架安置好之后，还没穿上制服就衣冠不整地作了一次排练。

老实说，我们初到贵境，主办高层并没有很好的接待我们。大概他们认为中国之大，鼓类繁多，来自南洋的廿四节令鼓，又何奇之有？真的是不打不相识，我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打架，而是打鼓。当鼓声响起时，它的气势像天马行空，它的声量像惊涛拍岸，大大地震撼人心。连高层人物也深受感动，赶紧派人出来找我们几位负责人进去会面。

坐在高格调会客室里的雕花椅上，一边品茗，一边亲切地交谈。这高规格的礼遇，看在刘建章老哥的眼里，就催促两位随团记者多拍几张照片，以便回去之后，可以光宗耀祖。难得这高层领袖高兴，第二天出动了一艘豪华游艇，特备了丰富的自由餐，还带了他的夫人和助理上船来殷勤招待，跟我们一起游九龙湖，共进午餐。

他的一位助理跟我闲谈时说，中国的大场面庆典多数用



西洋乐队，现在听了广州金声鼓这样的打法，也十分雄壮动人，毕竟这种鼓还是属于东方的。夜晚的文娱晚会，北京著名的歌星与影星有多位莅场献艺。会长拿督林荔清和我都受邀上台致词。我除了强调廿四节令鼓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之外，也宣布既然主办当局对这种鼓的打法十分赞赏，我们决定把28个鼓留下来，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接受了之后，不要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而应该既来之，则打之、敲之、击之、让廿四节令鼓也能在北京散叶开花。

他们后来有没有去推动，我不知道。几年之后我们大马福联会一个两百多人的代表团出席泉州举行的“世界同乡恳亲大会”。那特大型的表演晚会在一个广场进行，舞台正中摆放许多金声鼓，表演的是泉州华侨大学的学生，打的正是廿四节令鼓。或许华堂有派人去推动，而一些留学生可能将鼓艺带过去，可见好的东西是迟早会引起共鸣的。

至于龙舟赛，我们那一批参与汨罗江赛会的老将，多因生活与调职的问题，先后解甲离去，新来的是一批刚毕业的中学生与大专生，在体质上不能匹敌。我们原以为北方人擅于骑马，不谙水性，可以跟他们周旋一番，岂知战鼓齐鸣后，我方人马完全招架不住。可以这么说，龙舟赛我们是失之东隅，但在击鼓方面却收诸桑榆，总算不虚此行。

半年之后我们将廿四节令鼓队移师到澳洲墨尔本表演，从主办当局的喜上眉梢，广大观众的欢欣鼓舞，到传媒的热烈反应，若与北京相比是不遑多让的。在文化艺术价值观与东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澳洲人眼里，廿四节令鼓的确是受到特殊的礼待。

我们原定于世界贸易中心、城市广场及国际龙舟赛场雅拉河畔表演3场，但鼓声擂响之后，得到老外的由衷赞赏，纷纷邀请到不同场合表演，一则由于盛情难却，二则志在推广，结果先后作了10场演出。

传媒对此鼓艺也很重视。第一场演出时，SBS电视台拉队到现场采访，过后ABC电台的华裔记者对会长和我分别作

了专访。而在10年前上网是件很新鲜与珍贵的事。主办当局特派两名网际网络通讯员，把廿四节令鼓的表演一一录下，送上网际网络。广州、香港与台湾三地的龙舟领队对廿四节令鼓也深感兴趣，有者用口头，有者以书信邀请我们到上述地点去打鼓划龙舟。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委员在现场对我们的总策划洪加星透露，奥运的开幕仪式节目如果是本土化，那就没话可说，要是决定多元化，他将邀请我们的鼓队前去献艺。

至于我们的龙舟队也下水去参赛，但乏善可陈。我们的龙舟教练兼队长林贵发却不认输，他对我埋怨道：“打了这么多场鼓，哪里还有力去划龙舟？”想来也不无道理。

往后的三几年，澳洲再有主办龙舟赛时，负责人对我们念念不忘，曾经来函并通过洪加星多方疏通，要我们派龙舟与廿四节令鼓队再去表演。老实说花这么大的一笔旅费再重访墨尔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志在推广，如果有机会再出国的话，我会把瞄头对准欧洲的大城市。

[2005年6月11日和12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巴生福建会馆二十四节令鼓队在北京表演。



巴生福建会馆龙舟队参与北京九龙游乐园民间龙舟节。



1996年3月，巴生福建会馆二十四节令鼓队在澳洲墨尔本表演时，获得特殊的礼待。

回首往昔

龙舟航为华小筹款

乐队的队员喜欢大场面的演奏，篮球国手怀念掌声不断的公开赛，而龙舟手也陶醉在众人围观下而奋勇前进。表现欲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尤其是龙舟队，长年累月在海上孤芳自赏地划来划去，没有给他们一些有凝聚力的刺激元素，他们会在意兴阑珊中，使队伍渐渐地瓦解掉！

如何让龙舟手抖擞精神，保持亢奋的状态，是我们这些负责人需要动一些脑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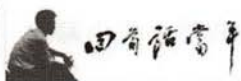
那时候有不少“行”的活动在为学校筹款，像“滨华行”、“共和行”，但它们是个别行动，每所学校要筹一次款就要“行”一次。我在想要是龙舟有一次大动作来为巴生的21所华小一并筹款，岂不干脆利落，或许效果会更显著。

因此就有了“龙舟行”，但龙舟其实是不会行的，结果以“龙舟航”命名。

巴生福建会馆向来支持独中，但也不敢忽视华小，因为华教的发展是“先有华小，后有独中”。如果华小先天不足或被扭曲发展，独中就很难乐观其成，而这项“龙舟航”的筹款方法很简单。我们印就了大量的捐款表格，分发给各校，它们盖上学校的印章后，再发给学生分头向家长与社会人士劝捐。所筹到的款项悉数归该校作活动基金，而“龙舟航”的所有开销则由我们会馆负责。

建议获得董事会通过后，要先部署下列几件事：

(1) 召开各校校长联席会议。当时钟润光校长已出任全国



校长职工会总会长，在联络与策划方面能帮了很多忙。

(2) 由于是海上的大型活动，必须得到海事局的批准与支持。我们会馆对该局的体育活动曾经有过捐献，加上有几位龙舟健将是电船公会的负责人，跟海事局的官员熟络，所以一拍即合，该局乐于给我们全面配合。

(3) 大队登陆时要有人接应。我们的目的地是浮罗吉胆，于是非找当地乡村治安发展委员会主席谢瑞锦局绅不可。谢先生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在他号召下，我们与有关社团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为了华教，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支持。往后进一步与谢村长商讨一些细节，我曾在叶宗明与卢汉青两位老哥的陪同下，坐着小型的快艇，不止一次地披星戴月穿梭于吉胆与巴生港口。

第一届的“龙舟航”恭请州行政议员拿督黄天福主持仪式，假海南村峇眼餐室启航。海事局出动了最大艘的巡逻船领航，左右两侧有几艘轻型巡逻艇护航。那时我们的廿四节令鼓队还没有成立，从巴生兴华独中请来8位节令鼓手，在一艘拖船的平台击鼓开道。我们号召的百多位划手，分乘5艘龙舟奋勇前进。由于多所学校的家教成员与教师要为我们助阵，一起前往吉胆，于是我们租了几艘大型的客轮，并情商一些朋友借出他们豪华游艇，把数百位宾客随着大队送往吉胆岛。

这浩荡的阵容，让我们深深有感，因为多一份支持，力量就是多一分热，将使华小发出多一道光芒！

龙舟队离开北港码头进入一条漫长狭窄的水道，由于两旁都是红树林可以稍微放缓，略作休息。一出水道，只见一片汪洋，吉胆岛已遥遥在望。于是节令鼓擂起，龙舟上的战鼓齐鸣，百余名划手使劲地往前划。五条港的渔船看到这些稀客到来，纷纷敲锣打鼓，围上前来，吉胆的渔舟也张灯结彩在半途迎接。这时海事局的大小巡逻艇、游艇、客轮与渔舟的警号声齐鸣，大队在彩旗飘扬中，气势磅礴地登上吉胆的渡头。

上岸之后，更是气象万千，我们带来的巴生滨华独中军乐队在乡委会右边的小广场开始演奏，节令鼓队也上岸助兴。我乘的游艇因为在另一个小渡头靠岸，赶到现场迟了一些。“龙舟航”总策划洪泰真一声号令下，几个划手合力将我高高抬起，高呼三声口号，使得我不仅受宠若惊，而且受之有愧。

洪泰真是营造气氛的高手，有他在场，可以把场面搞得沸沸扬扬。我们首次在梳邦湖举办龙舟赛，他招来了大批民政党的骁将，全情投入地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次的“龙舟航”他又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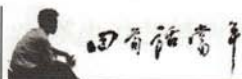
军乐队演奏完毕后，大队人马开始在军乐声中走向几条街道去游行。这浩瀚的阵势与鼓乐喧天的气氛把一个向来是寂静的渔村变成欢腾的世界。有些居民赞叹道：“这样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连苏丹的巡幸都没有这么热闹！”

最后大家聚集在乡委会所，由当地的华团设午餐招待我们。宾主双方的代表上台致词都盛赞“龙舟航”成功地带动华社，关注华小。这次我们初试啼声，为华小筹得15万令吉。

两年之后，举办第2届“龙舟航”，还是为巴生区的华小筹款，由于“巴生幼稚园”有附设小学课程而要求加入，因此这趟多了一所，为22所华小而划。而五条港的村长苏中南先生也要求大队顺道先访问五条港再到吉胆。

我们第一届没有在五条港停留，是因为划出狭窄的水道后，朝吉胆划去是一条直线，要到五条港就成为三角形的划程。既然五条港的父老高兴。我们也乐意多费一点气力。那一天大队登上五条港时，苏村长率领乡团领袖及大批渔民在渡头殷勤招待，敬奉茶点，恳切问候，此情此景，印象犹新。

第2届龙舟航的终点站也是浮罗吉胆。各界的参与和各方反应，盛况不减当年，为华小筹得25万令吉。换言之，先后两次的“龙舟航”已为巴生区华小筹得40万令吉。



再隔两年之后，第3届“龙舟航”订在1992年10月3日举行。这次我们改了航道，由瓜雪的巴西不南邦启航，经过28海里的航程，划回港口滨海区，为56所华小效劳。

这显然是一场大阵仗。由于涵盖面很广，规模也大，负责人在精神紧绷下，必须加倍工作。海事局事先发出了通令，要所有外国及本地货轮在“龙舟航”的指定时间内远离航道，以免发生意外。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钟润光校长的联络与陪同下，到滨海区各县去与华小校长举行联席会议。这巴生滨海区的56所华小包括巴生县21所，雪邦县6所，瓜冷县7所，瓜雪县12所，沙白县10所，学生总人数为3万6千多人，教师共1千4百90位。

另一项重点工作是5艘龙舟必须先运往巴西不南邦海港。所幸负责海上事务的副主席团成员全部动员，他们包括王文章、蓝来星、蓝来旺、吕清便、李诚益、蔡文勇、吕俊生。这批在海上谋生的朋友熟悉水性，承担驳运与护航工作经验丰富。他们用一艘驳船将5艘龙舟在启航的前夕拖到巴西不南邦的渡头，而且还留下来过夜守护着龙舟。我有感于他们的热忱奉献，漏夜赶到渡头与他们夜宵并把酒话航程。

第3届龙舟航的开航仪式于下午2时假启智学校举行，在张喜才校长的张罗下，一切顺利进行。陈祖排部长致开航词后，狮队、乐队、高跷队领先开路，大批人马从学校向渡头迈进。可是天不作美，半途遇上倾盆大雨，但大队还是冒雨前进。海事局的大小巡逻船依然莅场护航，我们沿着瓜雪海岸划出大海，朝巴生港口划去，抵达海南村时已是入夜时分了。

这趟的“龙舟航”筹得40万令吉。换言之，我们在6年来的3次龙舟航共为华小筹得80万令吉。

在会馆成立龙舟队的将近8年中，我因职责所在，于每个礼拜天的傍晚训练时间，都要在海南村的镇南宫等他们划出八号码头再回程，从开始到收队通常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我只好镇在镇南宫的凉亭等待！后来幸好有位老朋友能够

陪伴着我，他就是开肉骨茶店兼做地产经纪的李进兴老哥。我摇个电话给他，他就驾那辆旧款马赛地载我到海南村去，等到收队才一起回家。如此多年如一日地陪我度过寂寞的时光。他无怨无悔，连半分钱的车马费津贴也不拿。

我于心不忍，总觉得欠他很多。“龙舟航”与廿四节令鼓队前往北京参赛与表演时，我邀他同往，他因母亲病危不能同行。半年后的澳洲之旅，正是我们鼓队在国际赢取声誉的时候，幸好他能跟上。而他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在墨尔本市政厅前，坐上了市长的马车宝座，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而我们多年来都在海南村的镇南宫训练划手与进行活动，该宫理事给予我们的方便，我们也是深以为感的。

第3届“龙舟航”在筹备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滨海的某市镇，有个家长因反对他的子女拿着捐款表格到市面上劝捐，而进入学校向校长动粗。这事件令我们主办负责人与受害的校长感同身受，有着同样的悲哀。尊师重道是很重要的，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校中的师长都是不受尊重的一群，那么家长把子女送进学校又何望之有？

我在想，我们这样辛苦地策动“龙舟航”为华小筹款，我们的回馈是什么？是不是像俗语所说的“有功无赏，打破要赔！”。我个人因此兴致索然，而“龙舟航”也从此偃旗息鼓，声沉影寂了！

[2005年6月18日和19日刊于《光明日报》中马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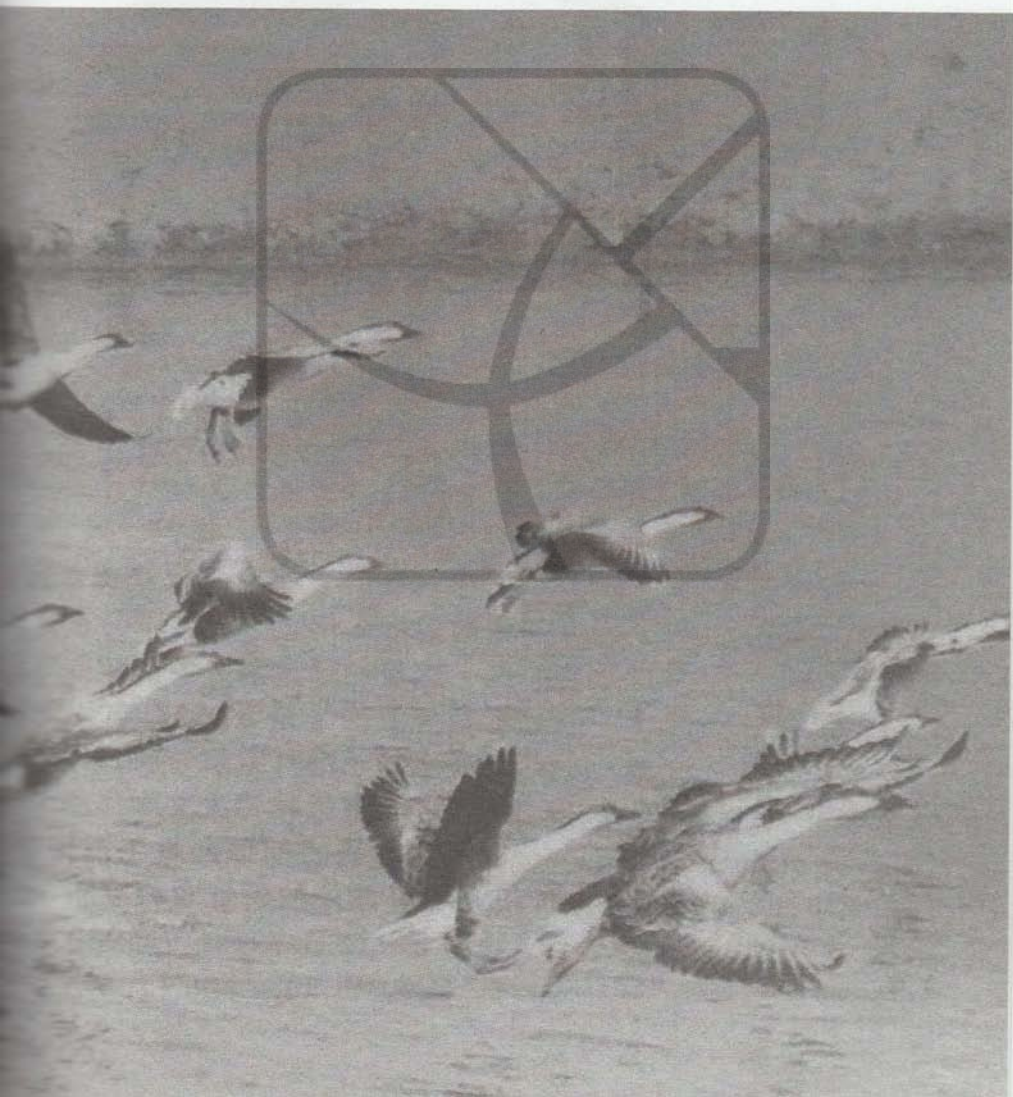
“龙舟航”工作人员抵达吉胆岛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征雁（左边站立者）在第2届“龙舟航”接待会上跟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钟润光校长（右边站立者）寒暄。

雁过留声

征迁·雁过留声



青島城圖





雁征途·雁过留声

——征雁的生平

· 巴依

征雁是陈达人惯用的笔名，而陈征雁则是他从事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名字，这使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原名，以为陈征雁就是他的本名。他罕用其他笔名，晚年只用千山度和万古愁来写专栏，不过这些专栏文章收入集子时，仍然以征雁的笔名出版。

他在1937年10月21日生于巴生一个教育界的家庭，父亲陈德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高师，曾任校长20多年，母亲郑文娟也是教师。

1950年，他毕业于巴生中路6英里中华国民小学。

1951年升上中华中学，由于校长被杀，情况不稳定，读了3个月之后，第2个学期转到华侨中学（即现在的滨华中学）。由于他“年少性叛逆，常于作文中批评师长与校方，终遭乃师题训于初中毕业之成绩表曰：‘目无尊长，出言不逊’！复断其品行‘丁’等而绝其后路！”（见李少良为《在高天外看春秋》而写的序〈万里长空话征雁〉）

可是，在1954年，他仍然能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槟城钟灵中学高中预备班。

1956年，念高二时，由于反对华校改制，参加学生抗议行动的学潮，受到当局开除学籍。

隔年南下新加坡，到育英中学继续接受高中教育，1958年如期毕业。

1959年，在后港巴特里英文中学攻读大学先修班一年

级。

1960年，在莱佛士书院攻读大学先修班二年级。

这时，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征求电影故事，他所写的《甘榜风云》获奖。

1961年，受聘于诗人柳北岸主持的邵氏机构中文部，负责电影试片、审核香港行将开拍的华语片剧本和宣传工作。

1963年与同仁参加泛新职工会发起的电影业大罢工，气势沸腾，延及新马二地戏院全面瘫痪。（见〈万里长空话征雁〉）

1963年5月，他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毫不惋惜地把一份一般人所求之不得的工作辞掉了，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较有分量的人，也为了适应这日益复杂的现实环境的需求，他决定再上征途，再充实自己。（见《穷途》再版序〈三版小语〉）

1963年6月16日，参加哥伦比亚计划在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电视编导训练班。

1964年返回新加坡，几个月以后，出任文化部《电视与广播》主编。

1967年，他到新加坡《新明日报》兼职，负责编辑马来西亚新闻和娱乐版。

1968年，他跟友人合创亚洲演出中心，网罗当地及外来的艺人，拍摄歌舞和贺年等等节目，提供给新加坡电视台。

1969年5月3日，他回到巴生定居，在吉隆坡泛马出版有限公司担任教科书编辑和课本营业代表，直到1973年底。

1973年开始，他投入政坛，历任马华巴生武吉拉惹支会主席、马青武吉拉惹支团团长、雪州马青分团团长和秘书长、雪州马华联络委员会秘书处委员和组织秘书、行政局委员、雪州马华月报主编、雪州马华副主席、马青全国中央干训班负责小组委员、马青总团中央委员、马华文化协会理事、马华中央文化局主席、马华中央委员以及马华公会总会李三春顾问团成员。

1974年1月1日，元首委任他为全国教育服务委员会委员时，辞去马化控股有限公司初创时期受委的董事职位。他担任这个官方职位长达10年，直到1983年12月31日为止。

1974年至1975年，他出任社会福利部彩票局委员。

大约于1979年，他和云里风等人筹办马来西亚文艺协会。他被选为筹委会副主席，不过这个协会后来未能获准注册。

1983年，他从政坛引退。

翌年6月6日，元首华诞，受封JSM勋衔。

他后来转入社团为华社服务，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他先后担任过马来西亚永春鸿榜陈氏公会主席、雪兰莪永春公所副主席、巴生福建会馆署理会长、教育主任、青年团顾问、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署理会长、第8届全国马华文学节工委委员主席、华总文化委员会义务秘书等等职位。通过这些团体，他推展了各项华人文化和教育活动，其中包括为巴生福建会馆及星洲日报联办的散文创作比赛主编公开组优胜作品集《东海岸的回忆》和学生组优胜作品集《台北机场在望》。

“80年代在巴生发起中秋提灯游行运动。……90年代初，把源自大马的廿四节令鼓擂进神州大地，半年后更安排鼓队远赴墨尔本盛大演出。这之前曾率领大马龙舟队开入汨罗江参加第一届国际龙舟赛。”（见〈万里长空话征雁〉）。

他也为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策划编印出版《大马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2006年6月刊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刊《马华文学》〕



文学道路上的足迹

——征雁的著作

· 黄梅雨

征雁自幼热爱文学，念初中时已手不离卷，阅读了不少的文学著作，同时提起笔杆学习写作，投稿给新加坡出版的综合性半月刊《南洋青年》（丘絮絮主编）。1954年，他前往槟城钟灵中学高中预备班升学时，他的文艺作品开始在该校出版的学生刊物《学报》等等报刊发表。南洋商报的《文风》在这一年创刊，他从此一直在这个当时最受欢迎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甚受编者杏影和一般读者的喜爱。

他最初从事小说的创作，过后编写不少脍炙人口的剧本，在主编《电视与广播》时期发表了一些新诗。他也写散文和评论，以考验与推广自己的创作能力和路线。他在晚年应邀撰写专栏，表现出他在杂文方面的底子不浅的功力。由此可见，它对各种文学体裁的掌握，应付自如。

他于1969年从新加坡返回巴生定居之后，就跟文学创作绝缘，几乎脱离了马华文坛。在这三十多年内，除了1987年编写独幕剧《钟馗夜访》之外，似乎没有拿出其它杰作示人。他是在大约2004年重新拿起笔杆，一挥就不停，洋洋洒洒，在两年之内，发表了十多万字，还能编成《在高天外看春秋》，出版成书，可是想不到的，这是一部向马华文坛告别的著作！难怪有人说，这似乎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他于2005年12月11日晚上，趁50年代钟中学潮同学在槟城聚会期间，为他再版的《升旗山下》和《在高天外看春

秋》举行推介礼，而《升旗山下》是以50年代学潮作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他的槟城之行似乎为他那拥有满足感和自豪感的一生划上完整的句点，因为“东方花园”是他人生其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征雁在新加坡，从1961年开始，在8年之内出版了6部著作：

(1)《穷途》，短篇小说集，1961年8月由文工书店出版，后来重新印刷3次。这部集子面世之前，原名《梦里湖山》，列入“泥土文艺丛书”，打算在1960年3月间由马来亚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因故未出。这部小说集选收6篇作品：〈方唐〉描绘一个青年如何被丑恶的现实所驱使而走上歧途；〈黄校长〉是在轻松的笔调下，刻划了一个教育界败类的咀脸；〈李山的家〉反映了资本社会里的一个家庭所发生的悲剧；〈梦里湖山〉揭穿了香港电影界一些所谓编剧家的卑鄙行径；〈下乡第一课〉暴露了一个目空一切，自视甚高的高中毕业生在社会上所遭受的考验；〈怀想〉描述一位印度籍教师在一所中学任教时的遭遇，同时刻划级长对他的同情和关怀。

(2)《封锁线》，戏剧集，1961年12月由青年书局出版，内收5篇独幕剧。

(3)《夜渡》，戏剧集，1962年1月由文工书店出版，内收3篇独幕剧。

(4)《后方的诗篇》，散文集，1963年10月由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列为笔农编的“海鸥文艺丛书”之一，内收11篇散文和评论：〈情感的巨债——悼念外祖母〉、〈寂寞的高原〉、〈骊歌初唱〉、〈误解〉、〈长堤的夜话〉、〈夜里开动的火车〉、〈在船上〉、〈几个口语的浅例〉、〈一个乡村的婚礼〉、〈高尚与卑下——《悲惨世界》人物浅介〉、〈后方的诗篇——读屠格涅夫的《前夜》〉、〈后记〉。这些作品大部分以上是在1957年和1958年写的，而〈情感的巨债〉则是在作者外祖母于1963年逝世之后所写的

纪念文字。

(5)《征雁剧作集》，戏剧集，1965年7月由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此书是《封锁线》和《夜渡》的合集，另外增加一篇新作。

(6)《升旗山下》，中篇小说，1968年4月由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在出版之前，曾在他主编的《电视与广播》连载。

他在马来西亚，从2004年开始，在2年之内出版了2部著作：

(1)《升旗山下》，中篇小说，2004年4月由吉隆坡泛马出版有限公司再版。再版后的《升旗山下》，内容和文字都经过一番修订，因而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因此陈雪风就有这样的观感：“征雁将这样的一则爱情故事与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交织着来书写。他们的抱负与构思皆是十分可取。因此特殊的历史背景，加重了小说的社会思想性，让小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框框。”（见〈我推荐《升旗山下》〉，2006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初版的〈升旗山下〉侧重男女主角之间爱情故事的描写。由于当时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作者有所顾忌，不能对学潮的背景和事件深一层的刻划，导致时代感薄弱得多。他在修订后的《升旗山下》在《光明日报》北马版连载之前，接受特派记者的专访时透露：“在60年代写作，还有很多客观环境的限制，不能畅所欲言。……过去是敏感的课题，现在已经不敏感了。在这开放的情况下，我加强这篇小说时代背景的描绘，把当年学潮的事件融会在故事进程中，希望它比较具有现实意义。”

(2)《在高天外看春秋》，别集，2005年7月由巴生首运促进有限公司出版，内收散文、戏剧、相声和专栏文章。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散文”一辑时，他说：“由于近年来担任华总文化委员会义务秘书之职，经常为一些前来作专题演讲的中国和台湾名作家与名学者作些宣传，时而担任

讲座会的主持人，也必须准备一些话稿，所以就动笔写了一些。有时出国旅游，在莽莽神州的长天大地上感受良多，于是留下了一点墨迹，但不擅长写景，多侧重写情。写大漠西北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写余秋雨的〈在高天外看春秋〉，写龙应台的〈谁解秋风话凄凉〉，写诗仙李白的〈且乐生前一杯酒〉，写政治人物的〈这一刻，终于到来〉，都曾经刊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上。至于〈轻描二月河〉、〈淡写王鲁湘〉、〈浅介高希均〉都是讲座会主持人的话稿。另一篇抒情文〈碧海绿湖丁加奴〉都未曾刊登过。而怀念我的文学导师杏影先生的〈寂寞来时路途远〉是应刘笔农先生之约，登在他主编的《新加坡文艺报》上。收集在此的散文，我写的时候比较用心，遣文造句，自己也比较满意。”提到“戏剧·相声”一辑时，他又说：“而戏剧作品在〈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两篇相声〈谈音乐，说文学〉，〈IQ与拼音〉则是因为去年我被选为第8届马华文学节工委主席，为了让开幕仪式比较富有文艺气息，便赶写两三个剧作在开幕晚会上公演。”至于“短评”一辑的34篇杂文，是作者受邀在《光明日报》北马版而写的专栏文字。这些以“万古愁”为笔名而写的专栏《醉话连篇》都是针砭时事或有感而发的短文。

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回首话当年》，曾经先后在《光明日报》北马版和中马版连载。有人建议他继续写下去，使内容更加丰富，然后出版成书。他表示他考虑这么做，岂料他遽然撒手人寰，这个计划也随他而去。不过，据说他的家人有意把已经发表的《回首话当年》出版成书，以玉成他未遂的心愿。这部遗著将附录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报刊所推出的纪念特辑以及两国文友所写的悼念文章。

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也选入合集、大系和丛刊：

(1) 1956年10月，〈李山的家〉收入文丁主编的小说合集《桥下》（槟城康华出版社）。

(2) 1957年6月，〈布先小住〉收入丛刊《荷塘上》

(吉隆坡文化供应社)。

(3) 1967年7月, 短篇小说〈黄校长〉收入丛刊《黄校长》(吉隆坡文化供应社)。

(4) 1959年1月, 短篇小说〈下乡第一课〉收入丛刊《我底祖国》(马来亚理想文化社)。

(5) 1960年1月, 短篇小说〈怀想〉收入丛刊《新加坡颂》(马来亚青年出版社)。

(6) 1960年5月, 〈沉默君〉收入小说合集〈怀念〉(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这篇于1958年4月20日写于中马的作品, 主旨在于讽刺一些青年在思想上的动摇和言行的不一。

(7) 1973年3月31日, 〈黄校长〉收入孟毅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刊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刊《马华文学》]



2005年12月11日, 征雁的中篇小说《升旗山下》和别集《在高天外看春秋》在檳城举行推介礼。征雁长女矜矜和征雁同学郑彼得言谈甚欢。

征雁著

一部以为横城大的
学潮为中背景的
爱情中篇

升旗山

ISBN 1000110-2

RM 12.50

情深又重，端意
无穷

欢迎询问

集五十年创作
经验的十余部
精悍散文及集
成近散短评

行云流水 气势磅礴

RM 15.00

征雁长女玲玲在征雁著作推介礼上留影。

雁把生活搬上舞台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a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font. Above the characters '雁' and '把' are smaller characters '雁' and '把' respectively, and above '生活' are '雁' and '把'.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stylized, dark ink wash illustration of a crane in flight, with its wings spread wide, positioned behind the main title text.

——征雁的戏剧

· 李锦宗

征雁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方面有过特出的表现，然而他是以戏剧作品在马新文坛上奠下重要和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写了数量多、质量好、适合搬上舞台的独幕剧，在戏剧创作一向贫乏的剧坛上显得鹤立鸡群，这使他在马新戏剧运动史上占了灿烂的一页。这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新戏剧界作出辉煌贡献的成果。

他自幼喜爱文学，念初中时已对戏剧拥有浓厚的兴趣。他前往槟城钟灵中学升学后，在校内发起创立戏剧研究会，表现出他对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热衷。

他不但编写脍炙人口的戏剧，同时成为一些剧作的导演，甚至粉墨登场。60年代中，在新加坡时，他在《清宫怨》中扮演光绪，在《金小玉》中扮演王司令，在《父母心》中扮演父亲。大约于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巴生福建会馆的舞台上饰演《钟馗夜访》的主角。除此之外，他积极使戏剧普遍化，一直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60年代中，在新加坡时，他加入艺联剧团，担任副团长兼编导主任，热心开展戏剧的活动。在他出任雪州马青分团团长期期间，他曾把白寒的《头家哲学》搬上舞台，为马华总部大厦筹到17万元的建筑基金，一举两得。在他担任巴生福建会馆教育主任期间，在排演他自己编写的《钟馗夜访》时，也公演郭沫若的《汨罗江畔》。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戏剧工作者。

他那些获得广泛欢迎的独幕剧都是在槟城、巴生和新加

坡写的，其中在巴生写得最多，因为他在家乡居住的日子比较长久，直到他与世长辞为止。

收在他几部单行本中的剧作，最早的一篇是在1956年写于槟城的独幕剧《父与子》，而他最后一篇戏剧作品是在2004年为第8届马华文学节开幕文娱晚会而写的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屈指一算，他跟戏剧创作结缘大约50年，占了他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始终不舍不弃这一方面的兴趣，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生前一直在发挥这项才能，致力于为文坛和华社推动这种甚少人参与的文艺活动。

征雁在戏剧创作上的特色是专写独幕剧，可谓独沽一味，几乎没有看过他写多幕剧，这可能是他擅长以这一种体裁来呈现他心目中的观点。

他主要的剧作都收集在他已出版的3部戏剧集内：

(1)《封锁线》，1961年12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选收5篇独幕剧：〈父与子〉描写中学校长余有福为了私利，强迫儿子余学明跟王董事长的千金王云娜结婚，受到余学明激烈反对，结果余学明和女朋友李小萍逃避到乡村小学去执教，而余有福由于在学校辞退李小萍的父亲职位和3名有正义感的学生，引起一场罢课；他又跟董事长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导致感情破裂，终于弄得自己走投无路。〈新的课程〉描写护士王莉青常常虐待病人和前妻的女儿，引起公众人士的打抱不平，向医院和福利部投诉。他家门前发生一起汽车撞伤小孩的车祸，他一点也不理会，后来才发觉那小孩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已后悔莫及。〈别后〉曾于1960年2月刊于新加坡荒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丛刊《故乡》；在1965年9月2日至4日推出的“本地剧作欣赏会”上，这出独幕剧由新加坡电影戏剧研究社公演，田流导演；新加坡戏剧家王秋田负责的剧团也曾在维多利亚剧院把这出戏剧搬上舞台；〈别后〉曾被改编为电视剧，由作者亲自导演，属于新加坡最早期的电视剧之一。这篇剧作描写护士王叶绿别后重见爱人李为和，但他变了，强求她辞掉他认为不好的工作，并到他父亲的公司

去当秘书，但她不同意。她反而劝他到乡村学校为下一代服务，受到他的拒绝，结果两人闹得不欢而散。〈封锁线〉描写一批失业的高中毕业生的苦闷，在生活线上的彷徨不定，但是他们有判断能力，意志坚定，最后突破封锁线，克服了生活上所面对的难题。〈楼上人家〉曾于1961年由齿科研究会在会所演出，也曾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这篇戏剧暴露小报编辑孙文宾和助手罗星春的胡作非为，同时歌颂石可攻和失业高中毕业生丁尚初的正义感和见义勇为。

(2) 《夜渡》，1962年1月由新加坡文工书店出版，选收他另外3篇独幕剧：〈雨夜〉、〈潮来的时候〉、〈夜渡〉。其中的〈潮来的时候〉曾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剧本创作比赛优秀奖，也曾于1961年8月24日，配合新加坡文化节，由南大戏剧会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1961年10月11日，这篇剧作刊于南大戏剧会出版的双月刊《戏剧研究》创刊号。

(3) 《征雁剧作集》，1965年7月由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列为笔农编的“马华新文艺创作选刊”之一。这部戏剧集其实是《封锁线》和《夜渡》的合集，另外增加一篇独幕剧〈青年作家〉，总共选收9篇作品。新加坡剧评家米然为这部剧作集写序时，认为“本集所收的几个独幕剧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很少为效果而追求效果，而是让生活本身在舞台上发言，抹着明朗的生活色彩...。征雁在处理这几个独幕剧时，总希望能提出很多生活现实，于是带出了很多人物，例如〈潮来的时候〉、〈夜渡〉和〈楼上人家〉便是如此，要在那么短的独幕剧里，让那么多的人物登场，叙述那么多个故事，是很不容易动人心坎的，因为读者（或观众）还没有对各个人物的性格深入了解时，幕就下了，于是人物形象所要引导出来的主导思想不免随之淡薄了。”

他的别集《在高天外看春秋》选收了他一篇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

他的剧作曾被选入新马和北京出版的3种大系：

(1) 1973年12月，他的〈雨夜〉、〈潮来的时候〉、〈夜渡〉由赵戎、苗秀、钟祺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赵戎在〈导论〉中说：“他的作品，有着一种年青的活泼的朝气，使人兴奋、感动、鼓舞。尤其是〈雨夜〉一剧，被演出的次数之多，可谓绝无仅有。这不是偶然幸致的，而是作品本身的内容、技巧、情节、效果，都有很高的成就。”

(2) 2001年10月，〈夜渡〉由方修选入《战后新马文学大系——戏剧集》（北京华艺出版社）。

(3) 2004年，独幕讽刺闹剧〈钟馗夜访〉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戏剧》（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出版）。主编柯金德在〈导言〉指出：“剧本以80年代的社会为背景。当时经济不景，赌风炽盛，罪案猖獗。钟馗大王遂率领诸大将大臣到人间执行‘捉鬼’任务。作者巧妙地把他所熟悉的周遭事物写入戏里，即兴式的俚言俗语顺手拈来，淘气的幽默，冷冷的调侃，读之令人忍俊不禁。”1988年1月23日，这篇剧作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刊出时，陈雪风在简介文字中写道：“而这里刊登的〈钟馗夜访〉，就是他搁笔廿年后，东山再起的呈献。这篇独幕讽刺闹剧，语言清丽，亦庄亦谐，洋溢生活的气息。故事的情节是来自现实生活，但表现的构想与手法却很奇特而虚幻。因此，它的人物既是鬼，也是人；是人，也是鬼；人人鬼鬼，虚实的观念，两相交织，趣味横生。剧中人物的际遇与冲突，真真假假，铺排叙述出来，闹中有强烈的讽刺，也有真诚的颂扬。因此，它虽然标明是讽刺闹剧，但它的讽刺之外，有义正词严；胡闹之中，深具苦口婆心。”

他的政治剧〈十国裁军大辩论〉，模仿联合国安理会的形式，全场辩论对白。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由南大政治学会在大学周中演出，名噪一时，过后这篇剧作在谢明的《青年报》刊出。

他曾写独幕剧〈万世流芳〉，可惜原稿失落，跟〈十国

裁军大辩论》一样，没有收集在他的戏剧集中。

1958年12月，在他主编的《新加坡育英中学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特刊》（第一届毕业班出版）刊登的独幕剧《女房东》，不知何故，也没有选收在他的戏剧集中。

由此可见，他所创作的戏剧并不是全部都收集在他的戏剧集里。这证明他所写的剧作的数量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

在征雁的戏剧作品中，《雨夜》被搬上舞台的次数最多，由此可见，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1957年，新加坡康乐音乐研究会演出；1960年，后港乡村住民联合会演出；同年11月5日至6日，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先后在文化馆和维多利亚剧院演出；1961年，这出戏剧于新加坡效忠周期间在4个地区巡回演出；同年，理电发工友联合会也演出；1966年12月28日，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演出，高慧碧和黄廷辉导演；雪兰莪州大港以及其他社团和组织也先后排演，总共多达十余次。

《雨夜》描写一个发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悲剧。父亲王山叔患病不能工作，母亲替人洗衣，女儿秀兰半工半读。长子大海因当工人代表被雇主开除，非法经营胶丝买卖。次子大智正在念书，课余踏三轮车，以帮补家用。大家正为秀兰没钱缴交学费发愁时，忘恩负义的屋主又来催租，大海被橡胶商告发而被捕，大智则被流氓打伤，重重的打击逼使王山叔在雨夜疯狂地冲出家门，要找他们算帐去。

除了《雨夜》之外，《潮来的时候》、《别后》和《楼上人家》等剧经常由新、马的学生团体和社团排演，反应令人鼓舞。其他的剧作例如《父与子》、《新的课程》和《封锁线》等等也曾在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各地演出。

好像《雨夜》等剧一样，征雁的剧作大致上犹如镜子一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也可以说是利用艺术的技巧把生活搬上舞台。剧中所刻划的大多是平凡和普通的人生百态，由于处理得合情合理，在毫不过度夸张的情况下，以

简洁明快的手法安排剧情，故事的发展动人心弦，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达到戏剧应有的效果。新加坡已故评论家赵心曾在《征雁论》（刊于《电视与广播》）指出：“出身于马华社会的青年作家征雁，他的创作题材，完全采自马华社会底各个角落的生活风貌，或深或浅地反映出马华社会底真实。他是一个道地的马来亚气质的青年，写出了具有马来亚气派与马来亚作风底剧本。那末，当地各剧团之所以排演他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了。尤其是〈雨夜〉一剧，先后被上演十多次，他与李星可，称得上是马华戏剧界的双璧。……大体上，他的每个剧本主题与观点都是正确的。同时，它所处理的人物底言行思想，完全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相符。所以，使人读了有真切共鸣之感。剧作家征雁没有被生活环境所桎梏，他的创作视野相当广阔的，……多篇都反映了星马两地的某些不同的角落的生活状态，……剧中人物几乎包罗社会各阶层，……而写得最出色的是劳工方面，其次是中学生的刻划也很形象，……征雁创作手法最突出的地方是深入浅出，他能很紧凑地明显地把主题表露出来，所以，他的剧本都具备了简洁明快的优点，在剧作界是少有的。”

他的编剧技巧继承传统，可说是跟马华剧运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并不保守。他不迷信各家各派的戏剧理论，不过，他曾经受到中国戏剧家熊佛西的影响。他顺应着时代，利用他自己认为正确和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剧中的表达手法，以传达他作品中的信息，因此看不出他要以标新立异的姿态来虚张声势，以达到戏剧性的目的。

〔2006年6月刊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刊《马华文学》。初稿《犹如镜子反映现实——征雁的戏剧》在2006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悼念征雁特辑“剧终人散·雁去留影”〕



征雁（后排右四）在《金小玉》中饰演王司令的角色。



征雁（右）在《父母心》中饰演父亲。



80年代，征雁（右一）在巴生马华武吉拉惹支会举行的一个集会上与党员合唱。



征雁（中）和卫生部长政治秘书林廷甲（右）在马华公会的一个集会上聆听李三春秘书雷大庆演讲。



雁遇留聲 雁过长空

——致征雁

· 王兴文

您走了，像行者那样，带着大家的关怀，留下您的祝福，告别这个尘世。

您曾经雄心满怀，投身政坛，要为族群谋取权益。但您却屡遭排挤、阻难，是您的满腔抱负和不世的才华，无法施展。

因为您不愿让自己高洁的灵魂，被金钱染污。

因为您不愿让自己刚直的本性，被权势扭曲。

在中学时代，您和热爱民族教育的同学一道，挺身而出，捍卫华教，抗拒母校改制，体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您敏锐地察觉到传统节庆文化出现消亡的危机，便积极通过巴生福建会馆展开挽救行动。终将危机变成转机，不仅让传统节庆文化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更且为它灌注了新的生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您以旷达的胸怀面对人生：身处逆境，您表现了“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精神。您的物质生活绝称不上富裕，但您以自己的心血与才华，给社会留下丰富的文化艺术资产。每当聊起往事，您总会让朋友们分享到坚持社会公义所带来的荣耀和喜悦，让人深刻体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做人道理。

今天，巴生已被视为一座文化城。当我们蓦然回首，眼前总会浮现您那嶙峋的身影，继续走在民族文化的路上。呵，我们发现，您留下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世间万物，缘起缘灭，成住坏空，当无碍于您那久经磨练锻铸的风骨，长留后人的心中。

（注：这篇告别词于2006年1月10日上午在巴生举行的出殡仪式上，由新闻及翻译工作者林玉蓉宣读。）

〔2006年6月刊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刊《马华文学》〕



新闻及翻译工作者林玉蓉（左二）在征雁出殡仪式上宣读王兴文（右二）执笔的告别词《雁过长空》。征雁老友周明强（左一）在旁陪读。



雁 敬悼陈征雁先生

· 马汉

1月7日（星期六）的大清早，我一打开当天的《南洋商报》，就看到一则令我震惊的新闻——新闻中说：马华文坛著名的剧作家兼小说家陈征雁先生因病逝世了，新闻的一边，刊登了征雁兄的遗照。

当时，我的脑子里立刻充满了疑问：“怎么会呢？在这之前，也不曾听到他患病的讯息呀！”由于我赶着到补习中心去上作文课，新闻也不及详读，更不必说去向朋友求证了。不过脑海里一直在盘旋着“人生多变更”、“人生有许多无奈”这一类的感叹，自然也夹杂着在悲叹着年纪大了，免不了要过这个“大关”……

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我总是特别忙碌，因为我得上好几节作文课，每2个钟头一班，从早晨9时正，直落到下午6时为止。

不过，当脑子里一有空隙的当儿，就会思念起与征雁兄交往的一段文字因缘来，也想起不久之前，陈雪风兄才告诉我：征雁在《升旗山下》修订版出版之后便告诉他要举行一个推介礼。他也替《升旗山下》写了一篇书评，征雁已把该文附印在书后，还邀他在推介礼上为他担任“解读”。雪风是在去年11月7日至11日这几天里，当我和他结伴到广州去游览期间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还对雪风说：“届时只要不是拜六及礼拜，我必定会出席的。”这件事记忆犹新，可是，这个“推介礼”可能永远不举办了，因为征雁已经逝世

了……

征雁兄比我年长2岁，可是，他却出名得很早。大约在50年代中期，征雁的短篇小说及剧作便不断出现在报刊之上，其中多数刊登在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副刊。（后来我才从征雁口中获知：他是当年被杏影先生看中并加以提携的青年作者之一。）

当年——1954至1956年，我才是个初中生，刚在文艺园圃上起步，课余之暇不但读30年代中国作家鲁迅、巴金、冰心和老舍的名著，也读本地的文艺期刊和副刊。《文风》是我每一期都读的文艺副刊，还有《新报》的《新园》（黄科梅主编），至于文艺期刊如：《沙漠风》、《耕耘》、《荒地》、《人闻》等刊物，都是每期必读的。而征雁的作品，大约都可以在这些刊物上读到，因此对他十分钦佩。

从1961年开始，在短短的4、5年间，征雁的文艺创作集便一本接一本地面世了，依次应该是《穷途》（小说集，1961）、《夜渡》（剧作集，1961）、《封锁线》（剧作集，1962）、《后方的诗篇》（散文集，1964）、《征雁剧作集》（剧作集，1965）与《升旗山下》（中篇小说，1968）。这个记录在当时是青年作者之中，是属于“高记录”的，而且他的著作出版之后，都大大地受到读者的喜爱，一版再版，其中《穷途》曾创下一连5度再版的记录。在这段时期，我虽然也有4、5本劣作面世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却一直钦佩征雁的才华及成就，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对象。

说来，征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但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既写小说，又写剧本，还写得一手优美的散文；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能写，而且也能亲自粉墨登场，上台演出。

1964年到1967年3年间，他受聘于新加坡文化部，担任该部出版的《电视与广播》周刊主编。他在极短的时间便把《电视与广播》周刊编成一份畅销的周刊，刊物中不但刊登

电视与广播的节目情节、艺人动态、影坛情报之外，也刊登小说以及文艺作品，谢克编撰的《新马华文文艺丛书内容提要》的系列，便在当时的周刊里连载。

征雁在这段时期，也曾经受邀参加当时“艺联剧团”而先后在舞台上演出《金小玉》（扮演剧中的王司令）、《清宫怨》（姚克的名剧作，即以光绪皇帝与珍妃的哀怨传说为内容的清宫戏剧）中的光绪皇帝及《父母心》中的父亲。

当时，新加坡电视台开始播放本地的剧作，征雁兄也参与“开拓”的工作，把《父母心》从舞台上搬上了荧光幕去。

征雁于1969年举家返国，定居在家乡——巴生。这以后的36年间，正如新闻中所说的：他一生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事文化工作；自1973年开始踏足政坛，扮演政坛上要角；1983年以后，他转向文化、社会工作，担任社团要职，推动社会、社区、乡团等的文化、习俗等等的活动。他在一生中，真正地作出了奉献！

1月7日晚上，我与雪风兄通电话，当时他刚到丧府去吊唁归来。他也为征雁兄的去世感叹良多。他说：“他是个能做事的热心人士，他正想在文化与文艺上再作奉献之时，却突然去世了，真是遗憾的事呀！”雪风兄的感慨，正是我心中要说的话！

[2006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悼念征雁特辑“剧终人散·雁去留影”]



征雁伉儷于2004年12月底到上海度假。



中国作家二月河（左五）受邀前来吉隆坡演讲，受到征雁（右三）等人的接待。



雁過留聲 哀悼征雁

· 陈雪风

正月六日上午，有位文友拨手机告诉我一些征雁兄的事，但因为当时我正乘坐电动火车往吉隆坡，噪音很多，听不清楚详细真确的内容，我只能心有戚戚然。因此，回话过一会儿再给他回电。

过后，我还未回电，就接到达真姐来电说，征雁兄因病在今早走了。我徒然大呼，可惜啊！可惜啊！怎么这样一转身就走了！

大约一个星期前，我们不是还通电话，互报近况吗？

想起这事，我又在心呼，可惜啊！可惜！征雁兄这样一转身就不再见了。的确是件非常可惜的事，这不但对我这个相识超过半个世纪的老朋友，对马华文坛，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和征雁兄，相识于新加坡，那时，他已从中学毕业，在邵氏公司做事。新加坡邵氏公司当时的总经理是诗人柳北岸（蔡石门）先生。宣传部的主管是作家，老报人黄科梅，而诗人杜红应该是其同事。好多新加坡的著名文人聚在一起办事，那情景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因与他的上司及同事认识，所以，彼此也相识，而且经常见面，在一起喝咖啡聊天。

这时候，征雁的文名已经很红。他写的散文、小说与戏剧，在文坛很受欢迎。可以说是关心文艺的人无不知道征雁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戏剧家。他写话剧，也为一些中学生的戏

剧组织或专业剧社编导戏剧。新加坡在战后，文坛上曾经有一段不长不短的时期，演出戏剧创作与名篇，构成了社会上一般相当可观的表演热流，这与征雁兄与其一班朋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个年代的话剧创作与演出，还是承继着五四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现在中学生或表演人才选择流行的实验剧不同，完全被当作是一项社会的文化活动，而不是某些个体的游戏或概念实验。从某方面来看，当时话剧创作与演出，都扣紧着整个现实社会的情势。艺术家与演艺人员可说全没私心地将他们的工作与努力作为协助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活动。

他们不只热爱戏剧艺术，而且更关切整个社会发展甚至是世界情势的趋向。他们是艺术工作者同时也是关怀社会的工作者。不少中学生与社会青年，基于兴趣与一定的艺术理念组织结社，比如赤道，康乐等团体在积极推展戏剧与文学活动。

征雁兄，据我知道，可能因为他的身份与际遇，虽然没有参加这些主流的剧艺团体的活动，但他个人在学校与其他一些团体推动的演艺活动，还是十分的积极，而且也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

陈征雁的名字，在其他（比如主流之外）的表演领域里是另一个努力的代表。

在这期间，他还被邵氏公司派往日本进修电影制作课程。

受训回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并未延续在电影制作业方面的发展。不久之后，他倒到了文化部工作，担任《电视与广播》周刊主编。朋友之间，都为他获得这份差使而祝福他，咸认为这对他来说，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大事发挥其才能。实际上，他主编《电视与广播》周刊，表现得十分出色，而成了活跃新加坡文化界的名人。

我于1962年到吉隆坡《南洋商报》编辑部来工作，虽然少与他联络，然而，也有几次回返新加坡，和他一起在红山

或小坡一带把杯共饮叙旧，深为他工作得意而欣喜。

可是，非常意外。正当他的工作如日中天，朋友一直看好的情况下，接下来不久，我就听闻他离开了电视周刊，回到马来西亚的巴生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返马后出任教育服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也参与政治事务，受委为马华总会长的顾问，负责文化咨询方面的事务。

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由新加坡返马后际遇不错。如果说离开新加坡《电视与广播》周刊的主编工作是某种挫折的话，那么，他回到巴生后的际遇，看来还满不错的。但，无论如何，这一来，陈征雁的社会活动，却迟至第二线的幕后了。

这在他个人来说，也许不被认为得意的事。此后，约有十多年的时间，陈征雁却逐渐地远离社会的视野，而有隐居的趋势。

然而，所谓隐居的趋势，肯定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以前一部分文艺界的朋友不了解实情的感觉。事实上，陈征雁那严肃冷漠的表情下，一颗心，无论在何时何处，依然是热切地在关切着社会与族群文化的情况与发展。陈征雁，你从外表来看他，他的淡然与平和，教人感觉得近似冷漠，但他却有一种自学生时代就养成的坚定的理念与自信，思虑周到的见识；他寡言沉默的时候多，不喜欢抢话与抢风头。可以认真冷静地聆听别人的话语与高见，之后，他一发声发言必定叫人洗耳恭听，视为灼见。加上他说话的语气温和，态度亲切，丝毫没有一点霸气，用语与叙述的形式富有亲和力，又有幽默与风趣，娓娓道来，生动而引人入胜。

陈征雁是一个散文作者，又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无论是在会议上发言或上台演讲，他的口头语言，散发出一股浓厚的书卷气，那是一种比出口成章更具魅力的口才。

他给人的印象，可说是典型的书生，文弱的体质，斯斯文文，言谈举止，一派君子风度，单看人的外表，你绝对不

能想像他站在台上说话的那股既有煽动力又不能说它是煽动的吸引人的魅力。

由于参与华总主催的文化活动，近几年来，我有机会经常听征雁兄发言说话与演讲，我发觉他深具演讲家的潜质，是我们少见的。他上台说话，既表现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见识与真切的投入，又难能可贵地体现出一个文化活动工作者的真知与灼见。

征雁兄走了，他的一些才智与魅力，叫我思念时，不得不痛哭一场。

若回顾他在政治工作与农业投资之余，落力参与巴生福建会馆的社团事务，创设文化团队的工作，亲力亲为地推动社会的康乐活动；诸如发动多元种族的老少共同庆祝中秋赏月提灯游行，或是组织带领龙舟竞赛队远征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开先河的努力等等，在在都是我们族群发扬民族文化经典性的创举。在举办的过程轰动遐迩，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在发展多元种族文化的理念与建构，但过后，却未获得华社内部的重视与持续推展，实在令人遗憾。

我们在谈论上述这些往事时，虽然征雁兄不曾有埋怨或微词，然而，他的失望与灰心却也是可以轻易感受到的。

征雁兄返马，在参与政治事务与农业投资不很顺利之后，曾经落力地推动乡团的文化建构，社会没有给予应有的反响与回应，他把其力量倾注于工作的结果，只像在大海中投下一大块的石头，激起一定的浪花与波涛之后复归无痕的平静，一切都似乎没有发生过那样。这是社会的错，而征雁兄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了解，征雁兄是不同于其他在搞社团与社会工作的人那样，在工作过程，更多地利用嘴巴，无时无地千方百计进行推销与宣传自己；不断地数说为公众做事，吃力不讨好啦，好辛苦啦，既出钱又出力啦，等等不一而足，要拍照片时，抢时机站到前面，即使实际上未出过一分力，也没有做什么事，但却风头十足，名字远扬，成为社团领袖，贤达名流。

我和陈征雁恢复比较频密的联络与交往，已经是近三几年的事，那是由他受邀出来担任华总的文化委员会秘书之后，因他对我的过爱，多次推荐我，要我也来帮忙搞一些活动与处理一些文化问题，可惜因我的人际关系差，口碑又坏，并不被其他有势力的朋友首肯认同，所以在工作上一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根本成不了事。

这几年，陈征雁兄因曾膺任巴生福建会馆署理会长，继又被选担任雪兰莪福建会馆及全国福建会馆联合会署理会长。在乡团领域，名气大起；但他在马华文艺界，东山再起，出来搞一些文化与艺术活动，在许多同道，特别是年青一辈，就感到很陌生。然而，他们惊异之后，很快的，却就心里明了其所以然。那时征雁兄代表华总文化委员会接待远方来的文化名流，诸如王鲁湘、二月河以及高希均等等，并主持他们的专题演讲之后，他那儒雅，富有文学修养的得体谈吐，翩翩的君子风度，尤其是他那满有个性的不燥不冷又热心又淡漠的气质，很快就在友辈同侪间散发了一阵阵的魅力，使初识的人一转身就心生敬意与亲切感。

在许多一起工作与开会的日子里，开初的一个很短时期，他常常开导与鼓励我，不要因意见差异而耿耿于怀，甚至形于色的生气或愤怒，而要多听与多思考别人的想法。他很担心我会决裂而拂袖而去，他多次要我知道，他是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意见的。不过他也经常慨然地让我领会他的心意。而我却与他不同，常会很露骨地处处都在鼓动他下定决心再来搞一些工作。慢慢的，他多少也不再坚持他要“退隐”的心意，态度上有所改变地接受我的建议，打算为《升旗山下》的再版举办一项推介礼，而且让我把这件事通知新加坡的刘笔农，邀他来推介礼上介绍陈征雁在新加坡的生活与创作情况。

可惜，如今这项《升旗山下》再版的推介礼盛况，已成为永远的想像了。

其实，我还曾要他构想组织一两个故事，再写一两部话

剧，不要让实验剧的演出专美，可是，我很有信心这项建议由于他没有正面拒绝而会变成事实之际，因为他不拒绝，在我看来就是表示他会做，然而“他却走了”。

还有我们还策划把今年的文学节的重头戏邀请诗巫文艺界的朋友来担纲策划。当马华文坛上尚有许多事正待去做的时候，詎料征雁兄竟敌不过病魔的摧残而无法顾及这一切，走了！

陈征雁兄走了，在冰冻冷人的季节就要成为历史时，在有些地方坚固不灵的冰块或泥土，已处于消融与复苏，乡野的小溪河道已发出了流响的声音，天啊！竟忍心要世道再慌乱一阵子。

我无奈洒泪自告：

“不要辜负春天是希望及创作的季节。”

（2006年4月刊于《新加坡文艺报》第22期）



征雁（右一）于2005年8月间在巴生招待来新马收集戏剧资料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康海宁（中）。陈雪风（右二）、李荣春（左一）和李锦宗（左二）都是座上嘉宾。



雁着对联，忆征雁

· 拿督林荔清

阔别了6年，再度踏进巴生福建会馆的大礼堂，两行令人注目，代表着福建人精神的对联“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重新映入眼帘，令我感触良多，慨叹不已。

这对最近重见天日的对联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30多年的老搭档和老战友征雁。

这对独特的对联是征雁和我在17年前，陪同会馆龙舟队前往中国湖南汨罗江参加第一届国际龙舟赛时，在岳阳市郊一座建筑物的墙上看到的。我们觉得这对别具匠心的对联含意深长，于是毫不犹豫地抄下来，带回巴生复制，挂在会馆大礼堂两边的墙壁上，让它持续发挥着不可限量的激励作用。

物是人非，触景伤情，征雁的离去，不知不觉快要3年。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恍如昨日。

征雁和我多年共同活动时，无论是在政治上或社会上的事务都能互相信任，合作无间。虽然偶尔免不了会发生意见相左的事件，但是我们都以和为贵，以社团的利益为至上，以冷静的平常心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歧见，因此，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能相辅互助，相安无事，日久见真情。

征雁是位才华横溢的谦谦君子，可惜这个名利当头的社会使他怀才不遇。其实，在他不平的一生里，他的确是有一些骄人的成就，特别是在新马文学和文化方面，只是他为人

低调，真正认识和欣赏他的人寥若晨星。倘若他有一个适当的平台让他毫无保留地自我发挥，他的成就更非同小可，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他对从政存有理想，有意以清廉作为他政治的理念，希望在政治的清流里为人民、社会和国家服务。他的基本原则是黑白公私分明，明辨是非，可是典型的政客是没有为大众的福利着想的。他直话直说的优点和直肠直肚的性格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不少的敌人，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不想看到的。他在政坛上英雄无用武之地，乌托邦式的理想终于成为幻想。幻想的破灭使他清醒过来，不得不从浊流里脱身而出。

即使在这样不健全的环境下，他仍然坚持他认为理想的人生观。如有机会，他还是会竭尽所能为他所处的社会作出无私的贡献，譬如，在这20多年来，他、苏继业和我这铁三角的配合下，为巴生福建会馆做了一些事情，其中包括马华中秋提灯大游行、教育周、画展、24节令鼓、龙舟队、千尺爆竹庆元宵以及直播97香港回归。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无私的付出，尽最大的力量去干，希望能够达到轰轰烈烈的效果，空前但非绝后的目标。我们把标准订得这么高，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骄傲和怀念，因为到目前为止，不敢说是绝后的，然而还是空前的。有人说，如果翻开巴生的历史，那一段拥有辉煌日子的巴生福建会馆是带动巴生中华文化的前锋，希望这是共识的事实。征雁所付出的汗马功劳是令人永志不忘的。

除了征雁和我之外，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也过从甚密。内子丽明和征雁夫人爱瑛交情深厚。她们也互相配合，把各自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们在外活动时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引以告慰的。

征雁伉俪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其圣在新加坡出任一家日资公司的经理，幼子其贤也在商界大展宏图，长女羚玲在首都学院任副院长，幼女子洁是上海天联广告公司总经理。

这些有才干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各有成就。征雁夫人爱瑛现在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征雁也应该含笑于九泉。

(2008年11月8日)



征雁（左三）和拿督林荔清（左二）等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留影。



征雁（前排中间）和拿督林荔清（右一）等人在澳洲合影。



1991年6月21日，巴生福建會館龍舟隊從中國歸來，受到熱烈的歡迎。



1991年6月28日，巴生福建會館慶祝龍舟隊在中國奪獎。



雁過 悼雁周年祭

· 李荣春

夜雨骊歌奏别凄，
离群征雁独飞西。
踏车康诺河桥暮，
校庆登台曲我提。
方块路淹官耍涨，
坎壤走出秤盘离。
老来往事非烟觅，
篇载万言是爪泥。

[2007年2月6日初稿，2009年6月1日重修。]



征雁（左二）、李荣春（左一）、
姚紫（右二）和郑捷浩（右一）在
巴生合影。



征雁（左）和钟中老同学黎业清合影。在檳城举办的征雁新书推介礼上，黎业清购买了多本《升旗山下》，分赠给在场的老同学们，以示支持。



征雁（后排中间）在巴生与老同学聚餐。



雁 我与征雁二三事

· 顾洋

那一天，另一个难忘的日子——2006年1月6日，我在国外上网查看电邮时，收到钟灵老同学陈源松从怡保寄出的噩耗：征雁兄走了。

顿时，我震呆了。待平复过来，久久黯然无语，然而，心是绞痛的。真的不敢想像，回国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的这一位莫逆之交。

征雁和我，虽是同在半多个世纪前的1956年，因为槟城钟灵中学发生学潮而被判处学业死刑的老同窗，但两人的手足之情，是双双转校到新加坡育英中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彼此的际遇相同，被“丢”出钟灵校门外之后，迫得离乡背井，另谋学习“生机”。老同学异地重聚，互相关怀，同心同德，人之常情耳。

在育英就读的两年期间，征雁的领导才能，很快为同学们所赏识。毕业那年，同学筹备出版毕业刊，成立编辑委员会，征雁当选主编，我忝任编委。按当时新加坡华校的传统，中学毕业刊不很重视纪念意义，大多以文学作品挂帅，这和钟灵毕业刊一向以纪念性质为主调的风格，是大相迳庭的。尽管是插班生，一股“来历不明”的冲动，让征雁和我都萌生了“移风易俗”的大胆想法。在编委会议中，我们口径一致，力排众议，耐心地阐释毕业刊兼顾纪念性质的必要性。经过多次的讨论、争辩，编委会最终达致的方案，是文艺创作和纪念意义兼而重之。育英中学在那一年的高中毕业

刊，打破新加坡华文中学的悠久传统，第一次印载每一位毕业同学的个人半身相片和姓名。这一“改革”，征雁无疑是“先行者”。

第二年，我进入南洋大学（不是现在的伪南大）。在二年级时，南大学生会首次举办“大学周”，各院系的学生课外团体，在这一星期内联合展示各自的学习心得。我时为政治学会的负责人，也算是“别出心裁”地想举办一个模拟的国际会议，以舞台表演的戏剧形式，假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由美苏两大阵营的各五国代表，辩论世界裁军问题。相关的资料，我们垂手可得，就苦于没有写剧本的人才。我灵机一动，想到了“外借”。那时候，征雁已是知名的剧作家，该人选自然是非他莫属了。老友求助，征雁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将近两小时演出的剧本，他在短期内“交货”。十国代表辩论时的遣词用字，亦庄亦谐。演出当晚，文学院礼堂坐无虚席。“代表们”发言时不用麦克风，满礼堂的观众，为着听清楚各国的裁军立场，无不屏气凝神，自发地连身子也不轻易挪动一下。全场真是鸦雀无声，只闻“代表们”你来我往的慷慨陈词。然而，当台上的唇枪舌剑，说得精彩或风趣时，台下随即爆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笑声。演出之后的一段长时期，在多家报纸上，好评如涌，堪称是整个“大学周”中最为同学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项目。顺便一说，当时“外借”的另一功臣，是临摹安理会会场巨副背景画的陈源松同学。他也是被“判刑”的老钟灵，当时在新加坡的南洋美专深造。

毕业后，我回槟城谋生。征雁随后也“鸟倦还巢”，回到了巴生老家。我和他之间的联络，断断续续、续续断断。一直到1969年的全国大选之后，两人曾携手“在政坛边缘走一回”。目睹众多妖魔小丑，我见鬼怕黑，知难而退；征雁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往后的日子里，他的领导才华，在政坛绽放异彩，一度还是政党第一把手的智囊团成员。一段时间以后，他功成身退，淡出了政坛。

我最后一次同征雁相聚，是在2004年5月1日到3日。他和嫂子，偕同小舅子冯万顺伉俪，联袂到槟城来度假。万顺回娘家，征雁兄嫂在蜗庐将就住下。我循例邀约亚罗士打另一老友冯志由同学前来会聚。老冯不仅也是被“丢”出校门外的老钟灵，更是后来转学到新加坡和我们穿同一条裤子的老育英。咱哥儿仨如此深远的友情渊源，难得白头重聚，加上另两位老钟灵朱炳钦和朱隆华二兄，这样的一伙心腹之交，聊起天来，东南西北、上下古今，哪还能有个尽头？那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真个是乐不可支。念兹在兹，魂牵梦萦，只叹人生如寄；思君忆君，音容宛在，更是那堪梦醒？

记得很清楚，5月3日在卖菜街吃过午饭后，我与内人目送征雁一行驱车回返巴生。一个月后，我出国一住便是两年。真没想到，那天下午在饭店前的挥手一别，竟是两个知己的死别生离。回首当时，两人依依惜别的情景，历历在目。如今他我阴阳两隔，焉能不感叹世事无常，人生苦短啊！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征雁兄离我们而去，弹指间快要两年。秉承他的遗愿，文艺界好友和他的遗属，收集他的一部份未及成书的文章，为他出版这本文集，以资纪念。我遵征雁嫂与锦宗兄嘱咐，聊作微言，滥竽充数。搁笔之前，抄录挽联一对，藉申哀悃：

昔日订兰交，流水高山逢知己；
此时悲鹤化，落花啼鸟总伤神。

（2008年1月3日和4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征雁（左四）、顾洋（左二）和陈源松（右一）等人合影。



征雁（左二）与钟中老同学合影。

雁留聲
当年情

· 陈源松

人生苦短，相识而又常互相惦记心中数十年的朋友，
人真是风毛麟角。

征雁兄与我，除了是中学同学，也是当年檳城钟灵中学学潮的“同志”，在校算是活跃份子。他是剧研会的主席，又是文艺刊的编委，我则担任学校文艺刊的主编及《艺风》美术双月刊（《光华日报》副刊）的主编，可以说都是鲁迅的子弟，热爱华文文学。由于大家都有一股正义感，当知道了学校当局准备接受改制，我们都意识到事关重大，这会严重地伤害中华民族的教育体系……。于是联合全体热爱华教的同学，向校方表达了我们的关怀，并希望董事部悬崖勒马。想不到，当我们正在礼堂等待董事部的回应时，在教育部长阿都拉萨的插手下，竟把我们当“共产党”来对待，派了镇暴队到学校来大射催泪弹及用藤鞭驱散我们！过后不久，征雁兄和我们一批共68名同学都不许回校上课，我们都一齐被断送了在钟灵的学业，甚至不许我们转校到全马任何学校。这本来是华校内部的事情，教育部怎么会对华校生采取那样残暴的手段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所以会用这种心狠手辣的做法，确实是有计划地要把华校毁掉！今天已证实，钟灵只是第一间，而我们的先知先觉，正是阻碍这一连串阴谋的绊脚石，征雁兄和我们都是牺牲者！

既然不许我们进入马来半岛任何学校念书，我们只好到新加坡找学校念了。那时征雁兄、陈明光、冯志由等同学到育英中学插班，而我则幸得骆清泉中医师，修函向陈文希、

钟泗滨及林学大推荐，进入南洋美术专科学院就读，并得林学大校长欣然接受。骆清泉当时是槟城艺术协会会长，陈文希和钟泗滨则是该学院的教授。

1957年在新加坡土地上，我们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几位相好的同学在患难的处境中，营育了我们深厚的友情。在新加坡人地生疏，我们几个经常一到周末便在一起，那时另一位难兄朱荣秀也到了新加坡，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但他却是去工作的。接着，曾标成也到了。而朱炳钦也在新加坡工作了。不觉中，征雁兄中学毕业后考进大学，但他不念，却去邵氏公司学习编剧之类的。其时他的作品渐渐受新加坡各社团戏剧股青年们的赏识，常以他的剧本演练，而每次举办戏剧“观摩会”，他都拉我作伴提供意见及协助舞台设计。那段日子，他出版了几本小说集和戏剧集。由我设计封面，如《穷途》、《夜渡》等都是当年的作品。记得每当“观摩会”或其他“研讨会”结束后，我们总是一起去喝茶宵夜。他老是说：“老兄，饿了吗？”。有好多次，因为太晚了，没有巴士回宿舍，他便睡在导演的家，就在我早期寄宿的地方附近，叫BOATQUAY的那条街。

征雁兄爱抽烟。我们年轻时都不知道烟之为害，不知是哪个王八说了这么一句话：“饭后一支烟，胜过做神仙。”这全是鬼话，我们却迷信了好几十年，当时很少人提“保健”这回事。还记得有好多个晚上，我们三个人（一个是剧作者，一个是导演，一个是舞台设计者）气味相投，联袂到我住宿附近的桥头聊天，无所不谈，但主要还是离不开检讨演出的剧本台词、演员的台位、灯光、背景、道具等事项。一直到深夜眼皮都累得快要睁不开了，还是不甘心回去睡觉。年轻人嘛，顶得住。那时刻，征雁兄总是递来一根MANTERHORN薄荷烟说：“老兄，来，提提神。”我也乐得奉陪，但却从来没买过一盒，也不曾上瘾，想来也奇怪。讲起烟，我倒联想起他寄宿的房间所放置的烟盒，蛮是壮观的，全都插在房内墙上的通风洞。这个牌子的烟盒设计有座雪山，有“孔雀蓝色”的衬托，看上去会想起薄荷，有冰凉

的感觉。

过了一段日子，他告诉我要去日本留学，隔不久他便离开新加坡了。大概学业忙吧，书信也少了，直至他带了夫人和两个孩子回国。这我才知道他已从新加坡回到巴生。大概是为了工作忙吧，没通知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只在某个晚上到“劳动长堤”相聚。印象较深的便是牵着他孩子的小手，来回在长堤的小路上行走那个时刻，又跑又跳，又快又慢，逗得小孩子好开心呵。

这一别又是好多年，大家都为生活忙，通讯更少了，几乎失去联络。有一次听老友叶益荣中医师（也是难兄一位）说，他在巴生经营印务。我由于工作忙碌，一直不能抽空拜访，直至有一次到南马收账，顺道探访，才得以如愿。如今屈指一算，已是大约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自此，我们每年都少不了寄张贺年片，互相问好。唉！就是遗憾没机缘像往年那样促膝谈心了。1987年，我意外弄伤了脚，拿着拐杖，没法去收账！

于是改去学院当讲师，天安门事件过后，转入独中教书，更少去外坡了。

2003年8月9日，他为了重修再版《升旗山下》这本小说，特地约了我到槟城陈明光难兄家小住。那时我已离开独中，休闲在家，既有闲情，当然盛情难却，于是陪他去找回小说中提到的地方，以令小说更真实，更圆美。他的态度认真，由此可见。他把再版的草稿交了给我们数位知己，而我（爱之深，‘校’之切）大胆指出了许多“点”要校正的地方，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也体现了他为人的谦卑。

2005年10月23日，我们同届毕业的钟灵校友在云顶聚餐，他没有参加，但却上了云顶。我由于跟着大伙的行程，很难抽出时间跟他叙旧，当时在极短暂的时间，他告诉我《升旗山下》已出版，并交给我30本去推销。很快地，在其他同学的协助下，半个小时便卖完了。

2005年，征雁兄和家人要到峇眼色海拜访亲人，约好路经怡保时同我相见，却因在手提电话上“会错意”，大家竟

在等候对方，浪费了许多时间，征雁兄终因为赶路，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很遗憾！

2005年12月11日，在槟城的同学聚餐会上，节目中安排了他的作品推介礼，由于当时他应酬多，也谈不上几句，而这一次的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唉！大家正忙完了“活”，稍有些空余时间相聚的机会，岁月已去矣！大家竟在不觉中踏入晚年了，而征雁兄就在这一刻比我们先一步驾鹤归去……！

惋惜之余，谨以益荣兄寄来的短讯，作为此文的结尾：

真正的朋友，

不一定合情合理，但一定坦诚相对；

不一定形影不离，但一定惺惺相惜；

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

不一定时常联络，但一定放在心上。

〔2007年11月〕



征雁（左）和陈源松（右）合照。



雁在那遥远的地方

· 李少良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征雁生前创作的最后一篇舞台剧。

此剧本是叙述“西北歌王”王洛宾的一生，个中充满浪漫与激情。

征雁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在本剧主题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背景与过程。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出舞台剧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何与为谁而作的呢？

征雁被委为2004年由华总与14华团文化组织联办的第8届马华文学节筹委会主席。吾人不才，蒙征雁错爱被推荐受委为委员。在第一次开会商讨开幕与闭幕仪式后，与征雁等人到华总附近的“嘛嘛档”喝茶聊天。跟平时一样，征雁眯起眼睛在享受他的茶后一支烟，他正在琢磨着我们所不知的事……。

在开会时，征雁拍板决定把开幕仪式搬上舞台。以他的话说，“过往的开幕仪式都是请一位部长或名流象征式的敲一下锣，然后开个茶会。这次我们要办得哄动一点。”

“老李，你来做舞台剧主角……。”征雁突然间这么对我说。

我猛然的吓了一跳，“什么？”我是什么料子，活了半百还没有上台亮过相的人还要我在舞台上粉墨登场？开玩笑！

“行，你行。你会唱歌，而且……。”他给了很多我认为不成理由的理由，而我回应的所有理由都一一被他拒绝。

我也就这样的让他把我推上了神台。

原来，征雁早已有了腹稿，他早已想到了王洛宾，想到了大西北。

“我们来个《李叔叔谈大西北》如何？这戏本有歌有舞，在大西北唱王洛宾的歌，跳边疆的舞，该会很热闹的吧！”

哈！他根本就是把我当作他作品的主角……。

当晚，征雁约了我出来喝酒谈天。他大概的阐明这故事的纲要。冯万顺身为委员之一，而且又熟悉网际网络，就义不容辞的要负起责任收集有关王洛宾的资料。征雁想要在剧中穿插3首王洛宾的著名歌曲，我的提议是：

-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 2) 《掀起你的盖头来》
- 3) 《大坂城的姑娘》

我更拿来了一个光碟在车内播放给征雁听。他决定把这3首歌顺序的穿插在他的创作里。《在那遥远的地方》由我独唱。《掀起你的盖头来》是背景播放歌曲让舞蹈员们表演。而《大坂城的姑娘》则是由我与其他演员合唱，配合舞蹈表演来个大汇演。

过了几天，征雁的大作《李叔叔谈大西北》的稿已成雏形，我们又聚首在咖啡店的五脚基煮酒论文章。据征雁的意思，“李叔叔”与他的两个助手将以游客的身份进入大西北，并请了两位当地导游当响导。而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的交谈中，把中心人物王洛宾的一生具体的勾画出来。征雁当时也决定把开幕典礼搬到坤成女中去，同时觅求坤成女中的戏剧组、舞蹈组和广播组的合作，派它们的学员参与演出。

我深深佩服他的抉择。试想，学校的文娱组织哪有不兴致勃勃地参加这种特大型的演出呢？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运筹帷幄吧！

剧本脱稿以后，征雁决定把剧名改为《在那遥远的地

方》，这总比《李叔叔谈大西北》来的有文艺气息和浪漫一点吧！他也把王洛宾的3首歌中的《大坂城的姑娘》列为压轴曲，因为此曲很讨好人，人人都会唱，而且节奏也比较活泼，定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而达至谢幕的高潮。用他的话说，“当一出舞台戏达至高潮而突然收场，这样的峰回跌宕处理方式定会令观众有一种流连忘返和回味无穷的感觉。这么一来，这舞台剧也已成功了一半。”

经过华总与坤成女中的安排，场地和演员已基本上解决了。只是坤成女中的小演员都是没有打过大阵仗的人。最可怜的是我，我连枪声都没有听过，还要我当第一男主角——李叔叔！

然而，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好战战兢兢的听两位老前辈，征雁与他特邀请来当导演的梁志成先生的指导与督促。幸好每次排练完戏后，征雁都会“加班”约我们到咖啡店的五脚基喝啤酒聊天。每到夜深人静店门关后，就是我们开始练戏的时间。从台词、台步、表情、语气、手势、动作，我都得一一的学。偶尔有些差错，还会挨一顿骂呢！唉，玉不琢，不成器嘛！

整个练习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演员们就是抓不到征雁所要求的表演境界。只见征雁老是衔着他的香烟，一言不发。在上演前几天，他对我说，“演员会临场发挥的！”

他亦对我说，“一般上演员会怯场。只是你要知道，当聚光灯打上舞台时，你根本看不到台下。你只要看着场地的最后方，你就会比较镇定。记着，观众是来看你演戏，你站的比他们高，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他们高。如果演员有这样的心理，你就不会怯场了。”

征雁亦给了我两样道具，一顶草帽和一支烟斗。他说，“演员往往最怕的就是在演戏时不知把两手放到什么地方去才好。这两样东西的用处就是：在歌唱时，你可以挥动这帽子增加气氛，你亦可以用这帽子散凉。当轮到别人表演时，你可以燃起烟斗在台上徘徊走动，那么你亦在演戏。你也可

以在你演出时，手执烟斗挥动来加重你的语气。不要小看这两样小小的东西，它们能令演员表现得更自然与出色。”

征雁、冯万顺和我，自诩为三个臭皮匠，欲比天高，把整个开幕仪式的筹备工作扛起来。征雁是总司令。万顺负责灯光、音响与录音。我是“专医奇难杂症”，负责驾车、布景与道具。我以职业上的方便，盖了一间草庐，并造了一道木桥，按放在舞台上。征雁称之为“空前的布景”，向来没有人曾尝试过把实景搬上舞台。演员可以进入草庐，亦可以上木桥过“河”。我们再在草庐后插上数棵青竹，用木条撑着涂上青绿色的卡纸作为草坡，加上数盆花草与几只西瓜。草庐旁斜放着一个用三合板造成的木轮与两个储酒桶，旁边放了一个马槽再搭了一个葡萄架，架上挂了几串用塑料做的葡萄藤再加上几串真葡萄。草庐前摆上一张木桌和几只木凳，一片农村风光，远远看去，真的有点大西北风味呢！

2004年9月4日，第8届马华文学节开幕典礼假吉隆坡坤成女中礼堂举行。一时衣香鬓影，翹楚云集。征雁身为筹委会主席，可忙得不可开交。这边厢要接待部长贵宾莅临，那边厢又要和众华团同仁打交道。我们这几个小喽啰，只能自个儿忙着自己的份内事，磨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我们这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整晚的压轴戏。当其他节目在进行时，我们这一班演员在后台真的有点紧张。临出场时，我真的冒冷汗，心跳不已。身旁的一位小演员对我说，“李叔叔，我好怕……。”我记起了征雁对我说过的话，也就很方便的告诉她克服这种惧怕的方法。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开场音乐响起，我做了一个深呼吸，领着几位小演员大步登上舞台……。

一切出乎我的意料，但却在征雁的意料中，全体演员的确做到了临场发挥的表现。如今想起来才明白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叫做“哀兵上阵”。

台步、表情、歌唱、舞蹈、举手投足，征雁过后说大致上是不失不过，以一伙乌合之众，游兵散勇能演出这样的成

绩，不能再有什么强求了！

从观众的反应看来，我们这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每首歌曲，每段舞蹈，观众都给我们热烈的掌声，他们更随着舞蹈音乐节奏而拍手。

一曲《大坂城的姑娘》的歌声与舞蹈把整个坤成礼堂闹得翻天覆地，当气氛达至最高峰的当儿，一个峰回路转，《友谊万岁》的音乐骤起，是晚所有参与各节目的演出者都登场合唱这首惜别曲。很多观众都不愿离去，有的甚至也和唱起来。

在歌声中，征雁从贵宾席从容地走上舞台，径自我面前与我握手。在喧闹中，我听不到他跟我说的话，但从他的表情，我看到他的满足与兴奋……。

坤成女中戏剧组负责老师杨玉蓓过后私底下对我说，这是坤中礼堂由来最大型的演出，也是最热闹的一次。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偶然谈起这第8届马华文学节的开幕仪式演出，征雁以轻描淡写的语气说，搞戏剧是给自己爽而已，参与者大多会有一种成就感，然而终归你要回到现实。

这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剧本，征雁收集在他后来出版的《在高天外看春秋》一书里。

如今，征雁已逝，往日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偶尔看看他在这开幕仪式以筹委会主席身份致词时拍下的录影光碟，音容宛在。再看看自己踏步舞台的身影，虽觉得自身演艺低陋，然而能在征雁的创作中扮演过一次戏中小角色，顿觉得不枉与故人相交一场，益觉得此次的参与演出弥足珍贵。

而今回顾过去，能不唏嘘？

“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别来无恙？在那遥远的地方！

[2008年6月16日]



征雁（右三）和李少良（右二）等人合影。



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讲述中国西北民歌大王王洛宾的一生，在剧中提纲演出的李少良（右）亦演亦唱，高歌王洛宾的著名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及《达阪城的姑娘》。



悼念江湖长辈陈征雁

· 叶宁

年终刚刚送走了一位热心华教的长辈朋友黄文界先生，新一年开始还不到一星期，又接到陈征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心头沉重。姐妹报同事罗正文和我感叹人生如朝露，说什么上个星期才和陈先生通电话，似乎一刹那就接到他的死讯。

陈征雁是我的“江湖长辈朋友”，称他为长辈，因为我当年初踏入社会，陈先生已在社会几度秋凉；说是江湖，因陈先生很有江湖朋友的豪爽与激情。

记得8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出道不久的记者，在一个场合认识了陈先生。陈先生涉猎极广。他曾是马华的活跃分子，也在出版社做过事，写得一手好文章。

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的口才很好，讲话措词优美。他当年颇有辞官归故里的优闲心情，而我刚好漏夜赶科场。在无数个夜晚的咖啡店，陈先生像个说书人，像我这个晚辈娓娓道来官场现形录，文坛秘史，还有闻人小故事，让我听出耳油。

陈先生的酒瘾大，烟瘾更大，而且还是个夜猫子。我目睹了他烟酒不离手的骇异场景。通常过了十点，他才呼朋引友，啤酒大口灌注，香烟燃起，打开话匣子。陈先生越夜越亢奋，烟火吐纳，整个人弥漫在白蒙蒙的烟雾里，活像一根大烟囱，而那啤酒像喷泉，饮之不尽。直到凌晨三四点，大家才尽兴而归。我有一次离开时，无意中回望，只见堆在一

处的空酒瓶颇壮观，地上的烟蒂如梅花点点，那时我心想，陈先生除了睡觉不抽烟外，他这个抽烟法，健康迟早出问题。

我最近见到一次陈先生是“中国帝王作家”二月河来马演讲。他是当晚的主持人，讲座会还未开始，场外已有很多人在等待入场。只见他刻意避开人潮，手里拿了一张纸，在幽静的走廊踱步，口里念念有词。原来，为了把主持工作做好，他把二月河的资料都看遍了，也花了不少心思写了一篇稿子。为了尽善尽美，他把稿子诵读几遍。我看到他的背影，犹如杜甫江边苦吟，心中深深感动。

当晚，他把二月河介绍得生动精彩，二月河在座上听了一直傻笑。这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周六晚到丧居去给陈先生上香，达真姐接待了我们。听她叙述两姐妹携手旅行的点点滴滴，仿如陈先生并未离去，只是到另一个世界远行。愿他一路走好。

〔2006年1月9日刊于《光明日报》〕



征雁（前排右一）参与马华文学节时，特地和工委会代表到《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总社访问。接待该工委会的有罗正文（前排中间）和叶宁（前排左一）。



· 秃橡

元月七日，先后在报上翻到（陈）征雁逝世的新闻和《南洋商报》高层刊登的挽词。

有一点点被触动的感觉，就像忽然间又见到一位老朋友去了。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也从不曾书信来往。

四、五十年前曾读过的一条震撼心灵的句子，再次在脑海中闪现：“当大多数人还在受苦的时候，个人的享受是一种耻辱。”这条语录应该是印在征雁的散文集《后方的诗篇》的扉页而不是封底。

马仑在大著《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简介“征雁”里说：“大约自1954年起到60年代中期，他是多产的作家之一。”除了《后方的诗篇》，短篇《穷途》、中篇《升旗山下》、剧作《夜渡》、《封锁线》及《征雁剧作集》等单行本，我当年都有从新加坡邮购。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可一篇也想不起来了。

当年自己才开始涉猎文艺学习写作，他只比我年长一岁。生于1937的征雁，却已是一本一本的出书，令人仰慕不已。

文友间还听过传闻：征雁出身富裕，但为了体验生活，曾和建筑工人睡过五脚基。

这些仿如发生在昨天的年轻岁月陈年往事，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是“陈征雁（达人）老先生千古”。

〔2006年2月9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泛馬出版有限公司
Pan Malayan Publishing Co. Sdn. Bhd.
211, JALAN BANDAR,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0520



Date.....

源松兄：
收到您的信，欢喜莫名。我於去年五月三日舉家越
過長堤回到偉大的祖國定居。
目前正設局在吊兒即當編輯兼顧對勝越市場。除
此之外，自己買了一架小型柯式印刷機，出版一些學校叢書，是
挺辛苦，還真不錯。
您的情況如何，也幸得有封信詳細談談。
我剛出版的兩校叢書，有許多插圖，給您當是人手。
您如能抽出一點時間的話，日後務請幫忙。
聽說您正在拍拖中，進展如何？高希從實說來。
我現在已沒有二品個孩子了。
我目前是在在吧生老家，前月去尾，悉得未已書中生後
書局另謀他業詳情待查。
真此致。請專信。

石維

2/9/70.

我在吧生的地址是：

Shanikat Fong Hin Publisher
11, (1st Floor), Jalan Pasar
Klang, Selangor.
Tel: 31588

征雁写给钟灵老同学陈源松的信



雁過留聲 怀念征雁

· 张美增

拜读了黄叔麟先生的大作：《征雁走了》，不禁热泪盈眶，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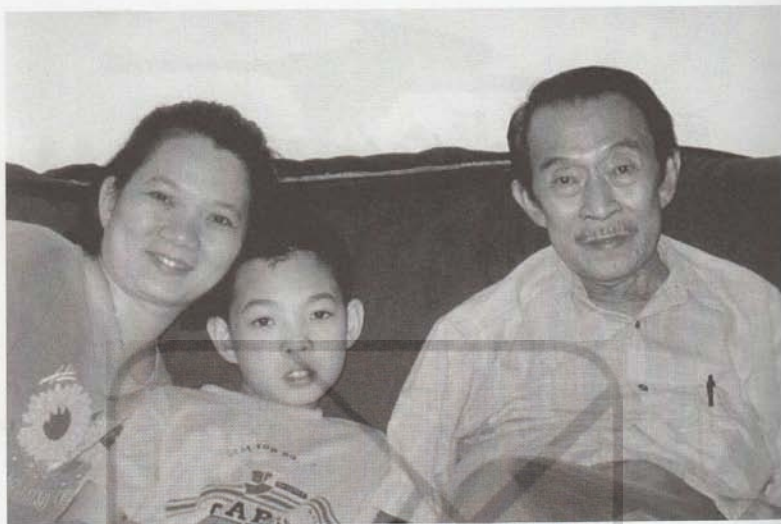
1960年，我在星洲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去芽笼路人民书店看书。就在那边通过书店的老板刘先生介绍下认识征雁兄，大约廿多岁年纪，我只能这样形容他，年轻有为，风度翩翩，说话很有说服力。原本打算买下他写的著作《穷途》，想不到他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即刻签名送我，使我受宠若惊。这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本写作者亲笔送的书，所以我非常珍惜它，保存它。

与我同班的一位同学谢明，也是写小说的高手，读高二时已经出版两本小说了。第一本小说《怀疑》是初中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夜来风雨声》高二出版。谢明跟征雁交情非常好，课余之时，在印度人的小茶档就讨论文学，偶尔我也参与，只是不敢在两位高手面前发表意见，静静坐在一旁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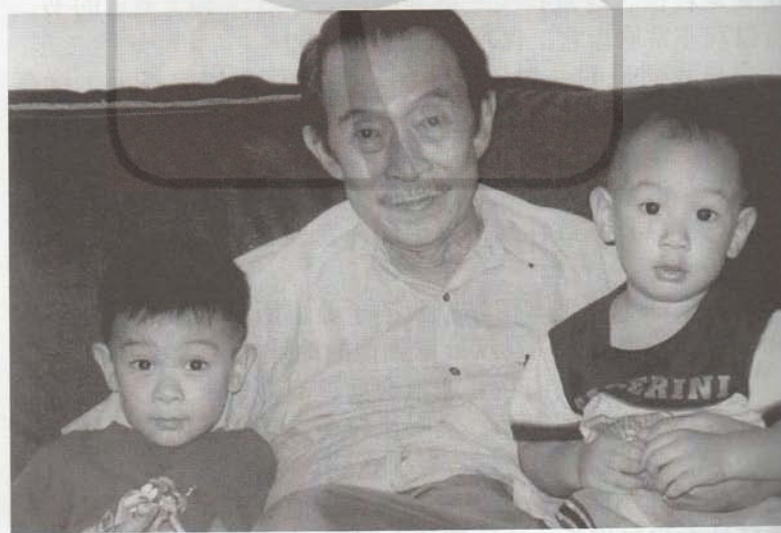
后来征雁去日本留学，我毕了业也回返马来西亚。一别40年，好不容易才从马汉处拿到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两个月前，我们在昔加末会面，真是别来无恙，只是清瘦许多，烟依然不离手，酒喝比较少，还带了两本著作《升旗山下》及《在高天外看春秋》送我。

畅谈几小时，已快午夜时分，送他回旅社，车子开了，他还站在门口挥手，这一挥就永别了……。



2005年12月31日，征雁与长女羚玲和外孙李崇骏最后一次合照。



2005年12月31日，征雁与两个内孙学迅（左）和学恒（右）最后一次合照。



我与《电视与广播》

· 江上舟

马华知名作家征雁先生不幸于今年元月逝世，各界人士都深表惋惜，咸认是文坛一大损失。

我与征雁先生并不熟络，但对他当年主编的《电视与广播》这本刊物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生活简单，小镇上没有什么娱乐消遣，居民工余唯有收听电台广播，但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那个年代，只有三、四家富裕家庭才有电视机。每当华灯初上，有电视机人家的客厅都挤满了人，左邻右舍都涌来观看电视节目。

镇上没有书店，唯一的一家文具店有兼卖书报。我放工后，时常都会跑去文具店翻阅，但书报杂志种类不多，都是香港出版的软性刊物。在文艺书刊严重缺乏，而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下，只好退而求次，选择性阅读那些银色书报，倒也看得津津有味，聊胜于无。

有一天，走进文具店时，眼睛为之一亮，发现一本新的娱乐期刊——《电视与广播》——摆在柜台上，我随手拿来翻阅，竟被它的文字内容深深吸引。

《电》是由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内容侧重报导广播电视台艺人歌星的动态及介绍其节目外，也有岛国风土人物、文学艺术、旅游资讯的专题文章，可谓是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读性高的综合性双周刊。

而促使我以后每期都会买一本来看，因为有《看图作

诗》这一版。它每期都会选刊一张人物照片，背景多是岛国的风景，有兴趣写诗的读者就可凭这“沙龙”照写一首诗应征。

那年，我刚开始学写作，这《看图作诗》引起我诗兴大发、跃跃欲试，就不自量力投寄碰碰运气，怎知得到老编厚爱，每期都有一首诗被选中获得刊登。

拙诗有一期还被选为“最佳作品”，记得题目是：《美》——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麦里芝喷水池前若有所思，我就是写下捕捉到她含情脉脉的神韵，编者还以黑底白字处理，安排显著的版位刊出。

当时年少不敢太张扬，故常换不同的笔名投稿，刊出后竟也被一位小学老师认出是同一人的我，令我大感意外！

文具店的老板告诉我，《电》的销路还不错，因为读者也是新广的听、观众。它能一纸风行，要拜新加坡节目在南海大受欢迎之外，主编功力才是最大功臣！

《电》的主编正是陈征雁先生，当年我只知道他是擅写剧本的巴生人，其他生平详情就不甚了了。近20年来，在雪隆一些社团，尤其是在文教界，陈氏是积极参与活动的活跃人士。有几次聚会，我与陈先生曾面对面对坐，或“擦肩而过”，始终不敢与先生“高攀”谈话，因有自知之明，自己才疏学浅，我只和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

如果当时有开口交谈，我第一句话会说：“陈先生，我年少时，是《电视与广播》的忠实读者！”

[2006年11月3日刊于《星洲日报》]



雁落二沙

· 马阳

从北方早来的寒流越过南岭，令那年广州的初冬显得特别冷。突然接到征雁的电话，以为他在吉隆坡，没想已到了广州。我问他是旅游吗？ he 说是探亲访友，想见见面，方便吗？我说方便方便，老朋友几十年不见，难得你来中国一趟。于是，便约他第二天中午在珠江边的“新珠江大酒店”吃个家常便饭，我请客，他有点低沉的声音答应了。第二天上午，他来电话说亲戚难找这个地方，改过地点好不好？我说好呀，我就你吧，问他住哪里？他说住在二沙岛亲戚家。我表示就在二沙岛找一间餐厅茶室聚聚如何？他同意，便约定在美术馆旁的公交车站等候，不见不散。我怕他认不出我的华发苍颜，遂告诉他我穿一件火红的机恤，手捏一份报纸。

二沙岛本是广州东面珠江上的一个渔岛，与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为邻。90年代大加开发，不出十年，就建成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政协大楼、广东省中医院，以及高级别墅住宅区等。现为宏城公园的向东部分叫“海心沙”，传闻美国想建领事馆，中国不批准。这是珠江出海的犄角要冲，让外国坐镇于此，广州便成死穴，珠三角难以再腾飞。不过高级别墅区里仍住着许多外国领事馆的家属，并且办了一间“德国舒曼音乐幼儿园”。

我提前到公交站，不久便见征雁（他的形态神态步态仍对得上当年新加坡时留给我的印象，尽管头发已经斑白）

从马路对面草地树林缓步走来，身边伴着一位女士和一名青年。我向他挥手，他也举手示意。见面时彼此紧紧握手，我问他还认得吗？他说认得，头发白了，大家都老了，几十年过得真快，说我中气足，声音洪亮，身体不错。我说近古稀之年，颈椎腰椎都有毛病，看你身体也不错嘛？他说不行，肠胃都有问题，这次来中国也想检查身体。他还向我介绍身边女士是他夫人，青年是他女婿。我一一握手表示致意。

我发现他有点像香港笑星陈厚的脸上，那颗痣还在，但脸色灰暗，病容显露。说话声音低缓，与当年慷慨激昂的滔滔然，相去极远。边走边聊，我带他们去政协大楼旁的一间酒店请他们吃午饭。无奈酒店停业，只好倒回星海音乐厅旁边的茶室，要了一些咖啡、奶茶和糕点，权当午餐。我说失敬了，很对不起老友，请谅！他说能见面畅叙一番，远胜什么山珍海味、佳肴美酒。他举起咖啡与我的奶茶碰杯，引得他的夫人和女婿露出了笑容。

叙谈中，知道他的女儿女婿在广州一间外资公司工作，二沙岛有公司的宿舍，比住宾馆方便。我说二沙中医院水准相当，可去检查一下身体，中西兼治，对慢性顽症更有疗效。他表示明天就去看看。他太太说如果条件可以，想住院一个时候。

他问起国内稿酬怎样？我告诉他，国内稿酬不高，各地各报刊也不一样，我给广州三大报都写过稿，大概一千元一百元人民币。但我不是专业作家，是业余，主要靠所在单位退休金生活。他问我还记得当年王赓武教授在其《马华文学导论》中提到“有两位很年轻的作者，是马阳和征雁，均来自联合邦”的事？我说80年代以后才看到王博士的大作。难为征雁还记得当年我写过一部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失去阳光的土地》的第一部《凄风苦雨》，因涉及敏感问题，笔农兄提出要作些修改才能出版，我带走稿子后就没了下文；还说我走后，《沙河岸上的恋歌》还印了好几版，甚至有插图精装本，吉隆坡有一个极左分子写评论否定你这部畅销书

呢，你知道吗？我说也是80年代之后，新马文友告诉我的；这不奇怪，“文革”之前，国内文艺界就已极左思潮猖獗，“大四”那年，我写了两个反映南洋之反抗英荷殖民矿主镇压起义的剧本《华工恨》、《红河风云》给大学文工团到泉州、南安、晋江等侨乡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可是，不久却遭到中文系的批判，说我描写“中间人物”，没有党的领导；我的天啊，那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还没发表！这股思潮难免不影响到新马华文文艺界，于是我自己是胶工写胶工的生活，便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很不真实了！至于《凄风苦雨》这部稿子，带回国内后，因政治气候变化，既改不成，更不敢寄给笔农兄，遭大批判时偷偷燃烧了。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就遭到不幸，注定我业余写作命运多灾多难！

殊不知征雁兄却羡慕我“开放改革”后，在国内外发表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一生没有白活；他说他一事无成，浪费了一生，说我们基本同时起步，你创作有成，我很感惭愧啊！我说现在也不迟，老马伏枥，志在千里！他却有点无奈地说，马阳，时日无多，来不及了！坐在他身边的夫人和女婿，一直没什么讲话，脸上也少欢容。征雁话较多，说急了，就有点咳嗽。他说起我未能出席大马福联会举办的马华小说创作评奖颁奖大会，许多文友都觉得很遗憾。

我即表示很对不起他的盛情邀请，征雁除了来电话，还寄来邀请函，邀请我当评委，并邮下参评的作者作品。他说中国大陆就邀请我和贾平凹。适逢我的护照到期，离大会不到一个月，要换护照，要办签证，恐怕赶不及了。但我还是答应征雁尽量争取出席，他在电话里一再强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终因大马入境签证未能如期办妥，而无法出席，不过我却按时寄回评语和名次，同时祝大会成功。

没想到征雁竟从灰蓝色大褙口袋，掏出一只装有人民币的信封递给我，说是评审费，小意思，要我收下。我表示支持马华文学健康成长义不容辞，我若收了，就见外了。他



说我不收，回去不好向主办方交差，是大家的意见，希望我“比面”。听他这么一讲，我只好从信里一叠人民币中取出两张一百块的，说好事成双，就这样吧，说着便把信封挡回去。可是征雁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硬是要我收下，夫人和女婿也帮嘴。见此情景，我难以再推却，只好收下，但心里道：征雁啊，要你千里迢迢把评审费送来，我何德何能，该怎样谢你呢？

说到我和征雁的交往，无法不提及刘笔农。有人把我们喻作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华文文坛“三剑客”，其实那是欠妥的，因为我们手上无“剑”，只有一支瘦瘦的狼笔，理念也不尽相同。50年代后半期，我因参加反对华校独中改制和出版诗集《山民曲》被捕被毆。释放后也遭软禁于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笔农兄的“人民书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歇脚的“江湖客栈”。从59到61年，我偷偷自联邦出来，便投宿“人民书店”地铺，好在笔农没下逐客令，否则我便流落新加坡街头矣！在莱佛士书院念先修班的征雁，也常来“人民书店”，我们一见如故，再见便成老友了。那时笔农正热衷于出版文艺丛刊丛书，发表出版过我的稿子《故乡》、《沙河岸上的恋歌》等，当然也发表出版征雁的大作。这时征雁似乎更着意于戏剧的创作演出，晚上躺下了，他还烟瘾大发，带吞云吐雾地大侃“茨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我们睡着了，他还在自吹。

有时忙里偷闲，笔农会用他那辆“黑色米那”小车载我们去海边游泳和宵夜。征雁的烟瘾也感染了我，我领了稿酬，便和他一起跑到国泰大酒店背后一条横街买走私烟，多为中国大陆出产的“大中华”、“大前门”、“双喜”等。我和征雁合照于新加坡河铁桥旁的相片，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因这帧旧照，引发我于80年代初写了一篇散文《忽见旧照忆狮城》，发表在檳城的《星檳日报》，后收入《爱情诗情世情》一书，我第一次为文说到我们的友谊。90年代后，才从来华过穗的新马文友口中，得悉征雁后来投笔从政

从商，但都不成功，有些郁郁不得志。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比我还要“书生”的文人，从政从商失败并不奇怪。他说“一事无成，浪费了一生”，不啻为“后知后觉”之叹。征雁很有才华，若将心力专注于文艺创作，必能为马华文学作出大贡献，我为他感到十分惋惜！听说他这几年也为吉隆坡的华文报刊写过“专栏”，甚至还出过小册子，但我未读到；看他发表在笔农兄主编的《新加坡文艺报》的纪念杏影先生的文字，觉得已没了年青时那股激情与辞采，政商已耗尽他的心智，勉强为之，只能如此！

我们要了两次咖啡和奶茶，聊到下午两点多钟，发现他已有疲态，他便叫“买单”，改天再聚。他争着付钱，并说会住一个时候，什么时间再聚会给我电话。我说下次陪你逛逛广州的名胜古迹，他说好呀好呀，等他检查身体以后，就好好看看这座中国的南方名城。从茶室出来，我送他们过马路。征雁要我留步，握别时，他很用力，我说等你的电话！

几天后终于等来征雁的电话，他说游广州不成了，有事明天就得飞回吉隆坡。我说希望明年春暖花开了再来；他低沉地应了一声，便把电话放下了。我却拿着话筒，呆了好一阵子。更没想到不出一年。传来了征雁病逝于2006年1月6日的噩耗。我心很沉，仔细往回想，他来广州时已患病，只是没有明白告诉我。我以为他是一般慢性病引起的身体不好，如果细心些，也会从他家属无欢容的表情中发觉他有病在身。当然征雁不是专门为我送“评审费”而来广州，但他重友谊的一颗心是可昭日月的。我的来不及出席吉隆坡颁奖大会，让他深感遗憾，不管怎样都得最后见上老友一面！我们何只“君子之交淡如水”，简直就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一片冰心在玉壶”啊！我们的文名不比李白和汪伦，但友谊情义是相通的。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群”，不曾参杂任何名利的友谊，尤其显得珍贵。

去年6月下旬回马参加拙作《山民曲》再版和新作《我瘦瘦长长的身影》初版签名售书讲演活动，好些文友谈起我

与征雁有一段令人称羨的友谊，传为文坛佳话，应该写篇文章悼念悼念老友！我说我会写，一定写，而且会是一篇不短的文字，因为没有一定的篇幅，便容不下大时代恩赐给我们而仍能延续数十年的友谊。广东音乐有一曲很著名的《雁落平沙》，借来稍改一字，便是很贴切的题目《雁落二沙》，念给征雁在天之灵，想他也会高兴的吧！

[2009年3月5日稿于广州，4月刊于《新加坡文艺报》第40期。]



征雁在广州珠江二沙岛度假。



剧作家又弱一员

——陈征雁遽尔仙逝——

· 刘笔农

——月六日傍晚，吉隆坡陈雪风来电话：“陈征雁于早晨去世。”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虽然陈征雁已经不在新加坡居住，发展。

但是，根据知道，陈征雁在50年代即到新加坡受教育，他在育英中学毕业以后，也进入莱佛士书院，以后也到日本进修有关电视演艺的课程，返新后，在文化部任职，一直到1968年才离新，返回大马。

陈征雁在新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是当时与王里互相争辉的两位年轻的剧作家。

陈征雁在新的年代，也编过《电视与广播》有年。

年前，陈征雁再将过去的作品《升旗山下》改写后再出版，同时也出版了一部新著《在高天外看春秋》。

看情形，陈征雁似乎有东山再起，重新出发的决心，现在天不假年，一位才情横溢的作家却遽尔逝世，令友辈唏嘘不已。

〔2006年2月刊于《新加坡文艺报》征雁逝世纪念特辑〕



1964年，征雁伉俪（左一和左三）和郑捷浩伉俪（左三和左四）等人在新加坡聚餐。



1966年12月6日，征雁伉俪和他的父母（从左一到左四）、叶顺泉伉俪（右三和右四）以及米然伉俪（右二和右一）在新加坡西班牙让海鲜楼聚餐。



雁過深更忆征雁

· 刘笔农

2006年刚来了几天，就在六号傍晚，骆明兄来电话告诉我，他说大马陈雪风刚才通知他，征雁已于早晨走了。

“征雁走了，怎么会呢！”

我惊愣地回响他。

雪风说，是因为肺积水。

一时间，我们都静默着。

是雪风说的，当然不会错，可是，征雁几个月前曾两度来会我，最后一次，是去年的九月，距今仅三数个月，而前一次，他说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儿子及媳妇要带他们夫妇到峇厘岛旅游几天，既然来了新加坡，非找我聊聊不可。他知道我近年身体不好，几年前中了风，一脚一手出了问题，后来虽然针灸了，勉强可以行走，但双脚总是没有劲，力气不足，行动十分不便。他不要麻烦我找他，所以他带着太太由儿子载着到“勿洛南”来，要和我促膝畅叙。

这样，我当然高兴，但是一想到几年前我赴KL，是去参加亚细安文艺营，他不但老远从巴生来了我们住宿的旅店咖啡厅找我，还一直陪我到半夜过后才走。第二天又带我到巴生吃螃蟹，还劳师动众地要人驾了车陪我和一批朋友，走了好长好长的夜路，弯弯转转，费去不少时间才来到一处完全是甘榜式的，以住家开的专卖店吃海鲜，又是累他陪了一整晚；可是，他来了新加坡，却又主动来找我，我和他虽然不



玩客套游戏，却也于心不安。

由于是老友，虽然身旁他有太太及儿子陪着，听我们这两个老友海阔天空地闲聊古今，直谈了几个钟头。他独酌啤酒开了两瓶，香烟买了两包，到了子夜过后才回。

但是，我们所聊的完全没有系统，也没有任何主题，大家都是随心闲谈，既谈朋友们的近况，也拉拉扯扯地互诉心声。他说近年来已经不再参与政治活动，现在是真正闭门读书写作。他的中篇小说《升旗山下》，当时由我为他出版，事隔多年，当年那本印制粗糙的小书，已售卖得到处无货。他近来想进行改写，找遍了新加坡及大马，所有书局已无一书，即使当年他记得有些朋友曾有此书的也都问过了，大家都已无所存。到底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当真是一书难求，好在新山的马汉帮他 from 南方学院的“马华文学馆”中商借复印了出来，让他能进行重写工作。现在已脱稿，书在印务馆赶印中。他说这本书的原出版人是我，再版之前还是要获得我的同意。

这是他尊重老友。其实那年我的出版工作正面临重大的挫折，合作人陈哲力已经退股另起炉灶，我的出版业务顿陷瘫痪状态。由于是老友的作品，又非出版不可，而征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我出版，从第一本小说《穷途》，而后是剧本《夜渡》，接着是厚厚的《征雁剧作集》，还有另一本散文集《后方的诗篇》。前面几本除了《穷途》初版在本地兴隆印刷之外，其他的都送到香港的新华印刷厂印，包括《穷途》的再版、三版、四版，唯有《升旗山下》是我第一本采用中文打字机打字，以自置的小型柯式印刷机印出来的。因为技术差，那本书确实印得不美。记得封面还是用了汪国赛的摄影，淡黄底，印上红色书名，虽然它比不上别的书美观，可是它是在新加坡我第一个用中文打字以柯式机印出来的版本，在文化史上，还是应该题上一笔的。

那晚，我告诉征雁，咱们老友见面，所谈的都是一些牵涉不到别人的话，改次再来的话，还是让太太和儿子先回家

休息，才不会累坏他们。不过征雁还是很权威地说，我们谈我们的，不必管他们。

第二次他是专程来的，带了刚出炉的《升旗山下》改写本来见我。事前还要我约杜红、谢克、秦淮和陈哲力，由于咱们这些都市人生活忙碌，匆忙间我只找来了杜红。谢克因为儿子要回家吃饭，来不了。秦淮则是约了欧冰冰，有出书的事谈。陈哲力去了中国旅游。我们还是在勿洛南十八座的咖啡店见面。

这一回，他说他的散文集《在高天外看春秋》就将出版。他一再提起是他的在中国工作的小女儿出资为他出版的这两本书。他准备在大马的云顶举行个发布会，老友陈雪风为他策划一切，除了将邀请现任部长主持仪式之外，还同时举行座谈会，雪风是主角。他说雪风推荐我为他说话，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作品主要的出版人，除了剧本《封锁线》由青年书局出版之外，早年他没什么人脉时，所有的书都由我为他出版，而且我们又有一段相处十分密切的日子。那时，他还在育英背书包上课，白天经常一下课就到我设在芽龙路839B的人民书店来，有事没事都来，有事就呆到晚上。如果谢明、莽原、严冬有来，他就继续留下来。假如马阳有从居銮出来，我们就三个人一同打地铺在人民书局的店中，煮咖啡夜话不息，他也就不回家了。那时大家都年轻，他家在巴生，单身来新加坡租房读书，房子租得远些，能不回就不回了。他的性格十分江湖，在一些圈子里，他自自然然地就成了受人爱戴的“老大”，在写作朋友中是如此，即使是一些圈外人，他还是很有领袖的魅力的。

数十年如此过去。他那次是很真诚来邀我去为他说几句话的，而且丢下时间，大概在九月至十月期间。他不容我推辞。他还说雪风曾在厦门大学的东南亚文艺会议上听到我的即兴发言，对我以口才不佳，不擅高谈阔论，到了大场面就言不由衷，说不出所以然来的理由，他完全推翻掉。最后他表示，只要听听老朋友的由衷之言，话不必动听，也不论长



短，人有到他就高兴。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定了。

另一项事是，他要我为他这两本书在新加坡负责发行工作。他不等我诉说现在文艺低迷，读书风气不振的话，他说他的朋友好多在新加坡，他这两本书出版了，主要要传送一项讯息，让这些朋友们知道他还在写作，这些年内，他曾写了些什么。

他很豪气地说，他已经带来了《升旗山下》，要我想办法为他安排发到书市上，卖不卖无所谓。寄来的书，除了发出去，另一部分让我代他送人。除了他签名指定送的人之外，要送谁由我决定。

那晚又是几近子夜才离开。他也邀杜红届时一起出席发布会，看得出他对于写作还是十分重视的。他说现在每天只能写800字左右，不论写什么都支持不太久。他也大叹今非昔比，不过，他的心已经安静了下来，准备再在文字上激战一番，他那份余勇确实可嘉。

可惜的是，他送来的《升旗山下》，出版时适逢图书馆新厦搬迁，也许这是原因吧，书样托“新华”杨老板送过去，却过了几个月仍音讯全无，几乎是到了《在高天外看春秋》接着出版的那段日子，《升旗山下》才被接受，而所订购的本数也较之以前征雁其他的作品少得可怜。我一直在想，这一波的挫折要怎样向他解释，但每回只记得给他寄《新加坡文艺报》却没有提起这两本书的事，而实在是，第二本散文集图书馆订得更少。如果我照实报告了，这和他当年《穷途》再版了四次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征雁也曾笑着说，大马有位名作家出了书，亲自送到一间很有规模的书店寄售，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偷偷地到那间书店去查看。他记得当时是寄了十本书，可是现在点算后书竟有十一本。他想了好久，才记起他当时曾送了书店老板一本，大概那就是为什么如今比他寄售的多了一本的原因。

说时，征雁还不忘记搞笑一番，可见他心态是何等旷达，卖书只是一般写作人的普通愿望而已，完全不在乎印书

的成本的问题。

不过，现在我还未来得及在《文艺报》为他介绍《在高天外看春秋》，他却突然走了，走得叫我绝对不信。

本来《文艺报》第20期我准备一口气刊登《升旗山下》雪风的序及《在高天外看春秋》李少良的序及征雁自己写的后记，稿都发排了，我再三考虑后，还是临时抽出，因为《文艺报》是“文协”的机关报，副刊还是得照顾理事及会员为先，尽管一些写稿的都是老朋友，而且文章也很精彩，还是不能太过放手的。我原想，这一期（第21期）才来登散文集的资料，老朋友征雁是会原谅我的苦衷的，我也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这两次的见面，印象中的老友的当年那种英气风发，举止潇洒大方，谈吐悠雅的形象已大不如前，而且他仍然是烟酒未戒，更可能晚年在政坛上的风风雨雨已淘尽了当年雄心壮志，整个的外貌有着叫人心痛的苍老体态，不过在谈吐上，他仍不失当年幽雅的气势。在我心田深处，虽难免有戚戚然，却还是不以为意的，理由是他在谈吐上还保存了年轻时的雅态，而且还是不时夹有一些他惯常的幽默打趣，让我以为岁月尽管催人老，不过，对于这位老友还是格外柔怀的。我正期待着他每天不辍的笔耕，能给咱们带来不凡之作，现在是什么也不会有了。

听了骆明兄在收线前指示，《文艺报》应为这位文坛才子出个专辑，至少找几位熟朋友写篇文字，给这位当年日夕相处的真真正正的老友这一生的评价有个定论。不过，在约了别人之后，我自己却一直精神无法集中，每天除了仍然忙着一些俗务之外，一静下来眼前就出现着征雁各种不同的形象，最明显的是他的当年背书包，打过篮球，刚放学急冲冲走来找我时，那身育英的校服前后都让汗水湿透的样子，还是那么鲜明，似乎伸手就可触摸到的情形，如今这一切永远成了无法可追的前尘往事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挣扎，是不是应该北上送征雁最后一程，但是，自己却又力不从心，行动十分不便，后来一想，

征雁是会体谅我的，他来新加坡尚且不让我去看他，正为的是他关爱老友，知道我年纪大了，又经常带病在身。不过，那份顿失挚友沉痛的心情，却又挥之不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老友，却又无从下笔，不写那份心境却又轻松不起来。今晚是写下来要写的，写到现在已经靠近凌晨五时了。对于这位老友，是有着说不完的话的，却又精神不支，已经写不了那么多了，唯有遥告老友，我永远会怀念他。

征雁，安息吧！您悠雅的形象将永远活在老友的心中，直到永恒。

[稿于2006年1月18日凌晨5时。2006年2月刊于
《新加坡文艺报》征雁逝世纪念特辑]



征雁（右）的著作，大部分由刘笔农（左）的出版社出版。



雁遇征雁二三事

· 田流

正月八日上午，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来电告知：
正 新马知名的剧作家征雁去了，邀我写一些悼念文字。

收线后才不过五分钟，《新加坡文艺报》主编刘维新也来了一个电话，通知我为那位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征雁和我们几个写剧本的文友，经常会面倾谈，所谓“兔死狐悲”，要我给征雁写几则陈年往事，应该易如反掌，我的回答是：

“行！只不过是我和征雁约有二三十载不曾见面，印象中他应该还是那种个子高大、举止潇洒的形象……”

刘维新忙说：“不是咯，时隔几十年，征雁在辞世的近一两年，已经苍老了不少，转瞬间几乎连我也认不出他咯！”

我不胜感慨，心里嘀咕着自己常跟别人提起的：“岁月从不饶人，世间不会有人长生不老的。”

这篇短文，我不在于悼念征雁的逝世，只是写几则有关他与我，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彼此时常交流的段段轶事：

那个年代里，征雁还主编《电视与广播》双周刊——那是一份当时新马最为畅销的综合性杂志，说实在的，他因为长得“帅”而且才华横溢，发表过不少剧作，其中有一篇《雨夜》，曾被多个工团戏剧组选演，而我在1965年间，参与电影戏剧研究社，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的“独幕剧大汇

演”里，负责导演他的另一作品《别后》，同样他也颇受观众的激赏。当年有人赞他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呐！

昔日曾经以《第二街》赢获文化部主办剧本创作奖的罗大章，任职于二马路（俗称吊桥头）的大路影室。我们几个写剧本的作者包括宋人、征雁、王里、田流、刘星、罗大章还有写剧评的米然、出版界的刘维新以及话剧爱好者汪国赛、陈国守等，连续经年的每逢周末，便会集在那大路影室的外厅说长话短，发抒有关话剧话题的种种议论或意见。原先，我们还打算由剧作者粉墨登场，试图营造华语话剧的新趋向，从而提升演出的水准，只可惜有不少人事问题，以及罗大章的辞职返马，原订的理想计划顿成泡影。很凑巧的，我在去年12月出版的《田流回忆录》第四辑，刊印出一帧我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多为剧作家合影留念的照片。（见该书第207页）

写作界的友好们，大多晓得征雁是一名烟瘾颇重的烟客，最爱抽的牌子是20支庄的外国烟。他曾经向我们诨言过：他抽过的香烟，如果一根根连接起来，可以绕足地球三周！

谈起他喝啤酒，我倒是最惧于被他邀往以前白沙浮街的一家酒铺里，陪他喝酒聊天，偏偏我又不会喝酒，偶尔取过他专诚敬来香烟一支，燃点蒂头，我抽上几口倒可以，要我陪他“三杯通大道”，那无异叫我“即晚上天堂”！

然而，我却得陪着他一樽樽、一杯杯地灌酒、畅谈、畅谈、灌酒……打从黄昏时刻，呆在那酒铺里一直到隔天黎明！

酒铺里的老板，大概跟征雁是蛮熟稔的，往往很干脆地，一口气将整箱啤酒，摆在我们桌底下，任由我们“不醉不归”！

原名陈达人的征雁，终于在2006年正月六日离开了人间，我不晓得他的病因，是不是跟多抽烟多喝酒有关，毕竟是曾经老友一场，我难以遗忘“陪他喝酒到天亮”的那一段

日子。

认识征雁，我一直觉得他为人十分达观，谈吐时有幽默的话柄，逗人发噱。这里，我且追忆他生前常跟人家谈起的一则“征雁学打麻将，小相公也能吃胡”的笑话！

数十年前，偶尔在一个“三缺一”的场合里，硬邀征雁凑上一脚。征雁表明他根本就不谙“方城之战”，勉强就座方桌打牌，只懂得四支牌凑杠，便有筹码可得，于是决不拆对，更不拆坎。某次打牌，一连碰了三组，才被发现手头上只剩三支牌。原来那一次他只顾收筹码忘了“补牌”一张，手头上竟然有三支幺索，一支闲章，（这便是小相公的牌局）打出闲章，还是剩下三支幺索，跟着再摸牌——

啊！又是一支幺索！

征雁翻开四支幺索，喊道：“胡了！”

略识“雀战”的牌友，定当为此捧腹不已！

〔稿于丙戌年春节。2006年2月刊于
《新加坡文艺报》征雁逝世纪念特辑〕



后排：宋人、田流、征雁、汪国赛、陈国守、刘星。
前排：米然夫人、米然、刘笔农、王里、罗大章。



征雁在日本留影。



征雁和冯爱瑛合照。



征雁家人为他庆祝60岁生日。

祭征雁

· 杜红

说这里的烟太贵
十多块钱一包烟
等于二十多块马币
这让你不敢逗留太久

说这里的酒也贵
找人喝酒
也得看谁能有五花马千金裘
舍得拿去换美酒

你只说不能常来
却未曾说从此不来

你原是个洒脱的人
何必为了那烟酒小事
跑到高天外去看春秋
从此与友辈绝缘

〔稿于2006年3月1日。2006年4月刊于《新加坡文艺报》〕



征雁（左二）在和家人在新加坡合照。



征雁（右二）幼子其贤（右三）的夫人归宁。征雁家人随行，并在台南留影。

征雁走了

· 黄叔麟

去年年底，有人在《联合晚报》的副刊《言论街》上，为文讨论征雁和陈雪风，算不算是新加坡作家的
去 问题。

我当时没有参加讨论，因为我认为，他们两位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过的作家。他们的许多文章，都是在新加坡创作的，当然可以算是新加坡作家。

三个多月前，陈雪风在吉隆坡《南洋商报》的副刊《南洋文艺》上，发表《大时代的大义与情爱——评征雁的〈升旗山下〉》一文。槟城好友骆仁辉是读后寄来赠我，并有简短说：“陈雪风兄已从武汉大学回来了。”不久，陈雪风兄偕李锦宗兄从吉隆坡同来新加坡探望我，我们一同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就是忘了谈起征雁。

两个月后，峇株巴辖的张美增兄偕诗人沙禽兄同赴昔加末与征雁相会时，征雁说他与我自新加坡别后，已经有40年不曾联系。他跟张美增兄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是不久将来新加坡，要拨电约我出来叙旧，同时他也赠送他的大著，小说《升旗山下》和散文集《在高天外看春秋》各一册，托美增兄转交给我。这两本书，不久就由美增兄的女婿黄昆辉君在一个夜晚带来。

之后，我与征雁还是没有联系。直到1月8日午后，我突然接到美增兄打来的电话说：“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征雁已经在1月6日逝世了。今天马来西亚的报纸上有他的新

闻，我看了整个人……”

就这样，我这几天一直快快不乐，四十几年前与征雁在新加坡结识并来往甚密，那时他热衷于从事舞台剧和文艺创作。后来他荣获哥伦比亚奖学金赴日深造，我们大伙儿都为他饯行。旅日归来后不久，他便到吉隆坡发展。一别40年，我们不曾再见过面。年前曾听说他每周替吉隆坡一报馆写一篇专栏。那些专栏，后来都收进他的散文集《在高天外看春秋》。

就这样，他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就永别了。

[2006年1月16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1988年7月26日，黄叔麟（右）和李锦宗（左）在霹雳州太平合照。



忆和征雁一起的日子

· 郑文辉

今天翻开《早报》副刊，看到简桥兄一篇专栏的惊人题目：《征雁走了》。这一下使我久久不能言语，整个人愣了好一阵子。

半年前，大约在去年中我到吉隆坡负责一个培训工作，经常看到《光明日报》有一篇征雁的专栏，他常常写些童年的回忆，尤其是写到日军占领时期的事更使我印象深刻。

于是，我打电话到《光明日报》表明我要和征雁联络的心意，果然获得了回应。当晚他就打电话到酒店来，那已是深夜十点多，我和他30多年未见，声音听起来没有改变。

他说，他不会开车，翌日请人开车从巴生下来见我，可是不巧，第二天我有培训课要教，无法在那时间相见，于是电话中闲聊了半个小时，说定下次我到吉隆坡再饮茶。

哪知，那晚的一通电话，是30多年来联络上的电话，也是最后的一通电话。这一次差误也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他就这样走了！

说起我和征雁的认识从同事到分手，必须细说从头。那一年，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吉隆坡的《虎报》停刊之后，我失业了，主编当时《马来亚通报》的彭松涛就邀我去当编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南下新加坡。在厦门街“远东文化”书店遇到《虎报》的总编辑，也即前上司陈振亚，他知道我到新加坡还未有工作时，就介绍我认识“远东文化”的老板黎国华。黎先生说有两份工作任我选一：第

一份是他的《民报》，这份报纸和当时的《马来亚通报》一样，每星期出版四天，即星期二、四、六及日。另一份工作是《电视与广播》，是一份周刊。

当时，我想周刊不曾做过，报纸却是我的本行，于是就选择在《民报》当总编辑。而《电视与广播》周刊的主编仍空着。就在这时候，陈征雁留日刚刚回来，于是他补上了这个职位。

就因为他当上周刊的主编，我在《民报》当总编辑，两人常在同一家印刷馆碰面，常常一同吃午餐和喝咖啡。这一份缘，后来再续。

那是1967年武侠小说家金庸来新办《新明日报》时，在泛亚社的康诗源推荐下，金庸邀我进入了《新明》负责编本地新闻，而征雁也进入《新明》兼职负责编马国新闻和娱乐版。他和我面对面而坐，两人共用一个电话。

于是，我又和征雁一起。两人也常常闲话家常及工作上的事。他的夫人在利峇峇里路开了一间“裁缝服装店”，开幕式我和太太一起去捧场。

记得有一次，香港导演王豪应新加坡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带了影星张慧嫻、张丽珠、顾豪等人来拍一部本地电影《前程似锦》。王豪特在利峇峇里一家酒楼请新闻界吃饭，当时还包括“丽的呼声”的主任李蕴朗和陈邦维等人。酒过三巡，吃了一半，征雁和王豪不知因什么事而起了争执，争得两人面红耳赤，场面不但尴尬而且气氛紧张，两人个子高大站了起来作状要动武。我和邦维及蕴朗忙劝架，才把一场火爆的场面平息下来！

事后，王豪对我说：“我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是什么东西？”同样的，征雁也对我说：“香港大导演多的是，王豪什么东西？”

——真没有想到两人当时争得那么火爆，现在都作古了。事隔30多年，现在记忆犹新，然而，30多年不见却成永别了。

我和征雁同是福建永春人，因为他坐在我的对面，因此两人常常用家乡话——“河洛”话——交谈，觉得比较亲切。他和在邵氏机构任广告主任蔡澜的父亲蔡文玄——诗人柳北岸——很熟络，常常和他联络并索取电影宣传稿。

征雁那个时候正写着一部小说《升旗山下》，他常常在工作完毕后或提早到办公室来写。这篇稿在他主编的《电视与广播》连载。他常常在我的对面伏案振笔疾书，而金庸却在我背面的总编辑室也伏案写他的武侠小说《鹿鼎记》。我常常开玩笑对他说：我坐在两位大作家的中间倍感光荣。

征雁的爸爸在巴生是一所华小的校长。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回去他的老乡——巴生发展，于是他就辞去了两份工作毅然回去。后来因为大家工作繁忙，虽然近在吉隆坡，但从此就很少联络。

世事弄人，有谁想到不久前才联络上，就这么擦身而过，30年来还未再见一面，他就走了，真教人惆怅！

[2006年1月28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年11月，郑文辉（右）与夫人蓝玉摄于北京鸟巢外。



征雁（左一）和家人在热浪岛度假。



征雁和家人在峇厘岛旅游时留影。



后记

· 陈其圣

《回首话当年》是父亲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5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30篇回忆式散文。严格的说，这不是一本回忆录，因为父亲下笔时，往往以非常随意的方式，针对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地点所发生的或想起的某一件引起他有所感触的事件，以他本身的看法和亲身经验付诸文字，与广大的读者分享。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有机会好好的重新整理这些作品，可惜病魔不能让他如愿以偿。这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就好像是他部分人生的足迹，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的点点滴滴。

当父亲出版了《在高天外看春秋》后就突然离我们而去，《回首话当年》的编印计划胎死腹中。我们兄弟姐妹由于生活上的关系，而且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使《回首话当年》问世的计划一直耽搁下去。去年过年时，母亲表示要使父亲最后一部遗著尽快出版，以了却他老人家去世前的心愿。

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阅读《回首话当年》的手稿，想起父亲在巴生的老家，细谈他文章中的种种事件。记忆非常深刻的是，父亲在下笔时，很介意他所提到的人物和事件，是否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愉快。我目睹他对于文章中的每一个细节，非常细心地加以推敲，不停的反复思索，以便使用最适当的方式来描写当时最真实的情况。

写到这里，他坐在房间里的安乐椅上，右手手指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笑风生的往事，很自然的又浮现在眼前。我们为《回首话当年》选择旧照片时，触景生情，更加怀念他。

我们非常感谢《光明日报》提供版位给父亲，让他退休后，得以重新提起笔杆，把他心中多年来想和大家分享的事，以回忆式散文保存下来。

父亲的同学和“战友”以及文化界的挚友和读者，在父亲逝世后都纷纷的在不同的报章和杂志、以文章来怀念他。我们借此机会，向各位长辈们致以万分的谢意，因为他们的大作，使我们这些后辈更加了解在社会活动的父亲。在此，也要感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署理会长黄炳强先生协助安排，承蒙该会顾问黄金炳先生为本书题字，使本书生色不少。父亲的“战友”和著名画家陈源松先生早年已为父亲的短篇小说集《穷途》和戏剧集《夜渡》等书设计封面。这次他还是慨然应允为父亲的最后一部遗作，精心设计令我们满意的封面。他和父亲之间始终不渝的友情令人感动。李少良先生为《回首话当年》诸篇文章进行了初校。李锦宗先生也为这些文章和纪念父亲的作品进行了校对和编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拔刀相助，《回首话当年》肯定难以早日面世。

舅父冯万顺先生多年来对父亲所筹办的各样文化活动，都不遗余力的给以协助，虽然父亲嘴里没有说什么，但内心是非常感激他的支持。这次他以一贯的热诚推动《回首话当年》的出版工作，我们对他的关切铭诸肺腑。

为《回首话当年》写序的是姑姑陈达真女士。认识姑姑和父亲的人都知道，他姐弟俩多次联手合作，在不同的场合，为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教育活动而努力。了解他俩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他俩之间浓浓的手足情深。我们对姑姑对父亲的亲情以及对我们这些侄儿和侄女多年来的照顾永志不忘。

父亲遽然的离去，对母亲来说是非常沉痛的打击。两年后的今天，当她在整理父亲的手稿，阅读很多怀念父亲的文

章时，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当年为了马华公会和社团的活动，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一人支撑和打理。母亲的坚强意志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尽心尽力落实他所追求的理想。我们对母亲无私的爱致以最高的敬意。

〔2007年圣诞节于巴生〕



征雁的全家福。



征雁和夫人冯爱瑛育有二子二女。



征雁（前排左三）及其妻舅冯万顺（前排中间）两家人合影。



内容简介

《回首话当年》是征雁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生前唯一未竟出版的遗著。这部属于随想式回忆录的作品，不但提供了作者过去部分生活经历的记录，同时反映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社会存在的一些美好或丑恶的人、事、物。

本书后半部附录了征雁生前在马新等地多位文友和读者书写的悼念文章和诗歌。好像《回首话当年》内收集的多篇作品一样，里面所含的丰富资料，值得参考，甚至作为研究之用。

征雁已出版的著作



ISBN 978-983-43625-1-5



9 789834 362515

RM 20.00